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 中共杭州市委
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5

ISBN 978-7-213-10124-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
组织-党史-杭州-1921-2021 IV. ①D235.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76786号

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刘 华 申屠增群

责任校对 何培玉

责任印务 刘彭年

封面设计 许冬喜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72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2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10124-3

定 价 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 言

百年征程，百年荣光。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仅有50多名党员成长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乘风破浪，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书写着壮丽的篇章。

1922年9月，浙江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翻开了杭州人民革命的崭新一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杭州党组织带领人民经过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实现了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杭州市委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杭州大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开拓创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市经济、政治、

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学习党的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意深远，意义重大。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此之际，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组织编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以期为全市党员干部学习杭州党史提供简明教材，使读者了解党领导杭州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焕发精神动力，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杭州成功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在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发挥“头雁”作用而奋勇前行。

目 录

第一章 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 ·····	001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一师风潮”·····	001
二、工农运动的兴起·····	008
三、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013
第二章 曲折发展的革命历程 ·····	020
一、西湖会议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020
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029
三、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037
第三章 抗战烽火中的浴血奋战 ·····	043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	043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曲折发展·····	048
三、富春江两岸的抗日武装斗争·····	056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杭州的胜利	063
一、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与高涨	063
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071
三、杭州地区的解放	077
第五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087
一、新生的人民政权	088
二、巩固新政权的斗争	095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102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党的建设	108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16
一、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117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123
三、在全面调整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133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内乱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	144
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与极左方针的贯彻	145
二、纠“左”与反纠“左”的斗争	155
三、全面整顿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163

第八章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174
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74
二、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178
三、改革开放的起步	184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的开创	194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94
二、在严峻考验中深化改革开放	203
三、社会事业改革的全面展开	212
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220
第十章 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初步建立	228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8
二、面向新世纪，开创新局面	239
三、城市化的推进与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	248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和科教事业的发展	255

第十一章 推进科学发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261
一、以“八八战略”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261
二、大力推进“生活品质之城”建设	271
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框架的初步形成	280
四、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建设	288
第十二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前进	295
一、在新时代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296
二、在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走在前、作示范	305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16
四、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321
后 记	326

第一章

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

本章提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杭州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为代表的杭州先进分子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早期建党活动；他们较早注意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在杭州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工农运动。1922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自此，杭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杭州党小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一方面担负着领导浙江全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的重任，并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一师风潮”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杭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过一次次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教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的

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杭州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杭州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各种民主进步思想的比较中逐步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鸦片战争后的杭州经济社会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英、法、意、美等国把势力范围从上海、宁波扩展到杭州。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1896年3月，日本在宝石山麓石塔儿头设立驻杭领事馆。同年8月，清政府在拱宸桥地区设立通商场，占地1800亩，日本将其北半部辟为租界。租界内，一切行政、司法权都为日本占有，成为“国中之国”。同月，杭州海关正式开关，关务实权由英国人操纵。根据“利益均沾”条款，英、美、法等列强在杭州建立领事馆，后在通商场内租地经营。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束缚着杭州，使杭州在列强残酷的掠夺压榨面前寸步难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杭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大量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和商品市场。1876年，清政府洋务派在杭州设立机器局，使杭州产生了首批产业工人。19世纪末，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富商开始在杭州创办纺织、面粉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扩大了产业工人队伍，也诞生了杭州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产业工人为了求得生存和改善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多次掀起罢工、请愿、抵制美货等反帝反封建斗争。部分民族资本家也参加了抵制美货、保卫路权等反帝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杭州民族工商业无论

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工人也随之迅速增多，至1919年5月前，已有2万余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杭州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形成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他们集中在城市，代表着机器大工业等先进生产力；二是组织性和纪律性强，便于传播先进的思想和形成革命的力量；三是主要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四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决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因此，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近代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和革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杭州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开始广泛传播。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办报纸、设新学或出国留学。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断推进，杭州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参加革命党，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武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大力推动杭州光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杭州革命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但相继遭到惨痛失败。这些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①；另一方面，他们力量薄弱，又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严重依赖性，在斗争中缺乏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个阶级不能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这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1915年，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出版为标志，全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激发了在杭州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新式学校学习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新思潮的热情，为杭州响应五四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响应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以爱国学生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消息传到杭州，之江大学师生率先行动，当晚举行紧急集会，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严惩亲日派卖国贼，并决定联络在杭各校采取一致行动、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7日致电北京各校，表示愿为北京学生的后援。9日召开“国耻纪念大会”。9日晚上，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齐集浙江省教育会，声援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决定仿照北京、上海做法，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

经过联络和筹备，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大会在宣布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和通过向省议会与军民各长官的请愿书后，列队游行进行爱国宣传。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向省议会请愿，要求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顾全民意对卖国官员提出弹劾案、组织浙江省外交后援会等。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集会游行，充分显示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回校后还组织宣传队广泛进行爱国演说，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

然而，北洋军阀政府不顾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5月14日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此举激起了各地学生更大的愤怒。5月22日至28日，杭州学生联合会连续召开会议，通报京、津、沪等地学生运动情况，酝酿罢课事宜，并于28日发表罢课宣言，决定从29日起举行总罢课，同时致函全省中等以上学校采取一致行动。

面对杭城迅猛发展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浙江军政当局采取了高压政策，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针对政府当局的倒行逆施，5月30日，杭州学生联合会发表《浙江学生会第二次宣言》，将政府当局妄图用疏散学生的手段来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阴谋通报全

国，重申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实行罢课的决心。

蓬勃发展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勾结北京政府妄图破坏学生运动，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杭州，“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从学生开始逐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促进了社会各界的联合。

在杭州总商会的倡导下，商界人士决定在西湖边湖滨新市场设立浙江商品陈列馆和附设加工场一所，并发函全国各地征集国产商品。杭州洋行业也提出要征集国货标本。一时间，“国货经营处”“国货陈列所”“国货贩卖团”“国货商标”等组织在杭州相继成立，这对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打击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气焰、鼓舞全市人民的斗争士气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6月初，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激起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上海数万工人从6月5日起，自发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学生爱国行动的罢工。与上海工人大罢工相呼应，杭州工人也纷纷进行罢工斗争，致使水陆交通中断、机器停止运转。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推动下，从6月9日起，杭州各商店开始举行为时4天的罢市。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杭州的“三罢”斗争迅猛发展起来。

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北京政府下令免去亲日派卖国贼职务，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终止罢课宣言”，提出“为国勿废力学，力学勿忘救国”的口号。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五四运动的胜利，改写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任意宰割的历史，促进了各界群众的进一步联合，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联合斗争的伟大力量。在杭州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由此登上了

历史舞台，起到了主力军作用。

“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杭州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逐渐成为杭州乃至全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校长经亨颐的主持下，该校倡导人格教育，重视发扬学生“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精神，并汇集了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学术上颇有建树的教师，具有浓厚的民主气氛。1919年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经亨颐在一师大胆试行“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四项重大教育改革，使校风为之一新，学生自治活动日益活跃。10月，一师、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部分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后改名《浙江新潮》，并成立浙江新潮社。该刊思想激进、言论犀利，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成为当时浙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在全国颇具影响。11月，一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徐白民、宣中华等学生当选为负责人。这是浙江省乃至全国较早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之一。不久，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也效仿一师成立学生自治会。

一师以创新精神实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有力冲击了旧教育的陈规陋习，对民主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省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政府当局和守旧派势力的极度不满。

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一师学生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倡导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该文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倾向，从根本上触及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引起当局的强烈不满。不久，《浙江新潮》被查禁，经亨颐及其教育改革受到横加指责。1920年2月初，省教育厅继续对杭城教育界和学生中的进步力量采取高压政策：调经亨颐为省教育厅视学，起用新校长，原教员需经新校长重新聘任方能留教；开除10余名积极参加杭州学生联合会活动的进步学生。

得知消息后，2月中旬，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徐白民、宣中华等连续三次发信给放寒假回家的同学，揭露政府当局的阴谋，要求大家在2月29日（农历正月初十）前返校，共谋应对的办法。由此，一场以“去经留经”为斗争形式、以摧残与维护新文化运动为斗争内容的“一师风潮”爆发。2月12日，一师教职员召开全体会议，公推范允滋、胡公冕持公函面见教育厅厅长，要求恢复经亨颐的校长职务。被拒绝后，他们又以全体教职员的名义呈文省教育厅请愿，并发表挽经宣言。3月15日起，一师4名学生代表持请愿书向省教育厅、省长公署进行多次请愿，要求政府当局收回成命。

一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的声援，除各大中城市学校师生外，留日浙江同乡会、留美浙籍学生、全国各界联合会等都纷纷来电来函声援。北京《晨报》《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申报》等多家报纸杂志，作了大量如实的跟踪报道，并及时进行评论，从舆论上给予一师学生极大的支持。

3月22日，一师学生拒绝新校长带领新聘教员进校。24日，教育厅要求一师“暂行休业”，勒令学生“即日一律离校”，并于次日派警察进驻。政府当局的倒行逆施，促使事态进一步恶化。27日，一师学生再次集队到省教育厅请愿，未得到回应。次日上午，杭州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4000余人前往省教育厅和省长公署请愿，沿途散发请愿宣言。当游行队伍准备去省长公署请愿时，遭到省长卫队辱骂和殴打，数名学生受伤。流血事件发生后，杭州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学联、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各社会团体，请求主持正义。北京知名人士梁启超、蔡元培等10人亦联合致电指责省长齐耀珊。齐耀珊恼羞成怒，要求解散一师，并派出500多名警察包围学校，强行遣送学生回家。学生不愿离校，与军警展开斗争。杭州其他各校学生闻讯，纷纷前来支援，并冲破封锁，进校与一师学生会合，并肩战斗。一师教职员和校友也赶来声援。

政府当局的倒行逆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要求当局和平解决，不得伤害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省长齐耀珊、教育厅厅长夏敬观只得与徐白民、宣中华等学生代表重开谈判，被迫接受师生们提出的立即撤退驻校警察、收回解散一师的命令和定期开学、原有教职员复职、撤销新校长的任命等。

鉴于经亨颐为了“人格”而决意不再复任校长一职，经多方协调，最终暨南大学教务长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姜伯韩出任一师校长。姜伯韩到任后基本继承经亨颐所开创的改革精神，经亨颐没来得及实施的学科制也得到了贯彻。一师又先后聘请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和叶圣陶等来校担任国文教员，他们均继承一师的改革精神，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历时两个多月的“一师风潮”以学生的胜利而结束。

“一师风潮”是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一次重要交锋。它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分子。

“一师风潮”后，一批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前往上海、北京参与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杭州进步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创办了《钱江评论》《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浙人》等刊物，介绍新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改造社会的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

二、工农运动的兴起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杭州进步知识分子在实践中较早地注意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并在杭州组织发动了工农运动。杭州印刷业、理发业工人的罢工成为浙江工人运动的先声，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

早期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特别是进步刊物的创办，使青年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与杭州的印刷工人发生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印刷工人在当时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又经常接触进步的宣传品和先进知识分子，因此他们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1920年七八月间，杭州印刷工人在五四运动中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基础上，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简称互助会），有会员70余名。这不仅是全省最早的工会组织，也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它打破了旧式行会按地域、籍贯、宗派形成的格局，除该公司资本家、高级职员不能参加外，工人不分长幼，都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此外，该会还制定《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草章》，规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12月，互助会创办《曲江工潮》，这不仅是全省第一份工人刊物，也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曲江工潮》为半月刊，每期20页左右，印刷100余份，与各报社、学校交换。它以革新旧工业、研究新技术、图谋工界福利、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第3期^①发表的《工人解放的先决条件》《工人教育的目的》《仇敌与恩人》《劳动和文明》等文章，都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具体生动地向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和劳动创造世界的教育。在办刊过程中，互助会的组织者意识到，要办好工人自己的刊物，必须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于是，互助会创办了工人业余补习学校，不仅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还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新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不少参加过业余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互助会开展的活动有力推动了杭州工人运动。1921年“五一”节，在互助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杭州各业工人以印刷工人为先导，进

^① 《曲江工潮》共发行14期，目前仅能见到第三期，原件珍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行全市大游行。此后，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互助会起草了《杭州工人协会对国民会议决议案》等文件，并筹建杭州工人协会，筹备会通讯处就设在互助会内。互助会的骨干还到其他工厂做宣传，联系进步工人。互助会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品时常通过互助会印刷。1921年10月，中共中央指派互助会骨干倪忧天为杭州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但互助会的活动引起了资本家的敌视。1921年11月，资方联络军警强行解散互助会，开除互助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致使他们流落到外地或外厂。《曲江工潮》和工人业余补习学校也因此停办，杭州工人协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尽管如此，互助会经过近一年半的活动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不少工人运动骨干，进一步沟通和密切了进步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对杭州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杭州较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除互助会的创建外，还有理发业工人的罢工风潮。

当时杭州有理发店280余家，理发工人千余名。长期以来，这些工人受到雇主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生活十分艰难。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启发和帮助下，1921年5月，工人们派出代表向雇主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雇主们不但不接受工人的正当要求，反而毒打2名工人代表和5名跟随去旁听的工人，并勾结警察，将其中被打成重伤无力逃脱的4名工人逮捕关进监狱。

事件发生后，全市理发工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应对措施。闻讯赶去的进步学生倾听工人们的控诉后，当即发表演说，鼓励工人们将斗争进行到底。正在此时，省长卫队和警察赶到集会现场，企图用武力驱散工人。在场的工人和学生与军警辩论，并提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受伤工人归雇主调养、改善待遇等要求。

雇主们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并再次勾结政府逮捕三四十名工人。24日，杭州理发工人实行同盟总罢工。工人们走上街头，向社会各界痛诉其悲惨生活，并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向市民散发《杭州理发工人全体泣告书》，提出一天不答应要求、不释放被捕工人，一天不上工。随后，工人们每10人至15人为一组沿街招揽生意以维持生计，价格比店方规定的便宜一半。

在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工人们坚持不懈的斗争下，杭州理发工人的罢工持续了8天，最终政府当局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被迫释放了被关押的工人，拘押了毒打工人的凶手，雇主们也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这场被上海《民国日报》称之为“杭州破天荒的罢工风潮”是一次行业总同盟罢工，对推动杭州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年8月，为反抗“源元泰”纸行等“过塘行”长期压榨而爆发的萧山临浦纸业工人暴动，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杭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以前的斗争，虽然多是自发形成的，但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参与是分不开的。这些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反动政府的统治，初步显示出杭州工人阶级敢于团结斗争和革命彻底性的特点，为他们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并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了条件。

衙前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但党内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注意农村工作。尤其是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先进分子已经在关注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行宣传 and 介绍，并从教育入手，深入农村，启发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斗争。

1921年4月，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①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创办农村小学，并邀请原一师的教师刘大白，学生徐白民、宣中华、唐公宪以及原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杨之华等前往任教，以此为阵地开展农民运动。农村小学的教员们在进行思想发动时，抓住农民身边所发生的有影响的事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通过宣传教育，农民们开始起来捍卫自身的权益，涌现出了萧山的李成虎、绍兴的单夏兰等一批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为农民协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9月27日，衙前及附近一些村子的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成立。会议选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瑞张6位贫苦农民为协会领导者，发布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世界上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宣称“本会与田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影响和带动了附近的村民，此后两个月内，萧山、绍兴、上虞3个县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并作出“三折还租”（按原租额三折交租）、改大斗为公斗（用每斗15市斤折为一公斗量租）、取消“东脚费”（地主下乡收租时由佃农负担的路费）、反对交预租等规定，鼓励农民开展抗租和反封建的斗争。

抗租减租斗争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而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拥护，但也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官府查办。12月18日，反动政府派出百余名官兵包围正在衙前东岳庙开会的农民协会联合会会场，逮捕了单夏兰、陈晋生等3人，又打伤3人，并搜缴各村农协委员的总名册。此后，反动政府强令解散各村农民协会，并派军

^① 即沈定一，萧山衙前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5月，因坚持反对国共合作和党的路线，被中共开除出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与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1928年8月，在衙前遇刺身亡。

警按名拘拿各村农协领导人，部分农民协会领导人被捕入狱。12月27日，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人李成虎被捕，并于次年1月24日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运动惨遭扼杀。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三、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经过五四运动和工农运动的洗礼，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1922年9月初，中共杭州小组成立，自此，杭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积极参加建党活动

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至上海，不久就同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沈玄庐及浙江籍先进分子沈雁冰、邵力子等取得联系，酝酿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在华期间，杭州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俞秀松担任其助手，协助他做了大量工作。四五月间，陈独秀组织了几次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沈玄庐等参加座谈。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等参加。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俞秀松参加了起草工作。

经过酝酿和准备，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至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发展成员17人，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均在其列。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者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施存统赴日本后经陈独秀指定成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吸收了10余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其间，他大量阅读和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还积极参与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论战，并在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俞秀松“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一段时间“实际上一个人承担了上海党组织的全部工作”。^①在上海早期党组织中，俞秀松最早到工厂中做工并研究推动工人运动。他参与创建了1920年11月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和12月成立的印刷工会，组织了工人夜校和俱乐部。1921年初，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负责，俞秀松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负责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陈望道完成国内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后，曾担任《新青年》主编，在其任主编期间，《新青年》刊登了大量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和译文。部分论文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沈玄庐于1921年1月应陈独秀之邀到广州，参加广州支部的工作，并主编广州共产党支部的《劳动与妇女》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

^① 俞秀松：《自传》，《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道、俞秀松等还担任了《劳动界》周刊的编辑工作，该刊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等。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极为重视青年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等，俞秀松任书记。9月，俞秀松主持制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写信联络、指导各地建团。到1921年春，全国各地已有团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建团过程中起到了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杭州先进分子在党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

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积极参加全国建党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杭州的革命活动，为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0年11月，杭州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叫“悟社”的组织，其成员作为主要骨干参与了衙前农村小学的筹办。农村小学聚集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从事启发和教育农民的工作，另一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并以夏令营的形式，向各地小学教员传播马克思主义。“悟社”和衙前农村小学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为杭州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这为杭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师毕业的学生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俞秀松曾在杭州进行过发展、联系团员的工作，后因各种原因中断。1922年3月，俞秀松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指派，到杭州筹建团的地方组织。经过积极努力，4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皮市巷3号成立，有团员27人，俞秀松兼任书记。这是浙江省建立的第一个团地方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或恢复的17处团组织之一。6月，杭州团支部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纲领》和《章程》，扩建为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杭州地委）。团杭州地委建立后，在市区各工厂、学校开展了社会调查，并发起组建浙江文化书局、杭州印刷工会筹备会、工人补习学校等，公开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演讲、宣传活动。在加强团员思想教育的同时，团杭州地委还选派团员到各地进行联络，筹建各地团的基层组织，不仅对推动浙江省各地团组织的创建有着较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①，还为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摆在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全国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次年7月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上海区执委），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委员会由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组成，徐梅坤任委员长。1922年8月底，徐梅坤专程到杭州开展建党活动。此时，公开身份是浙江法政学校教员、实为共产党员的于树德受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也在杭州开展建党活动，并与中共上海区执委接上关系。他们还先后和沪杭铁路杭州闸口铁路机修厂钳工沈干城、浙军第一师连副金佛庄取得联系，并将金佛庄转为中共党员。

^① 陈秀萍、李辉毅编：《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22年9月初，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在皮市巷3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杭州小组，于树德任组长，成员有金佛庄、沈干城，隶属于中共上海区执委。1923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在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支部，于树德任书记。

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为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杭州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共杭州小组尽管力量还很弱小，但在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等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为杭州掀起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杭州党组织的初步发展

中共杭州小组建立后，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到工农群众中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等。与此同时，积极在杭州周边及全省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3年6月，党员何赤华到绍兴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并于7月成立绍兴党、团支部。这说明，中共杭州小组在中共浙江省委建立^①之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担负着浙江全省建党的工作。

1923年5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党的三大列席代表赴广州，中共上海区执委派安体诚到杭任中共杭州支部书记。安体诚到杭州后，在浙江法政学校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具体指导杭州团组织开展活动。为了迅速扩大党在杭州的政治影响，安体诚接受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编辑部的委托，以“安存真”之名，担任该刊在杭州的发行人，并以所在学校作为发行通讯处。

党的三大后，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国民大革命的需要，中共杭州支部部分党员陆续调离杭州，到1923年10月，在杭的党员只有5人。为

^①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中共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领导全省党的工作。

此，中共上海区执委将杭州的党员编为中共上海区执委第五组，组长安体诚。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的工作并未停顿。到1924年初，为推动浙江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和群众运动的进行，经中共上海区执委讨论通过，杭州党组织先后吸收宣中华、戴立夫（戴任）入党，党员人数增至7人，恢复支部建制，书记仍由安体诚担任。1924年春，党员宣侠父到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开展建党活动，建立海门党小组，由宣侠父负责，隶属杭州支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4年4月，中共上海区执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杭州支部改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亦受中共上海地委指导）。1925年8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中共杭州支部改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1925年9月，中共杭州支部更名为杭州独立支部，办公地址从马坡巷移至大塔儿巷21号。不久，安体诚调离杭州，华林接任书记。党的四大以后，杭州地方党组织开始注重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到1925年底，党员达30余名，市区下辖闸口、“省党部”^①、大江3个基层支部，并向建德、余杭、绍兴、奉化、余姚盐场等地派出通信员，分头开展建党工作。与此同时，外埠党组织也有所发展。1925年秋，金华七中师范科学生千家驹在五卅运动中由宣中华介绍入党，千家驹又先后介绍5名同学入党，成立中共金华支部，千家驹任书记，隶属杭州独立支部领导。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26年1月，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杭州独立支扩建为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下辖安定中学、工业专门学校、省立一中、医药专门学校、英文专修、铁路工人、闸口机厂（联合）共7个支部及金华等外埠党组织，共有党员60名，顾作之任地委书记。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由于顾作之为国民党党务工作经常奔波于杭嘉湖之间，地委书记一职曾暂由张寅仲代理。7月，上海区委根据杭州党组

^① “省党部”：国民革命期间在杭州建立的中国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

织现状，决定进行组织调整，派贺威圣担任杭州地委书记。在杭州地委的有力领导下，外埠党组织继续发展，至10月，先后新建中共武义县支部、中共宁海中学支部、中共硤石支部。

在此期间，杭州团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1924年，团杭州地委几经改选，在进行内部整顿、训练团员的同时，努力从铁路、电灯、电话、邮政等工人中发展团员，并建立杭州市第一中学支部、美术专门支部、广济医专支部、法政专门支部，在外埠建有绍兴支部、萧山支部，共6个团支部。这一时期，团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告，以“青年协进会”的名义，通电反对“伪和平会议”，组织团员宣传国民革命和政党救国，筹建青年补习学校，并选拔宣侠父等5人赴广州黄埔军校深造。

杭州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并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引向深入。

第二章

曲折发展的革命历程

本章提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党的民主革命纲领。8月在杭州召开的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确立了党内合作的原则和途径。国共合作实现后，在杭州迅速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克杭州。正当大革命运动在杭州达到高潮时，国民党反动派在1927年4月11日发动了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受到迫害，大革命运动失败。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杭州地方组织没有停止革命活动，在党组织屡遭破坏屡次重建的情况下，紧密团结工农群众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斗争和可歌可泣的十年狱中斗争。

一、西湖会议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致力于工农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但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凶残的，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斗是不够的，要战胜国内外敌人必须寻找可靠的同盟者。这和急切希望改变国民党涣散状态

的孙中山不谋而合。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3月，在中共杭州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杭州得以实现。

西湖会议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会后，为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对于合作，国共双方都有各自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同时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时的国民党正面临内忧外患，陈炯明的叛乱以及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一次次落空，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正当孙中山在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之际，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出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两党合作的问题。与此同时，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兴起力量，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孙中山决心同苏联合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但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鉴于曾与孙中山等人的多次会谈及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由于出现原则分歧，马林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1922年8月初，马林再次来华，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他在中国工作的指示以及《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强调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在保持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先后与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等中共领导人及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反复商谈国共关系和合作事宜。

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即西湖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以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和途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

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与会者阐述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而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民主和民族的革命政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并且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由于国民党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大的影响，孙中山不会赞同与共产党在党外的对等合作。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一开始并未认可马林的主张，针对共产党员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形成三种主要意见：一是反对“党内合作”；二是基本同意“党内合作”；三是有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通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明，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孙中山，并向他介绍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不久，李大

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俞秀松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此仍有疑虑，直到第二年中共三大召开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全面贯彻。

西湖会议是促成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灵活地将当时难以实现的国共两党党外合作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策略，为党的三大确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为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在西湖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大会正式决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同时规定了保存并努力扩大党的组织、保持党的独立性等原则。按照中央部署，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决定青年团员也应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与共产党的言行保持一致。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以反帝、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宣言，明确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为了贯彻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精神，1924年3月底，由中共党员沈玄庐、宣中华、俞秀松等为主筹建的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简称临时省党部）在杭州成立，当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了绝大多数，起着骨干作用。临时省党部的成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杭州的实现。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浙江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杭县、萧山、富阳、建德、昌化（原为县制，今属临安）等地先后建立国民党县（区）党部，并且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

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6月，临时省党部创办机关刊物

《浙江周刊》，大力宣传国民革命思想。该刊的撰稿人大多是跨党的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员，他们从思想上引导教育广大人民，从舆论上为国民革命运动推波助澜。在中共杭州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推动下，杭州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先后开展了丝绸工人罢工、纪念“五一”“五四”活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一系列群众性革命斗争，特别是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极大地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觉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此后，全国各界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权。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扫除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再次阐明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支持孙中山北上。

国民会议运动在杭州得到广泛响应。1924年11月，在中共杭州支部的领导和推动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临时省党部等或致电孙中山，或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纷纷拥护孙中山北上。12月15日，由在杭的17个团体组成的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成立，中共党员安体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邵季昂、黄中美等为筹备委员。12月中旬，在中共杭州支部的组织下，机器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杭州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促成国民会议意见书。1925年1月4日，筹备会在杭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后，分头以演讲、报刊等形式宣传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此时，段祺瑞政府为抵制国民会议，提出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企图以假和平的手段欺骗民众。中共杭州支部书记安体诚以“青年协进会”的名义通电反对，并派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人组成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中共杭州支部引导和推动

杭州三四十所学校联名发起悼念孙中山活动，并于4月12日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并沿途散发宣传刊物。这场追悼孙中山的群众运动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活动，推进了杭州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

响应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籍职员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打伤10多人。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从而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化为反帝斗争。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并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南京路时，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人民，号召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运动由此席卷全国。

受中共上海地委指派，5月31日下午，宣中华到杭召集各界人士参加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杭州支部也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统一指挥、分头负责，发动群众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临时省党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全省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声援五卅运动。曾一度被军阀政府解散的杭州学生联合会也恢复机构，开展活动。

6月1日，省教育会召开学生代表和教育界代表联席会议，宣中华在会上号召全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杭州学生联合会和杭州青年协进会当即商定，一面组织街头宣传，示威游行，揭露五卅惨案真相；一面派代表联络工商界，采取一致行动。在杭州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省农会、杭商总会急电上海商会转各公团表示声援，并电请

北京外交部令驻沪交涉员严正交涉。次日，全市数十个各业公会及团体组成杭州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以后援会的名义发通电、印传单、贴标语，开展宣传活动。

6月3日，杭城开始罢课、罢工及罢市。工商学界100多个团体、90余所学校、5万余人集中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国民大会，提出了“惩凶恤死、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11项要求，会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大游行。此后，杭州又于21日和25日两次举行反帝大游行，参加者除工人、学生、店员和市民外，还有不少郊区农民。

除了示威游行、三罢斗争，各校还组织宣传小分队上街演讲，并深入到附近工厂和萧山、富阳、桐庐、建德等地进行宣传。杭州城站旅馆屋顶的“楼外楼”露天电影场放映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五卅沪潮》，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干涉，群众义愤填膺，坚决不允，迫使军警撤离，该片连映7天。

为进一步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中共杭州支部在组织、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6月至8月初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英货日货、实行经济绝交、劳动绝交和支持上海罢工工人的大规模募捐活动，受到全社会的一致响应和广泛支持。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杭州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共捐款5万余元，其余还有一批货物。中共杭州支部还组织了京剧、话剧义演，其收入全部捐助上海工人。不仅如此，各工会联合会还先后介绍千余名上海罢工工人到鼎新纱厂、武林铁工厂做工。杭州各县也以各种形式开展声援活动，募捐数额也在万元以上。

在党的领导下，杭州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对杭州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对国共合作后杭州革命形势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并贯穿整个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逝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令原本就对中共充满戒心的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1925年7月，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萧山衙前沈玄庐的家中召开，史称“衙前会议”。在被中共开除出党且堕落为国民党右派的沈玄庐与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央特派员戴季陶的密谋下，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国民党中央决议并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实质是借机宣传戴季陶主义，鼓吹取消阶级斗争，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临时省党部的领导地位，破坏浙江的国共合作。对这一分裂行径，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宣中华指出：“国民党的路线必须符合国共两党共同愿望，维护工农利益，外对帝国主义，内对地主和资本家，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会议经过长达16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选举宣中华、经亨颐、蒋介石为浙江省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挫败了沈玄庐等在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但由于沈、戴二人对会议的控制，加上右派分子有组织有预谋的帮腔，会议仍通过了一些违背历史潮流的决议。

会后，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加紧了分裂革命队伍的活动。1925年11月，沈玄庐参加了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公开竖起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根据西山会议通过的《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的决议，沈玄庐宣布将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宣中华、安体诚、俞秀松、倪忧天、唐公宪等开除出国民党，并在杭州小车桥52号另设了由他主持的所谓“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原来国共合作的临时省党部相对抗。

为了遏制以沈玄庐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指示，1925年12月15日，宣中华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海宁县硖石镇东山公园主持召开国民党浙江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史称“东山会议”。除萧山县党部在右派把持下未能参加外，国民党杭县、宁波、镇海、绍兴、诸暨、金华、海宁、平湖、湖州、嘉兴、永嘉等县市党部及部分区党部代表共计70余人出席大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通电全国，愤怒声讨西山会议派的背叛行径；二是否认沈玄庐把持的所谓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成立国民党浙江各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简称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推选顾作之、宋云彬、唐公宪3人为联席会议代行职权机构负责人。会后，联席会议在杭州头发巷15号设立办事处，并定期出版机关刊物《三民周刊》。

“东山会议”后，杭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开声明脱离沈玄庐操纵的右派省党部，接受联席会议的领导。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宣中华在会上作浙江省党务报告，对沈玄庐等人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会上，西山会议派成员分别受到党内处分，沈玄庐被勒令“停止主持浙江省党部工作，否则除名”。

但是沈玄庐毫不悔改，继续破坏国共合作。1926年1月23日，沈玄庐非法召开“浙江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企图为他主持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正名。针对这一情况，宣中华按照中共上海区委指示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于3月6日至10日在杭州组织召开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简称省党部），选出执行委员9名，监察委员5名，并创办机关刊物《浙江潮》。当选成员中，一半以上是跨党的中共党员，各县市党部主持工作的也多为中共党员。至此，沈玄庐一手炮制的“省党部”，被国民党中央否定，也没有得到基层组织的承认，仅剩一块空招牌。西山会

议派企图控制国民党浙江组织的阴谋破产，这为杭州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和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奠定了基础。但国民党右派在杭州的破坏活动没有彻底肃清，也为大革命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杭州国共两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并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有效地支援和配合北伐军作战，使大革命在杭州迅速达到高潮。正当国民大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策动“夏超独立”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此时的浙江处于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之下，夏超为浙江省省长，但二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此外，浙江地方实力派也希望驱逐客省军阀，实现浙人治浙。浙江人民对北洋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极端仇视。这些为夏超脱离孙传芳控制、实施地方自治提供了基础。

中共杭州地委认真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开展活动，试图促使夏超尽快向广州国民政府靠拢，加快北伐军入浙进程。地委书记贺威圣把策动夏超独立作为地委的一项主要任务，一方面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把杭州的100余名党员组织起来，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营造强大的国民革命声势；另一方面通过书信、直接联系和派人多方联系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敦促夏超脱离军阀政府，响应国民革命。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派人来浙，与夏超秘密接洽，双方达成默契。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夏超对国民革命运动有了一些认识，于是派代表到武汉，与北伐军总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及中共湖北区

委联络，商谈有关浙江独立的问题。邓演达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夏超准备独立表示欢迎，并代表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浙江民政事宜，同时要求夏超出兵上海或成立自治政府，双方约定待北伐军占领江西九江后，浙江立即宣布独立。

1926年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夏超错误地以为孙传芳败局已定，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10月15日公开宣布浙江独立，脱离孙传芳，响应国民革命运动。16日，夏超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向国民政府发出就职通电。同时，改省长公署为军司令部，改浙江省政府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所属军警、保安部队等开往嘉兴、嘉善、松江、枫泾等铁路沿线一带布防，呈进攻上海之势。

夏超的独立，使浙江政局顿时发生巨大变化，各地国民党组织和原被军阀政府查封的群众团体重新公开活动。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发动各进步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市民大会，拥护浙江独立。会上还宣告杭州总工会成立，同时组建了一支50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协助地方军警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工人权益。

孙传芳得悉浙江独立的消息后，急电驻沪的宋梅村部发兵讨伐。10月22日，双方在嘉兴附近激战，夏超失利败退。宋梅村部攻入杭州，夏超被捕，次日即被孙传芳密令处决。紧接着宋梅村部在杭州大肆镇压革命运动，逮捕和杀害革命者30余人。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中共杭州地委委员、国民党杭县党部常务委员汪性天等也先后被捕，并于11月12日被害于浙江陆军监狱，成为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建立以来最早牺牲的两位领导人。

“夏超独立”虽以失败告终，但对北伐战争在东南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对江西、浙江的攻克有重要的影响。自此以后，军阀孙传芳内

部逐步分崩离析、军心涣散，很快兵败江西，杭州人民迎来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支援北伐军及其在杭州地区的作战

1926年12月，北伐军东路军在胜利结束江西战事之后挥师入浙。北伐军入浙作战后，中共杭州地委加大宣传力度，揭露军阀的反动统治，及时传递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四处进行演说，扩大影响，为迎接北伐军做好各种准备；北伐军每攻克一地，当地党组织立即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组织百姓烧水煮茶，夹道欢迎。

14日，北伐军东路军先遣队进抵建德，驻扎近一个月后集结衢州。北伐军进入建德时，各界群众在城外东关码头举行欢迎大会。不久，建德县工会筹备委员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团体相继成立，建德、寿昌等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还专门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宣讲“三民主义”。会后组织学生宣传队分赴洋溪等地宣传，在群众中树立国民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27年1月，北伐军先头部队第二十六军在富阳被孙传芳部击败，被迫退至龙游、衢州一带待援。不久，北伐军在龙游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在浙江的主力，继续向杭州进军。在途经遂安（原为县制，今属淳安）、淳安时，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共党员萧劲光指导改组了国民党遂安县党部，并向淳安县威坪镇的群众进行宣传，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势力，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在他和所属部队的指导帮助下，淳安县部分地区还成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

在此期间，为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杭州总工会负责人蒋仁东专程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杭州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周恩来听取汇报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要把握适当时机举行起义。其间，杭州工人为摧毁军阀残余势力、迎接北伐

军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沈干城还与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先遣队的便衣侦察取得联系，组织工人和闸口一带的居民袭击军阀部队设在玉皇山天龙寺的军用仓库，破坏其粮草供应。

“龙游战役”后，北伐军乘胜北上追击敌军。1927年2月，“桐庐战役”打响。经过桐君山、旧县埠、横村埠、浪石埠等四个战场的5天激战，北伐军共俘敌8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使孙传芳部主力丧失殆尽。15日，北伐军东路军乘胜克复新登，16日克复富阳。此时，中共杭州地委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由杭州总工会发出起义命令。16日晨，杭州总工会工人纠察队600余人和起义的500多士兵在城站火车站集合，向溃退的军阀部队发起攻击。到中午，杭城被工人纠察队控制。

18日，北伐军进入杭州。中共杭州地委组织5万余人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同时成立了杭州各界联合会。1月初迁往宁波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迁回杭州，公开挂牌办公，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也迁至青年路公开活动。2月底，北伐军光复浙江全境，彻底推翻了军阀孙传芳在浙江的统治。

为了追歼军阀残余部队，中共沪杭铁路支部组织“铁道队”修复铁路，为北伐军运送部队和军火。中共杭州地委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铁路工人武装，开赴嘉兴前线，协同北伐军作战，并发动民工为北伐军运输辎重弹药。杭州总工会还组织募捐队，向社会各界募集军粮物品送往前线。其间，北伐军曾在嘉兴附近受阻于军阀张宗昌的铁甲车队，闸口铁路机修厂的工人成功改装6辆铁甲车投入嘉兴战场，为嘉兴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形势下，中共杭州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在城区先后建立包括安定、工专、一中、医专、英专5所学校，庆成、立新昌、纬成、虎林、蒋广昌、天纶6个工厂，烟业、印刷、纹工、

电话、黄包车等行业工人的16个党支部。当时，党在全省的统一组织尚未建立，中共杭州地委实际上起着指导全省党的工作的作用。中共杭州地委抓住时机，不断派人与各县联络，发展党的组织。

经中共杭州地委批准，1927年1月，富阳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富阳党小组成立，有党员5人，沈炳铨任组长；2月，建德县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建德党小组成立，竹均之任组长；3月初，萧山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萧山地方党部成立，宋梦歧为负责人。这一时期，外埠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顺利，海宁、兰溪、诸暨、遂昌、衢州、龙游、江山、湖州等地先后成立党组织。这些地方成立党组织后，积极开展工作，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及学生自治会，在斗争中培训了一批骨干，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此外，中共杭州地委还派人到分水、平阳、嵊县、浦江、新昌、常山、义乌、丽水等地进行活动，开展工作。在中共杭州地委的努力下，杭州城区、各县以及杭州以外许多地区都开展了党的工作，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一度达到3000余人。

随着北伐战争在杭州地区的胜利，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进步团体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中共杭州地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动组织民众，展开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7年3月，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国民党右派日趋明显的反共倾向，决定组织罢工、罢课、罢市等群众政治运动，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会后，杭州总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三罢”，斗争持续了五六天。在斗争中，总工会所属组织不断壮大，从2月下旬到4月上旬，全市相继建立铁路、轻纺、钟表等各业工会260多个，并辖杭县、德清、武义等14个地方基层工会，会员达10万余人。3月15日，杭州首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并向铁路、邮电等10个产业工会派出指导员。22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在杭州宣告成立，推选沈干城、薛暮桥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下设闸

口铁路机厂、甬曹段、上海南站3个分会，另外在杭州地区的车务、工务部门成立工会小组。杭州总工会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组织学习工会有关知识。

杭州总工会和各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广泛活动，使工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27年3月，杭州总工会查封了英帝国主义分子以行医为名、实为实施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据点的广济医院及其附属中学，同时接管了位于平湖秋月的帝国主义分子哈同的别墅。3月中旬，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沪杭甬、沪宁两线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成立以孙津川（上海）、沈干城（杭州）为总指挥的两路罢工委员会，并发表《罢工宣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沪杭铁路总工会派出代表团参加上海市市民代表大会，共同庆祝胜利。针对当时粮食供应紧张、米价飞涨的情况，杭州总工会通过多种努力要求当局平抑米价，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也提高了工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此外，工人群众还积极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由总工会向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提出保障工人政治、经济、教育等六个方面的39条总要求。这些要求是工人群众在长期痛苦生活中感受最深，并在长期斗争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也是最低限度的切身利益所在。为争取这些切身利益，杭州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赢得部分胜利。

在市区工人运动高涨的影响下，杭州周边各县也相继建立工会组织，并开展斗争。当时，由于全省尚未有统一的工会组织，杭州总工会除领导本市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外，还派干部到省内其他地区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全省各地工会组织也派人来杭州学习取经，杭州总工会一度发挥了联络、团结全省各地工会组织的作用。在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杭州总工会和国民党省党部工人部发起组织浙江省总工会，并建立筹备处，原定于4月20日召开的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后因革命形势逆转而未果。

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杭州各县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开展起

来。北伐军胜利入浙之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农民部即向全省农民发出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不久，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宣告成立，并印好统一的口号，广为散发。杭县、萧山、建德、分水、淳安、桐庐等县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对高利贷、打土豪、分田地等农村革命运动，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27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杭州召开有3万多农民参加的盛大集会，号召农民进一步开展反封建反剥削的斗争。

在中共杭州党组织的领导下，杭州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身政治和经济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使杭州城乡各地呈现出一派革命的新气象。

大革命的在杭州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大地主的极端仇视和国民党右派的强烈恐慌，他们加紧勾结，积极准备向革命进攻。

在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蒋介石一方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江浙和沪宁地区，同时大量收编军阀部队，扩充自身武装；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进行密谋、达成协议，以增强其反革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浙江，他任命其党羽张静江、周凤岐、章烈等担任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重要职务，控制浙江政局；派人勾结土豪劣绅、收买地痞流氓，策动组织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四府同乡会成立杭州职工联合会（简称杭职联），公开向杭州总工会肇事挑衅，并唆使和策动他们到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省党部捣乱，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特别是1927年3月30日，杭职联纠集百余名打手，在警察的庇护下，手持铁锤木棍，高呼反动口号，在杭州总工会所在地示威游行，并冲进总工会总部打伤数十名工人，破坏房屋财产。直到杭州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赶到现场，用木棍、瓦片作武器进行反击，暴徒们才仓皇逃走。这就是“三三〇”事件。

“三三〇”事件后，国民党右派派兵蛮横占领杭州总工会，继续镇压工人运动。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根据组织委派，宣中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中共杭州地委统战部部长兼国民党浙江党部秘书长王贯三去武汉向国民政府汇报情况。中共杭州地委还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发动进步力量共同反对国民党右派，并要求杭州总工会加强工人群众力量，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变的准备。

但是，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不仅对杭州和其他各地党组织报告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倒退、反动行为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警惕，反而弱化了斗争，麻痹了党的基层组织。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上海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动反革命政变。4月6日，国民党浙江军事厅厅长周凤岐从北伐前线调集两个营的士兵到杭，杭州公安局局长章烈亦赴沪接受蒋介石“以实力革除共产党”的秘密指令，10日晚，章烈宣布杭州全城戒严，开始实施反革命政变计划。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中共党员迅速召开会议，商量应急措施，但为时已晚。11日，章烈指挥大批军警分头封锁和包围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杭州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公开机关及一些事先侦知的革命者住宅，进行突击大搜捕。这就是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两天内，30余名从事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逮捕，《民国日报》《浙江民报》被勒令停刊整顿，许多知名的共产党员被通电缉捕，全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杭州的革命形势更加恶化。以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党、政、工、学各级组织被取缔，以右派为核心的各类反动机构纷纷建立。中共党、团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遇害，杭州及各县的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4月14日，宣中华在上海郊区龙华火车站被捕，17日被杀害。此后短短两个月时间，杭州地委所属党员仅剩1200余

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杭州遭到失败。

尽管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杭州地方党组织通过大革命推翻了旧军阀的反动专制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杭州地方党组织也在大革命中扩大了组织，锻炼了领导能力，提高了威望，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杭州地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市、农村甚至监狱进行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与杭州党组织的曲折发展

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杭州地委及下属党的组织和工会、农会、妇女会等因遭严重破坏而被迫转入地下，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有的因遭通缉或已暴露身份暂时转移或隐蔽，也有部分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陆续脱离党组织。杭州党的组织和活动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

为尽快恢复浙江的革命力量，加强党对浙江工作的领导，同时考虑到“杭州是浙江中心，受上海指挥，实多不便”等因素，党的五大后，中央决定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原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浙江省委也在团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华少峰任书记。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后，根据斗争需要，6月，中共杭州地委改组为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张崇文任书记，主要负责城区党的工作，直属省委领导；萧山、富阳、分水、建德等地的党组织分属省委或浙西特

委领导。同年7月，张崇文因遭通缉被迫撤离杭州，区委活动停止。为此，省委决定在杭州分设上城、中城、下城、江干、西湖、湖墅6个区委，分别由邬逸民、沈资田、徐洁身、袁立夫、马东林、居天籁任书记，负责本区范围内的组织整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久，中共杭州湖墅区委被破坏，区委领导人及支部成员全部被捕。为集中党的领导，8月，省委决定改变杭州各直属区的建制，党团组织合并，建立中共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宋侃夫任书记，统一管理全市69个支部、577名党员，开展了组织学生运动、组建赤色工会、组织“双十节”示威游行等。

1927年9月下旬，为适应更为残酷的斗争形势，浙江省委决定将全省划分为11个市县委。中共杭州县委随之成立，赵刚任书记。县委下辖江干、城南、城北、笕桥、西湖、湖墅6个区委，67个支部（含西镇4个支部），领导176个产业工会和60个村的农民协会等组织，共有党员594人。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省委机关两次遭到破坏，党的组织损失惨重。至11月20日，各地共有116名党员被捕。此时，省委机关已难以在杭州立足，省委决定留下2名省委委员和1名省委候补委员在杭重建杭州县委，由沈资田任县委书记。经过组织整顿，杭州县委仅有西湖、西镇、乔司、皋塘4个农区和铁路系统的党员150多人。省委机关则于12月迁往宁波，直到1928年4月1日才迁回杭州。

192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加强直达地方的巡视工作；划分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根据这一精神，经中央同意，4月19日，中共杭州中心县委正式成立，负责指导萧山、绍兴、德清、临安、嘉兴、海宁、富阳等地的工作，隶属中央。1932年8月，中共杭州特支被破坏后，党在杭州的组织机构被迫中断。

从杭州“四一一”反革命政变起，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恶劣，

杭州党组织先后17次重建（其中11次是遭破坏后重建），领导成员变化频繁，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成员经常被捕、牺牲。面对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杭州党组织和党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斗争，在杭州和浙江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壮丽篇章。同时，萧山、富阳、建德、桐庐、遂昌、淳安等地的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抗争，陆续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地方组织。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下旬，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到杭州指导浙江工作。26日晚，王若飞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阐述了土地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夺取政权是党当前的急切的工作。”^①省委扩大会后，根据八七会议基本精神，省委先后通过《给党中央的报告》和《农民运动议决草案》等文件，并召开杭州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在城市组织罢工、罢课。

会后，中共杭州县委以八七会议精神为指导，立即组织工人、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罢工、罢课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全市丝织工人总同盟罢工；在学生中广泛散发以揭露国民党政治腐败、黑暗统治，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为主要内容的《告学生书》；以工专、医专为主体，组织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统治等。

在广大农村，杭州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贯彻抗租抗税方针，积极领导各地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

^①《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记录——中央特派员王若飞报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及今后的办法》（1927年9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1986年内部编印，第116页。

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各地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广泛开展以“二五”减租、保卫农协、打倒土豪劣绅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涌现的一批积极分子先后被吸收入党，党的组织得到发展。这一时期，富阳、建德、淳安、昌化、於潜、桐庐的毕浦以及萧山的西乡、南乡、东乡，余杭西镇等地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其中“西乡打警所暴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初，国民党萧山当局逮捕长河农民协会负责人来柱臣，当地农民在长河党支部书记来耀先的带领下，从警察手中抢回了来柱臣。此后，中共萧山县西乡区委又因势利导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拒捕斗争。3月，来耀先率领长河附近数百农民手持铁耙、铁锹，捣毁长河镇警察所。次日，国民党萧山县政府逮捕了来耀先，并连夜从水路将来耀先解赴萧山。西乡区委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组织营救，并紧急动员湖头等村数百渔民驾船在通往县城必经之路的河面上拦截。深夜，当反动军警的驳船一出现就被数十艘埋伏的渔船和数百渔民团团围住，军警被迫释从来耀先。4月初，西乡区委再次组织数百农民捣毁西兴警察所，并积极策划举行暴动，后因走漏风声，暴动失败。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杭州的这些农民暴动均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使革命力量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但它也使反动当局感受到人民群众革命力量的威慑而作暂时的退却，使人民群众在大革命失败的困境中明白了奋斗的目标，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

十年狱中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和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极力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位于杭州的浙江陆军监狱成为国民党关押、迫害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主要场所。自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浙江陆军监狱先后关押政治犯1512人，其中遇难152人（被杀104人，被凌虐致死48人），省委书记张秋人、徐英、

卓兰芳和代理省委书记罗学瓚，省委其他人员及各地、县委书记40余人先后在狱中牺牲。但是，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仍坚持革命信仰，坚贞不屈、前仆后继，把监狱作为战场，继续坚持斗争。

早期的狱中斗争，以在押的省、市委主要负责人为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6月，根据斗争需要，经过秘密串连，狱中建立了以徐建三为书记、裘古怀为宣传委员、邹子侃为组织委员的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简称狱中特支）。在特殊环境中成立的狱中特支，采取党、团混合编组，但组织相当严密，被吸收参加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经过严格的考察和介绍手续。

狱中特支成立后，针对狱中斗争的特殊性，向全体政治犯提出“自己救自己、把握时机准备越狱；把监狱当学校，组织难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反对狱方的非人待遇”等三大任务，并不失时机地领导难友开展“打豺狼”“绝食”“笼啸”等多种形式的斗争。随着人员的换监和牺牲，狱中特支成员曾经过4次更换，但斗争一直没有间断。

狱中环境恶劣，情况特殊，学习成了所有政治犯的主要任务。狱中特支努力发动党员和可靠的难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马列著作和进步的文艺书刊，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组织难友学政治、学文化，并将此作为工作重点，规定上午读社会科学，下午看文艺书或学习外文。许多共产党员明知自己将要牺牲，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特支成员将凭记忆整理的中共六大资料、从狱外弄到的《国家与革命》《铁流》等政治文艺书籍和在狱中秘密编印的《伊斯库拉》（俄文“火花”的音译）和《洋铁碗》两个秘密刊物在狱中传看。为便于交流学习心得，狱中特支还组织传阅“盆报”^①。裘古怀自编3册历史教科书，组织文化不高的难友学习；徐建三、李新自编《囚徒歌》，教大家练唱等。这些学习活动，对于狱中党团员和其他难友提高政治、文

^① “盆报”：将心得体会写在包药的纸上，然后抄在脸盆上，一旦发现情况即可擦掉。

化水平，稳定革命情绪，坚定革命信念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夏，惊摄于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狱中疯狂屠杀政治犯。8月27日，徐英、罗学瓚、裘古怀、赵刚、李临光等19名在押的省、市和外县党团领导人在浙江陆军监狱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制造了血腥的“八二七”惨案。之后，狱方又取消了经过艰苦奋斗已初步得到改善的生活待遇，对政治犯的管制也更加严酷。尤其是同年9月省委书记卓兰芳在杭州被捕，11月在狱中壮烈牺牲后，政治犯的情绪更加激愤。

面对严峻的形势，1931年初，改组后的狱中特支书记邹子侃提出“自己救自己”的口号。狱中特支研究越狱计划后决定组建3个越狱大队，收集越狱装备，越狱后向临安、孝丰方向转移。此越狱计划在向各监室传送时被狱方查获，越狱总指挥邹子侃、政委何觉人牺牲。为避免更大的损失，狱中特支决定毁灭痕迹，暂停实施越狱计划。同年夏，国民党柴木巷拘留所在押政治犯利用牙刷刨挖地洞计划实施越狱，地道挖通后因叛徒告发，行动也告失败。

1937年12月，杭州即将沦陷，浙江国民党当局将羁押于陆军监狱内的政治犯南移桐庐、建德，后宣布就地解散。至此，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纷纷投入抗日战争。

在十年狱中斗争中，共产党员没有被酷刑压垮、被死亡吓倒，而是始终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把监狱作为战场，前赴后继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曲折、英勇的斗争，教育和锻炼了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第三章

抗战烽火中的浴血奋战

本章提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杭州人民掀起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见证了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金萧支队开辟路西抗日根据地后，新四军两渡富春江打通浙西、浙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9月3日，杭州人民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杭州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杭州地区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东

北，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杭州各大中专学校的爱国师生自发成立各种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爱国师生的推动下，9月23日，杭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其他各界群众15万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杭州抗日救国市民大会，通过《电请中央国府准备实力对日》《举行市民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等4项通电提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杭州20余所大中学校成立杭州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先后有643个宣传队、5800余名学生串街走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募捐活动，声援抗日义勇军。不久，杭州各界抗日团体纷纷成立。10月10日，杭州市各界民众对日经济绝交总宣誓大会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与会者郑重宣誓：“从今日起，努力提倡国货，永远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为日人服务。”各校学生组织流动检查队，对市面商家进行严格检查。

为使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杭州大中专学校还发起组织义勇军，聘请退伍、转业军人进行军事训练，设立救护处，请医药专门学校派人训练救护知识。此后，商人救国义勇军、民众志愿义勇军等组织也先后成立，沪杭甬铁路员工提出全线员工投入军事训练、担任护路任务、不为日本人干活等倡议。

11月25日，杭州、上海、北平等地万余名学生齐集南京游行、请愿。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其一贯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南京发生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南下请愿团事件。17日再次制造了“珍珠桥惨案”，激起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怒。惨案发生后，杭州学生召开追悼大会，悼念2名杭州殉难学生。

杭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救亡文化的兴起。各界青年纷纷组织各类文艺活动社团，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激发民众爱国、救国热情。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地的一些中共党员和文化界人士陆续疏散到杭州，联络杭州的进步分子和抗日爱国人士分别组成杭州左翼作家、艺术工作者、剧作家等联

盟。5月，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五月花剧社成立。剧社先后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排演了田汉、楼适夷创作的各种进步剧目。省立杭州师范学校白煤学社、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木铃木刻研究会、萧山湘湖师范学校喈喈歌咏团也是当时杭州较有影响的进步文化组织。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序幕。以学生为主的杭州各界群众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与这一时期的抗日文化运动相呼应，在各阶层群众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声援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12月9日，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6000余名学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宣布总罢课，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得到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浙江大学学生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并通过发出通电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呼吁全国各校一致响应、联合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发起组织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等6项决议。11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牵头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声援一二·九运动。当天，全市16所大中学校学生与部分教师、工人、船工、店员和市民共1万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大会”，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反对华北自治、释放被捕同学等，并决定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以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日，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宣布成立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市学联），推选浙江大学学生代表施平担任市学联主席。

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国民党浙江当局调动大批特务、警察，采取包围学生集会会场、封锁各校不准学生外出、监视市学联代表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等手段，多次进行阻挠和破坏。

12月16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时遭到军警镇压。市学联闻讯后，决定组织学生代表于21日赴南京请愿。由于走漏消息，国民党当局急令各校立即实行戒严，严禁学生自由出入，并在21日凌晨逮捕学生代表12名。21日清晨，浙江大学千余名学生按计划直奔城站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去南京。浙江农学院、杭州高等工业学校等校的学生也闻讯赶来。国民党浙江当局调集2000余名军警、特务在城站四周架起机枪予以威胁，并把车站所有机车调到站外，使学生无法离杭赴宁。学生们高呼“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车子一天不开，我们一天不离开”等口号，在铁路上与军警对峙。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市民、店员给学生送来饼干、茶水等，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到下午3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被迫派人与学生进行谈判，答应学生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向学生公开道歉、承认市学联为合法团体、开放杭州的新闻自由等全部条件。

杭州青年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有力宣传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杭州地区的活动

1933年9月，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作战连续失利，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吸引调动和牵制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1934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皖赣边区一面实行外线作战，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面宣传党的抗

日主张，发展抗日救亡运动。

7月，原活动于福建闽江下游地区的红七军团奉命返回中央苏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7日晚，先遣队从瑞金誓师出发，一路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穿越闽境进入浙西。9月17日，先遣队从常山进入遂安白马。面对先遣队的到来，国民党遂安县政府急忙调兵增援，浙江保安总队总指挥俞济时也亲自赶到遂安县城指挥堵截。先遣队及时调整部署，放弃攻占遂安的计划，改向皖赣边境突围，并于22日在送驾岭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60余人后成功突围。25日上午，先遣队转头南下复从坑口北上直插白际，于27日晨再次进入淳安，当天抵达开化县左溪一带活动。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迅速转移到赣东北苏区修整补充。11月，抵达赣东北苏区的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整编为红十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两个师，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整编后，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红二十师出皖南，寻淮洲率红十九师出浙西。11月23日下午，红十九师经由常山再次进入白马。翌日，与国民党浙江保安总队5个营在白马展开遭遇战，歼敌100余人，随后抵达淳安港口镇，开展抗日宣传、逮捕土豪劣绅等活动，并将收缴的布匹、食盐、铜板等分发给群众。27日拂晓，红十九师横渡新安江抵达淳安临岐，开始准备袭击分水县城的战斗。29日上午10时，红十九师一部由分水县合村沿天目溪西岸直奔分水县城，行军途中与国民党补充一旅遭遇，激战4个多小时。30日上午，红十九师一部又在盘龙山、金紫山先后阻击攻击前进的国民党部队。分水战斗前后历时一昼二夜，肉搏4次，歼敌130余人，红十九师牺牲战士15名。

分水战斗结束后，红十九师开往昌化方向。12月1日，抵达昌化县湍口镇。红军抵达昌化，直逼临安，威震杭州。国民党当局除令驻浙各部加紧追堵外，还调派安徽保安团向昌化开进。2日下午，在昌

化西部边境猴头，红十九师与安徽保安团在马头山展开激烈的肉搏战。3日凌晨，红十九师主动撤离马头山阵地转入安徽境内，与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红二十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会师。12月中旬，因谭家桥一战失利，先遣队遭受重大损失。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1月，先遣队（红十军团）在闽浙皖赣边界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进行了大小30多次战斗，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1935年1月8日，先遣队再度转入遂安县境。9日晚，方志敏等先遣队领导人在中洲镇茶山村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史称“茶山会议”），确定全军返回赣东北苏区暂行修整，然后再实施向浙西南行动的方案。翌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南下赣东北。先遣队的归途，总长虽不过200里，却十分凶险。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先遣队，动用十几万军队围追堵截，形成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封锁线。从10日起，部队在七天内遭到四次阻击。在怀玉山战斗中，除粟裕、刘英率领的先遣队800余人及少量部队突出重围外，主力部队损失殆尽，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至此，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宣告失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遂安、淳安境内以及分水、昌化、寿昌等地先后转战20余天，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镇压土豪劣绅，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先遣队北上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在皖浙赣边境调动和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中央工农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也为以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留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曲折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两次杭州之行，对于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加强浙江地区的国共合作等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包括杭州在内的浙西地区

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又重新恢复建立起来，并领导杭州人民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

国共杭州谈判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1937年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开始正式会谈，由于国民党缺乏联合抗日的诚意，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此，中共中央授意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3月22日，周恩来从西安乘飞机至上海，与宋美龄会晤，将拟定的中共中央15条谈判建议转交蒋介石。25日，周恩来抵达杭州，下榻西湖边的“柏庐”别墅，分别在杭州西郊烟霞洞及莫干山等地与蒋介石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立场，即在民族解放、民主开放、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纲领基础上，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合作，绝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污蔑。同时，周恩来也坦率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提出两党合作的几点具体要求。

面对周恩来的坦诚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蒋介石口头承认中国共产党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等局面。他表示，国共合作关键是“领袖”问题，领袖问题一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解决。最后，双方商定由中共起草一个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蒋介石原则接受中共关于红军及苏区问题上的要求，并同意继续会谈。

国共双方的杭州谈判虽然在陕甘宁边区的设置、红军改编后的人数等实质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但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双方渐趋一致，蒋介石也作出了同意国共合作的表示，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4月2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汇报了杭州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尚好”。此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形势发展，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继续在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开展进一步的谈判。

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急欲调动工农红军开赴前线，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合作的愿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杭州文化界首先起来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员刘保罗、张三扬、邵荃麟等左翼文化界人士邀集来自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戏剧工作者、杭州青年学生和市区职业青年组织浙江流动剧团，排演《保卫卢沟桥》等抗日救亡剧目，并赴浙西、浙东巡回演出。浙江大学学生组织“黑白文艺社”“黎明歌咏团”，在校内外教唱进步歌曲，并举行劳军公演、抗敌除奸漫画展等。中共党员王闻识等创办抗日刊物《战时生活》旬刊、《中国儿童时报》，浙江大学师生联络市区文教团体编印《抗敌导报》五日刊、《国命旬刊》《每日壁报》《抗敌三日刊》《浙大学生战时特刊》等，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

浙赣铁路工人配合战事需要，全力运送军火，支援前线。浙江大学、杭州艺专、之江大学、杭州医专等校学生及杭州青年会分别组织慰问团，赴上海前线慰问抗日军人。商界发起对敌实行经济绝交运动，召集商会及各业同业公会代表，成立“不买卖敌货运动委员会”。沪杭铁路工人发表《告全世界铁路工人书》，呼吁世界铁路工人抵制日货，拒运日本物资，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9月18日，全市各界群众分别举行“誓死抗倭到底”宣誓仪式，参加人数达10万

以上，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一律下半旗沉痛纪念九一八国难日。此外，市区各界还纷纷开设救护训练班，组织战时服务队，担负后方勤务；发起收集废铜铁运动，供政府制造武器；征募麻袋10万余只，送往淞沪前线构筑工事。

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分路由浙西和上海两个方向向杭州进攻。12月16日起，国民党浙江省和杭州市各级党政军机关和许多抗日团体陆续撤离杭州。23日，余杭县陷落，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24日，日军由杭州城北武林门、城东清泰门、城南凤山门3个方向攻入市区，杭州陷落。同日，富阳县、杭县亦相继沦陷。日军入侵杭州地区后，大肆屠杀平民，掠夺战时物资，制造乔司大屠杀、午潮山惨案等惨绝人寰的恶行。日军还以笕桥机场为基地，多次出动军机对杭州所属各县实施轰炸，其驻杭陆军部队在其控制区内及各县未沦陷地区反复进行扫荡、袭扰，并与各县抗日军队和游击队交战。

杭州地区党组织的重建

杭州沦陷后，为了加强对群众抗日活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开始重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拘押在江苏、浙江等地国民党监狱中的大部分政治犯获释。其中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狱的党员朱镜我受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托，与张三扬及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狱的党员邢子陶（又名邢阿根），从国民党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出狱的党员张崇文、徐洁身等人到达杭州后，担负起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和重建浙江党组织的任务。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皮市巷成立，徐洁身任书记。之后，又于1938年2月和5月，先后在金华和平阳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浙江临时省委。1938年9月，经中央批准，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下设浙南、处属、台属、宁绍、金衢5个特委，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浙江省级组织的成立，填补了土地革命后期浙江全省各地抗日救亡

运动缺乏统一领导核心的政治空白，推动了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和健康发展。

日军占领杭州后，天目山成为保卫浙西和皖南的前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党在杭州各县的地方组织被破坏殆尽，工作停顿，一批因各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团员散落于当地城乡。从1938年初起，临时省委及各特委分别派遣党员，与当地政工队中的党组织联合在城镇、山区、农村和文教团体内开展活动，逐步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批基层组织。1938年5月，临时省委在金华成立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浙江地方队部，同时要求各级组织“加紧青年运动”，领导建立“民先”各县临时队部。根据临时省委要求，中共宁绍特委、金衢特委、浙西特委等先后在天目山区和富春江两岸联络旧关系，开辟新局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当年，临安、於潜县（今属临安）先后建立中共余临孝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和横路两个党支部。

为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开展党的各方面工作，打开浙西局面，1939年初，中共浙江省委在金华召开会议，讨论开辟浙西工作、组建中共浙西特委等问题。1939年2月，中共浙西特委在安吉县成立，负责杭州、临安、余杭及浙西其他各县党的工作。不久，浙西特委移驻於潜县鹤村民族日报社内，一方面相机开展武装斗争，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特委委员贺千秋以《民族日报》记者身份，先后组建中共盛村和天目两个农村支部。同时，在余杭县、临安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二大队一中队，也经浙西特委同意，建立特别支部。在特别支部进一步发展下，中共祝家湾支部、中共浙西一中支部分别建立。到1939年底，特别支部系统已有支部2个、小组1个，党员60余人。

中共金衢特委及下属党组织也陆续派员，联合各县政工队内的党员在富春江沿岸各县逐行开辟工作，秘密发展人员成立“民先”地方

队部，有组织、有系统地培养骨干。到1939年夏，先后建立富阳县下图山、小剡两个农村支部；恢复发展了建德县的党组织，成立“民先”建德县队；成立中共寿昌县民教馆小组；打入淳安县、遂安县，在两县政工队内开展工作。省工委、新四军温州通讯处、中共宁绍特委也分别陆续派遣党员到萧山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组建了拥有200余人的“萧山县抗日自卫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萧山特别支部，不久又发展为中共萧山县工委。县工委在新湾、头蓬、南阳等沿江乡村建立了3个支部，后逐步扩大为10个支部，拥有党员60余人。

到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对杭州各县（区）工作的初步开辟，使沉寂数年之久的中共杭州地方组织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党的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当地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核心力量。

杭州地区的战时政治工作队

杭州沦陷前夕，抗战意志比较坚决的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采取了一些顺应抗日潮流的政治举措，促进了抗战前期浙江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在中共党员的建议下，黄绍竑决定在全省各地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并在萧山、富阳、桐庐等县分别任用爱国人士担任县长，主持组建各县政工队事宜。在中共党员的参与组织下，杭州各县政工队先后建立。

随着政工队的建立，中共金衢特委、宁绍特委、浙西特委分别派遣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各县政工队，并在政工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或特别支部。1938年底至1940年，政工队杭州各县县队相继建立中共党支部；在临安县、余杭县和杭州市郊一带活动的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通过政工队的活动，杭州各县的抗日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各县政工队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影响下，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准则，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致力于提

高人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坚定民众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在余（杭）、临（安）边区组建“民先”队、读书会、青年救国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抗日救亡组织，个别队员甚至深入敌占区建立抗日组织，创办地下刊物。建德县、寿昌县政工队在开展宣传的同时，组织起“民先”队，在洋尾乡、三都乡发展队员。萧山县政工队与萧山县第二流动施教团、县民教馆合作，组织歌咏、文艺演出队，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定期举办抗日建国训练班。萧山县城沦陷后，县政工队又组织敌后工作队参加对日军作战。富阳县政工队在江南各区乡镇召开民众会，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协助“难民救济协会”劝募财物，向江北沦陷区赈灾，并在1938年8月配合当地驻军反攻县城。桐庐、淳安等县政工队发动贫雇农开展夺田斗争，抢收租田，发展、组织战时妇女团，演出街头剧、话剧，组织抗日募捐活动，组织、训练民众参加粮食生产竞赛，参与修筑道路，发动志愿兵入伍等。

这一时期，各县政工队在中共党组织参与下，已成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战、组织领导农民推行“二五减租”及展开对敌斗争等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和萧山、富阳等县政工队，因为党的力量较强，实际上已成为党的群众工作队。对此，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①。

周恩来西天目之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日益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

^①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初期（上）》，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共”“防共”“限共”等一系列反共方针，在国统区全面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对黄绍竑奉行统一战线原则、实行开明举措极为不满，向国民党政府不断提出控告，并对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加以限制和迫害。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月，受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并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21日，周恩来抵达於潜县。当晚在出席国民党浙西行署、於潜县政府中级以上官佐谈话会时，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形势，号召统一意志、精诚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之后，周恩来在黄绍竑的陪同下抵达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驻地，与黄绍竑就团结抗战、巩固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商谈并达成口头协议：中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内发展党组织；不在其后方地区发展武装组织；在抗战中遇有问题，由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代表中共方面同黄绍竑直接商量解决。24日，周恩来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向参加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的全体师生、浙西行署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政工队队员约1500人发表演讲，高度评价浙江地区的抗战成绩，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

离开西天目山后，周恩来顺道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26日抵桐庐，在县府礼堂向县政工队、妇工队、机关团体200余人发表演讲，称赞桐庐“确系战时前进之县”。下午，周恩来乘舟至窄溪镇，与国民党区署职员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能胜利，但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全国同胞必须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军民协力，共赴国难，争取最后胜利。27日，周恩来经富春江水路至富阳县中埠登陆，步行至大源镇省抗敌自卫团一支队司令部，勉励自卫团官兵继续努力，早日收复杭嘉湖。下午，周恩来离开富阳去绍兴，途经萧山县临浦镇，在视察沿岸江防后，与各界人士座谈，勉励大家共赴

国难，坚持抗战。之后，周恩来经绍兴返金华，向中共浙江省委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周恩来的浙西之行，对进一步巩固浙江的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浙江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以及坚定群众的抗战意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富春江两岸的抗日武装斗争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了诱降政策，国民党开始接连掀起反共高潮，使党领导的抗日活动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活动，中共杭州地方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反顽斗争，为浙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逆境中坚持抗战

随着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浙江，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查禁或改组各类群众抗日爱国团体和文化团体，要求撤销地方抗日武装的政治指导员，监视和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取消或改编政工队、强迫政工队员集体参加国民党，两度改组民族日报社、迫使党组织在报社内的活动完全中止。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地下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杭州各县党组织遭到抗战以来最严重的破坏。

面对国民党当局猖獗的反共活动，从1940年10月始，中共中央东南局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的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针，开始独立自主领导武装斗争。中共浙西特委以宁杭国道为界，建立浙西和浙西北特委，将一批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撤退转移。1941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特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提出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停止党员组织生活，对立场坚定的党员保持个别联系，对意志薄弱的党员暂停接触等措施，要求所有党员都应有公开职业为掩护。

杭州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方针，努力发展党员，恢复或建立县区领导机构，并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影响或掌握更多的进步抗日群众团体。民族日报社改组后，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文化活动的中心，转移到浙西民族文化馆、浙西民族剧团、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等“一馆三团”。尽管“一馆三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内部也都未建立党组织，但在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同样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掩护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党在杭州城区的工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42年7月，中共上海工委派王惠民到杭开展工作，与先期来杭的上海工委系统党员胡天民、金秉礼组成党支部，王惠民任书记。9月，王惠民回上海汇报工作，随即调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支部也随之取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先后派遣党员到杭州城区开展工作。1943年中，中共上海工委系统党员严维勤来杭，与先期从上海转到杭州华中铁道自动车区等处工作的党员徐远芳、包德贵组成交通支部。支部利用运输业活动范围广的特点，在杭州、萧山、绍兴等地运输工人中成立工人俱乐部、开展经济互助、团结救济失业贫困工人等。1944年秋，上级将该支部关系转由华中局城工部张承宗联系领导。

1943年5月，中共浙东区党委^①派柯里、张幼云、林曼云到杭州建立基点。柯里等人根据上级“找到职业，了解情况”的指示，在杭州站住脚跟，并建立中共杭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市临工委）及一个下属支部。7月，中共太滬地委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到杭州开展工作。通过当地党员介绍，罗希明结识并陆续发展虞振辉、郑迈等一批市区进步职业青年入党，并在当年冬组成城区支部。杭州城区这些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按照党的隐蔽工作方针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为开展杭州市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党的影响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942年6月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浙赣战役爆发后的浙东形势，命谭启龙、张文碧及新四军一师部分干部赴浙东，组建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和浙东抗日武装，并与浙东、浙西等地党组织建立了联系。6日，根据浙东军分会的决定，蔡群帆率南进支队200余人挺进会稽山，在浙赣铁路以东建立了以诸暨枫桥为中心的会稽山游击根据地。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为书记，下辖会稽等4个地区工委。

1943年12月，浙东抗日武装一部与金义八大队等部会合，成立中共金萧地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在包括萧山、富阳、建德、桐庐等15个县的区域内，开展金萧铁路沿线两侧游击战争，建立金萧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月底，新四军军部命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在金萧地委领导下，金萧支队领导诸北、诸义东和金义浦兰抗日根据地的武装积极开展斗争，相互配合支

^① 1942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浙东区党委和游击司令部，建立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持，给日伪和国民党顽军沉重打击，开辟了路西（浦江、诸暨、萧山、富阳、桐庐五县边境）新根据地，面积达千余平方公里，人口达18万。

1945年初，浙东区党委决定将金萧支队两个大队充实到浙东游击纵队，并抽调八大队、坚勇大队和诸北自卫大队各1个中队、200多人枪建立新的金萧支队，巩固和扩大路西抗日根据地。金萧地委和新组建的金萧支队据此要求，西进浙赣路西，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武装，先后在诸暨、浦江、萧山、富阳、桐庐五县边区建立路西工委和金萧支队路西办事处，组建诸暨、萧富两个大队及路西武工队。支队和各地方武装不断出击，拔除了一批日伪据点，控制了浙赣铁路以西至富春江边的广阔地区。

新四军两渡富春江

1944年9月，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要求开拓苏浙皖地区工作，特别是打通浙东、浙西，加强浙江工作。1945年初，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并接连取得浙西两次反顽自卫战胜利，基本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建立了包括余杭、临安、富阳等十余县的浙西抗日根据地。不久，余杭、临安、富阳分别建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为抗日救亡、扩军支前、承担军需保障等提供了保障。

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余杭、临安、富阳三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配合下，1945年5月20日，苏浙军区派遣四纵十一支队成功渡过富春江，控制了富春江北岸，打通了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新四军南渡后，国民党第三战区急调大批顽军紧急开进新登县（今属富阳），构筑大批碉堡工事，妄图分割歼灭驻留于富春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苏浙军区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展开新登战役，打破封锁。

此时，新登东北至富春江沿岸纵横十余华里之地已为苏浙军区一纵部队控制。29日，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等率领第一、第七、第十

支队共计7000余人从临安县出发，午夜抵达新登北部，当即分左、中、右三路展开战斗。至31日，各路相继扫清新登外围顽军，并将援敌军顽强阻击于战线之外。6月1日下午，新登攻城战打响。至2日8时，新登攻克。3日，桐庐方向来援的顽军开进新登西南，与苏浙军区第十支队等部激战，企图夺回新登。第十支队经过彻夜激战，歼灭敌人有大量有生力量。4日，鉴于顽军又调来两个师向新登靠拢，苏浙军区新登参战部队逐步向新登县城收缩。傍晚，各部撤离新登县，向临安县转移，即行北返。十一支队也奉命由路西经新登向天目山北转移。新登战役历时6天，共歼灭顽军2200余人，新四军伤亡900余人。

1945年6月浙西第三次反顽自卫战胜利后，为会同二纵组织会稽山战役，扫除浙赣路两侧之敌，实现挺进浙南和闽赣战略计划，苏浙军区命四纵主力再渡富春江。7月27日，四纵纵队部及第十、十一两个支队和部分去浙东任职的干部共5000余人南出孝丰。8月1日晨，四纵顺利渡江。当日晚，十一支队前卫二营在场口镇芳泉村与前来截击的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击毙日伪军30余名。4日，四纵与前来接应的二纵三支队、金萧支队再度会师于富阳县大章村。此后，二纵三支队返回浙东，四纵机关及十支队南下金华、义乌、浦江，十一支队则在当地武装配合下，分散活动于诸萧富边区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路西根据地，使路西地区的党组织和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发展。

至此，以富阳窈口、场源等区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东西80华里、南北100华里、人口20余万的广大区域，先后建立过5个区委、区署及20个基本乡、3个游击乡，在新四军两渡富春江期间，为部队提供军粮20多万斤。新四军两渡富春江战略行动成功后，浙西、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地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杭州地区抗战的胜利

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斗

争，1945年8月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下达对日军反攻和受降等七道命令，新四军军部同时任命叶飞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指示苏浙军区迅速转入战略反攻。

新四军苏浙军区立即向战区内日军发出通牒，命令其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在原驻地点听候处置，如逾规定时间拒绝投降及破坏军械物资者，即予坚决消灭。南下路西的四纵各支队也于12日起奉命集结，14日至15日渡富春江经临安县，北返浙西。8月7日起，苏浙军区各纵队分别由浙西、苏南一线向日伪军发动战略反攻，收复北起宁沪路、东达太湖、西至宣芜公路、南抵天目山的广大地区，总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0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发展至5万余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控制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广大农村山地的战略任务。同时，浙东纵队及其下属的金萧支队等部也开始对当地日伪军发动反攻，至9月初，基本扫清三北、宁波外围和路西等敌。

为了迎接苏浙军区大军解放和接管杭州，中共上海职委、苏浙区党委在杭的党组织分别按照各自的上级组织要求，积极展开宣传和情报收集工作，调查敌伪重要机关、军队的驻地和人员装备情况，做好配合部队解放、接管杭州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杭州各地群情振奋，用各种方式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第三舰队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3日，杭州数十万市民在爆竹声中庆祝胜利。但是，中国战区的受降，在美国的粗暴干涉下，剥夺了根据地抗日武装代表受降的权力。日本签字投降后，蒋介石即派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在国民政府划定的15个受降区中，浙江省属第六受降区。

1945年9月4日，日本陆军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代表师团长野地嘉平抵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国民党第三战区前进指挥部驻地洽降。洽降礼堂正中高挂中国国旗，日旗则半悬于一侧。日军代表向中方人员呈报驻浙日军态势、指挥系统、大队长以上主官名册及在杭日侨人数。中方向日方发布第三战区关于驻杭州地区日军、日侨集中地和中方进驻杭州受降事宜等项指示。次日，野地嘉平派代表至杭州郊外迎接中方人员进驻市区，杭州人民集聚街头热烈欢迎。8日起，中方全面接管市区各行政、文化、交通、通信等机关设施。16日至18日，中方接受日军第一三三师团、第九十九旅团、第六十二混成旅团缴械完毕。至此，杭州人民终于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沦陷期间，日军的残酷统治给杭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全市的工农业、商业交通业、教育文化事业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倒退多年，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广大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贫困程度更为加剧，人民的生产、生活更为困难。杭州地区抗战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胜利，也是杭州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胜利。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杭州的胜利

本章提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内战爆发后，按照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隐蔽精干”的方针，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杭州地方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农村开展以金萧支队为核心的游击战争。三大战役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委领导下，广泛开展保护城市的斗争。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和地方党组织、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1949年5月，杭州城区和周边各县陆续解放，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一、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与高涨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实现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主张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立场，坚持实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镇压农民、工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杭

州，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胜利后隐蔽精干方针的贯彻

针对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1945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地区；南方八个解放区部队撤退时，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建立秘密游击队；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尽可能留下隐蔽力量，并派遣大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工作，团结群众开展合法斗争。

按照中共中央实行隐蔽精干、争取国内和平的方针，9月下旬，杭州富春江两岸和天目山区执行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作战任务的苏浙军区四纵各部，中共富阳、临安、余杭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地方武装临余支队的全体军政人员，有序撤往苏北。北撤前，按照浙东区党委要求，中共金萧地委和金萧支队队部决定任命蒋忠、蒋明达为中共路西特派员（主要活动地区为浙赣路以西的富阳、萧山、桐庐及诸暨等县边区）和中共诸北特派员，由中共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领导，并指示他们执行依靠山区、依靠群众、依靠内部团结，保存力量、保存干部，坚持革命旗帜，求得适当发展的方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部队迅速进入杭州周边各县及整个金萧地区，恢复区、乡、保、甲四级地方政权，富阳、桐庐等县国民党政府配合国民党部队进行疯狂的清乡清剿，残害、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大肆抽丁、征粮、收税、派款等，把昔日生机勃勃的敌后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

金萧（路西）地区留在原地转入地下斗争的同志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吓倒，在马青、蒋明达和蒋忠等的领导下，他们通过秘密串联的

方式联系党员，努力恢复新四军北撤后一度停滞的杭州各地农村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同时，他们积极对原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抗战时期的统战对象开展工作，为后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打下基础。此外，他们还开展一系列抗暴除霸斗争、扩大武装、开辟新区的斗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恶势力的嚣张气焰。1946年1月，随着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国出现走上和平民主道路的趋势。路西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关于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不轻易动用武装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斗争策略，停止路西地区的公开武装活动，把工作重点转入寻找、考察地方党员和整顿地方党组织，并在轻便武装保护下秘密工作，准备合法斗争。

随着杭州地区各县农村党的地下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市区党的力量得到调整和加强。根据中央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精神，1945年9月北撤前夕，浙东区党委派王槐秋、方晓、方琼等人秘密进入杭州，与市临工委书记柯里会合。1946年3月，市临工委改组为中共杭州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由王槐秋任书记，组织联系暂由“三东”（镇海、鄞县、奉化三县东部）特派员负责。不久，原属中共苏皖区党委太漏地委浙西特派员在杭州建立的党的点线关系和基层组织亦划归市工委领导。与此同时，中共上海职委系统所属杭州党组织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先后在铁路、机场和店职员中发展8名党员，成立铁路支部、店职员支部和活动于杭州、绍兴两地的交通支部，共有党员16名。1947年6月，中共杭州市工委改为特派员制，特派员柯里，副特派员方晓，10月划归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1948年12月，杭州市工委建制恢复。

杭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党组织在隐蔽精干的方针下，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组织调整，充实并加强了党的力量，为以后党的组织发展壮大、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从反甄别斗争到抗议美军暴行

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通过所谓的《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宣布沦陷区的中等以上学校为“伪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和任教的教师是“伪学生”“伪教员”，需对他们进行甄别考试，否则不得就学、从教等。这一严重歧视沦陷区广大师生的反动措施，很快遭到沦陷区人民的强烈反对。杭州的学生情绪激昂，省立杭州女子中学、杭州市立中学在党员教师夏汝南、余巾英的启发组织下，私立海星女中在党员教师方琼的启发和进步学生带领下，积极通过罢课、游行、请愿、街头演讲、校内辩论等形式，控诉国民党当局迫害沦陷区学生的罪行，反对国民党要求学生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要求撤销甄别考试、改革校政、改善教学条件等。通过斗争，学生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反甄别斗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使广大青年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独裁、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并在思想觉悟、活动能力和斗争方式上得到锻炼。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开放沿海及内河航行权。面对国民党当局严重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6月10日，浙江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等校学生开始罢课。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在浙大本部召开，决定12日起各大中学校一律罢课，13日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并成立杭州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市学联）统一领导这次斗争。13日，全市2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5000余人先在省民众教育馆广场集会，声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著名爱国人士、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还“一马当先”，与大会主席团成员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与学生队伍一起游行。“六一三”游行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师生的迫害，杭州师范学校等五校学生又联合开展“要吃饭、要读书、要活命”的请愿、静坐活动，并推派代表交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六一三”全市学生抗战示威大游行，显示了杭州学生大团结的力量，标

志着学生思想觉悟和组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杭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迅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29日，浙大文理学院的“民主墙”上贴出墙报，披露美军暴行，并呼吁学生起来斗争。在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由进步力量领导的浙大学生自治会迅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抗暴委员会，领导抗暴运动，并派学生与上海学生抗暴联合会联系，共同进行斗争。3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揭露美军暴行，痛斥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无耻行径，决定罢课游行。1947年1月1日，浙大和医专、之大、艺专、杭高、杭师、浙大附中等校学生2500余人，举行要求“撤退美军、制止内战”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并在湖滨公园等闹市口张贴标语、漫画，广发传单。此后，1月3日、18日至20日，浙大学生又先后罢课4天，并组织宣传队进行街头宣传。杭州抗议美军暴行斗争，使杭州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多数中间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内战独裁的反动本质，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作为杭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主力的浙大进步学生，在斗争中也得到锻炼提高，为此后迎接新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政策，物价飞涨、政治黑暗，出现重重危机；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纷纷发起各种形式的斗争。

面对投机奸商的囤积居奇和国民党政府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1946年2月24日，杭州爆发解放战争期间的首次打米店风潮，大批愤怒的市民打砸米店、哄抢大米、打击奸商，斗争之火烧遍全城，共捣毁米店200余家。此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采取一些措施稍平民愤，但飞涨的粮价和人为的粮荒，仍令广大群众忍无可忍。1947年5月和

1948年11月，杭州再次两度发生全市性的打米店风潮，捣毁米店数百家，并带动南京、上海、嘉兴等省内外多个城市掀起打米店风潮。杭州群众自发掀起的打米店风潮深刻反映了广大市民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是杭州群众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市人民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市民掀起自发斗争浪潮的同时，杭州各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党组织的领导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下迅速兴起。1945年9月中旬，杭州皮鞋业工人实行全体怠工，抗议物价飞涨，要求增加工资，成为抗战胜利后杭州爆发的首次工人斗争。此后，在杭州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杭州光华火柴厂1500余人向国民党杭州市政府请愿，要求保障工人生活。杭州铁器、丝织、印刷、店员等各业工人冲进国民党市党部，要求改善生活。1947年1月开始，杭州工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求生存”的罢工请愿斗争。整个5月，各业工人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几乎席卷杭州所有的工商部门，参加人数达4万多人次，形成“五月斗争”风暴。“五月斗争”风暴后，杭州工人继续为争取生存权利、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斗争，到1948年下半年，再次掀起有数万名工人参加的全市性罢工斗争，并连续开展了4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

5月20日，为反对内战、独裁，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师生生活，杭州和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学生代表6000余人汇聚在南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举行请愿游行。国民党军警镇压各地请愿学生代表，造成“五二〇”血案，引起全国各地学生的激愤。24日，杭州的浙大、杭高等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3000余人举行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示威游行。数十万市民夹道观看，纷纷对学生的行为表示支持。游行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偷袭杭州高级中学，勒令之江大学大批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退学，解散市中学生自治会。为避免进步力量遭受损失，

在党组织引导下，学生们决定改无限期罢课为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

杭州社会各界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动摇了他们在杭州的统治基础，标志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于子三运动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为了稳住后方，对国统区内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日趋残酷。10月26日，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4名学生。29日，于子三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被害。事件发生后，浙大党支部、浙大学生自治会先后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营救措施，并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同时，浙江区学联和全国学联或就此事件发表书面谈话，或作出决议，号召全省、全国各校开展一场反迫害斗争，以击退国民党的猖狂进攻。30日，浙大1200余名学生胸配白条、高举于子三巨幅遗像和“冤沉何处”“精神不死”白布黑字大横幅进行游行，再度点燃了“反迫害、争自由”的火炬。11月初，浙大师生员工举行罢教、罢课、罢研、罢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浙大校长竺可桢赴南京争取营救被捕学生和为于子三昭雪，并向《申报》《大公报》记者发表重要谈话，说明于子三惨案的真相。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文章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残杀无辜青年、进行新闻封锁、隐瞒惨案真相等罪行，并把浙大反迫害斗争的真情通告全国。

于子三被害后，中共中央上海局派洪德铭到杭与浙大党组织会商，提出“反迫害、争自由、求生存”的口号，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有力的反击。按此部署，从11月10日起，浙大学生罢课一周。在此期间，浙大学生自治会举办了于子三遗物展览，怀念、哀悼、公祭于子三和散发传单等一系列活动，使杭州主要的大中学校学生进一步了解惨案真相，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

欺骗宣传，使反迫害之火燃遍全市及省内各地，把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浙江医专、杭高、浙大附中等大中专院校学生也纷纷罢课、发表抗议宣言、寄慰问信和捐款，并不顾当局和反动校方的禁令，派数百名学生代表参加浙大为于子三举行的哀悼晚会和公祭大会。宁波、温州、绍兴、金华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以罢课、来电、来函等形式声援浙大的斗争。

于子三惨死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全国一些大中学校。北平、上海、天津、武汉、长沙、昆明、重庆、西安、兰州、厦门、福州、台北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以罢课、集会等形式进行声援和响应。各种形式的罢课、声援活动席卷了国统区20多个城市的大中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达10万余人，进行游行、集会，发表声明抗议和函电慰问、捐款的人数达15万人以上。远在瑞士的国际学生联合会也在11月25日专门给浙大学生自治会来信，表示“国际学生联合会将尽一切力量支持中国学生的英勇斗争”。

到1947年底，于子三运动步入最后阶段，党组织决定及时做好于子三的出殡工作，使整个运动顺利结束。1948年3月14日，浙大各院系代表300余人组成出殡车队，在“学生魂”巨幅挽幛和“于子三烈士千古”花圈的前引下，将于子三灵柩安葬在凤凰山北麓的万松岭南坡。

于子三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爆发于杭州、扩大至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二条战线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但使蒋介石在1947年部署的全面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彻底破产，而且与第一条战线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教育和锻炼了群众，帮助他们清除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幻想，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在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杭州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展群众性武装。

金萧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浙江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有利的可以发展的地区，组织武工队和群众性武装，特别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据此部署，蒋明达、蒋忠等率领新四军北撤后留下来的地方组织、游击队等逐步向浙赣铁路以西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2月，活动在路西的各支武装力量整编成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在诸暨、富阳、浦江边境开展反“清剿”斗争，并在同山、马剑、紫阆、亲贤等乡保中建立“两面政权”。7月，按照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指示，中共路西工作委员会（简称路西工委）成立，蒋明达任书记。

针对国民党当局即将开展对富阳、萧山、桐庐等八县的“围剿”，路西工委决定大量建军，创建游击根据地，在部队建立党组织等。按此精神，路西工委委员分头开展活动，在八九月间，分别成立中共路东、路西和金义三县工委和政府，其中路西县的范围主要在萧山、富阳、桐庐、诸暨、浦江五县相连地区，蒋忠担任路西县工委书记兼县长。7月15日，活动在金萧铁路两侧的会稽山抗暴游击队和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顺利会师，以此为基础，路西工委决定成立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简称抗暴）。在路西工委领导下，到1948年3月，抗暴主力和路西武工队先后袭击国民党富阳县盛村、大源警察所，剡源、儒城乡公所，围攻位于富阳、诸暨、浦江三县边境的敌军据点，歼灭国民党浦江县第四督导区联防队，捣毁国民党浦江县警察局中余分驻所，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救近百名壮丁，

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方恶霸，粉碎了敌人的“八县围剿”。

“八县围剿”失败以后，国民党当局又调集力量对富阳、桐庐、萧山、诸暨、浦江开展“五县围剿”。为粉碎敌人的“五县围剿”，路西工委决定跳出包围圈，避强击弱，实行外线出击。5月，抗暴主力分南北两路出击，抗暴二大队沿富春江南下，沿途摧毁岩桥、窄溪、石阜、深奥等地国民党乡镇政权；抗暴三大队向萧山、富阳、诸暨三县边境挺进，先后击溃国民党富阳县自卫队、富阳县保安警察队，捣毁大源警察所等。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国民党的“五县围剿”被打破。为巩固胜利成果，6月下旬，中共江东县工委、县政府在浦江县塘卜村成立，主要活动范围为桐庐、建德、浦江、兰溪四县边境地区，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抗暴游击支队。

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不甘失败，很快又开展富阳、萧山、诸暨“三县围剿”。为打破围剿，七八月间，抗暴游击支队再次跃进到外线作战，主力到桐庐、建德一带先后捣毁国民党桐庐县警察局芝厦分所，击溃国民党建德县保安警察队、浙江保安司令部突击中队、建德县保安警察队常备二中队等，路西武工队袭击国民党萧山县戴村警察所，打破国民党的“三县围剿”，极大地鼓舞了敌后群众的斗志。

为加强工作，9月，路西工委召开主力部队和路西、江东两县军政干部大会，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简称金萧支队），下辖第一大队（金萧主力）、第二大队（路西县主力）、第三大队（江东县主力）。12月，浙东工委同意路西工委更名为中共金萧工委，张凡任书记。金萧支队成立后，其所属的金萧报社、被服厂、修械所、后方医院等后勤单位先后转移到桐庐县四管乡的旧庄、湖田、山桑尖等一带的高山密林中，四管乡也由此成为金萧支队活动的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0月初，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组织力量对金萧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敌情，金萧支队连续进行了第三、第四次外线出击，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而且狠狠打击

了根据地周围的敌人。

金萧支队四次外线出击和各县地方部队的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力量，使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富阳、桐庐、浦江、诸暨四县毗邻地区为中心，涉及萧山、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临安及金华、绍兴、湖州部分县，包括浙赣铁路萧山到衢州段西侧广阔地区的金萧（路西）游击根据地，为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杭州地区各县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金萧支队在杭州地区的武装斗争

1949年1月，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下，金萧工委提出“大刀阔斧，放手发展，雷厉风行，加速工作”的方针，决定在富春江以西，徽江以北，分水江以南，直至淳安东部之桐庐、建德、分水、淳安边区新开辟（富春）江西游击区，以控制皖南至浙西及浙东的战略通道。26日，金萧支队组成特遣中队西渡富春江，进行第五次外线出击，部队经桐庐、建德、淳安进入安徽歙县与苏浙皖赣人民解放军皖浙总队会师。回师途中，特遣中队在赵家坪、三溪口、大老坞口、涿渚和富春江边与敌五战五捷。为巩固斗争成果，特遣中队到达淳安县后，留下部分力量组成江西武工队，在建德、淳安、分水、桐庐四县边境开展武装斗争。2月4日，金萧工委决定将路西县分为路西、江南两县，成立中共江南县工委、江南县政府。江南县工委、县政府成立后，积极打击地方反动分子，不断袭击敌据点，逐渐控制了富春江以南的富阳广大农村地区。在此期间，在金萧支队主力的帮助下，江西武工队在四县边境地区的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3月初，中共江西县工委和江西县政府成立。随后，淳（安）建（德）、建分（水）、桐（庐）建和桐分四个区政府相继成立，同时在江西武工队的基础上成立金萧支队第五大队。

为进一步巩固浙东至皖南通道，1949年初，金萧工委积极争取进步人士、国民党分水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项作梁起义。经过认真细

致的准备，3月2日，项作梁宣布起义。次日凌晨，在分水县自卫队的接应下，金萧支队两个主力大队和民运队开进分水县城同起义部队会合，起义获得成功。起义部队随后被改编为金萧支队第四大队。分水起义是国民党浙江省县长和县级地方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大大充实了金萧支队的武器装备，为迎接解放军由皖入浙创造了条件，而且对迅速瓦解国民党地方武装、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起到一定的作用。

3月，为扩大、巩固游击根据地，巩固浙西走廊，实现将浙西连成一片的战略，金萧工委决定开辟（富春）江北游击区，并建立江北特派员、江北办事处、江北独立中队（后改为江北独立大队）。江北办事处成立后，立即在以新登县为中心的富春江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建立春江区、九岭区、官山区、古城区等地方政权及武工队组织，开辟了东至杭州郊区的留下镇，南至分水江，北至杭徽公路，活动范围在富阳、桐庐、分水、临安、余杭、杭县等县边境的江北游击区。与此同时，金萧支队第三大队和突击队开展第七次外线出击，在建德、兰溪、衢县等地经过一系列战斗，摧毁国民党乡镇公所，镇压作恶多端的乡保长，并一度攻克寿昌县城。27日，金萧工委宣布设立严衢地区特派员（后改为中共严衢地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寿昌、建德、兰溪、龙游、衢县五县边区党的工作；同时建立严衢办事处、严衢独立中队，负责开辟浙西工作。

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已成崩溃之势，但它仍继续扩军备战，妄图划江而治，负隅顽抗。1949年3月间，国民党调集两个正规师对浙赣线以西的金萧根据地进行集中扫荡，妄图一举歼灭金萧支队。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3月底，金萧支队第二大队与江南、路西两县游击武装联合攻打萧山楼家塔，并彻底扫除浙赣路以西富春江以东萧山、富阳、桐庐、诸暨、浦江五县城外的敌军据点。4月中旬，敌军窜至四管乡金萧支队后勤基地，破坏被服厂、修械所等，金

萧支队集中主力和江东、路西自卫大队、地方民兵与之展开激战，迫使敌人退出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重兵全歼金萧支队的企图，保卫了金萧游击根据地以及所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

金萧支队在杭州地区武装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与地方政权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方恶势力，牵制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地区的进军。

党在昌化、余杭两县开展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组建苏浙皖边区工委，以恢复和发展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次年2月，苏浙皖边区工委派出精干武装到安徽省宁国县东部和天目山区建立根据地，并成立中共天西工委和宁（国）昌（化）办事处。为开辟昌化、於潜两县交界地区的西天目山新游击区，1948年下半年，经中共天西工委批准，中共昌（化）北区委建立，并以龙井桥乡桃花溪为立足点，在杭徽公路北侧、上至昌（化）歙（县）交界的昱岭关、下至於潜县太阳镇以北的千秋关的广阔地带进行革命斗争。1948年冬，昌北区委在童玉村建立第一个农会，接着相继在桃花溪及邻近村建立西坑、九园、龙井等8个农会，实施减租减息，限制封建剥削，减轻农民负担，并按田亩征集爱国公粮，为皖南游击队筹集部分军饷支援解放战争等。

在进行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中共昌北区委利用有利时机和场合，对当地的国民党人员进行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宣传教育，策反、分化、瓦解敌人，比较突出的是领导、策划有进步倾向的国民党昌化县县长裘正起义。在昌化区委的积极努力下，1949年2月，裘正与天西工委和苏浙皖边区工委建立密切联系。经过细致准备，4月12日，裘正率部正式宣布起义。不久，起义部队改编为苏浙皖人民解放军浙西支队，同时成立浙西办事处，裘正任支队司令员兼浙西办事处主任。15日，裘正发表《告国民党政府官兵书》，号召浙西地区国民党军政

人员起义，在当地国民党内部引起震动。不久，浙西支队一度攻占昌化县城，并收缴国民党岛石区警察所和岛石、仲珍、马哨等乡乡队的枪支，控制了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粮库。5月15日，裘正奉命率部经於潜到临安专署报到，支队人员接受整训。至此，浙西支队和浙西办事处完成了使命。

在中共昌北区委开展工作的同时，1948年9月，中共皖浙工委领导的一支武装也在浙西淳安、分水、昌化三县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中共淳分昌工委，主要负责与昌化、分水交界的淳（安）西、淳北、淳东地区的党的组织。1949年5月，淳分昌工委奉命撤向皖南，皖浙工委遂停止活动。

中共昌北区委及皖浙工委在昌化等地的活动与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革命力量，并坚持人民革命斗争一直到解放。

1948年2月，抗战时期曾在浙江新闻界工作过的党员张白怀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杭工作，并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关于要积极开展大江两岸工作、准备配合大军渡江的指示，着手进行对敌武装的策反工作。经过缜密研究和细致工作，张白怀吸收朱鸿钧、宋祖本等进步青年和有进步思想的复员士兵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并筹划在余杭县黄湖镇建立一支秘密武装。12月，国民党余杭县政府决定在县自卫总队之下组建6个联防中队，其中一中队设在黄湖，二中队设在彭公塘埠岭，六中队设在长乐。乘机机会，朱鸿钧等经张白怀同意打入联防队，进而逐渐控制余杭县自卫总队联防队的大部分领导权。1948年底，张白怀的党组织关系转至杭州，他在余杭黄湖镇发展的秘密武装转而接受市工委的领导。1949年3月，市工委吸收朱鸿钧入党，并加强对联防队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加强党对联防中队的领导。为迎接解放军南下，根据党的有关指示，4月，第二、第六联防中队集中到黄湖，收缴了国民党黄湖区公所、镇公所和警察分局的枪支弹药，占领了国民党设在黄湖和鸬鸟下陈的粮库，并对途经黄湖的国民党溃

逃官兵进行机动灵活的打击，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5月2日，联防队在黄湖车站与人民解放军会合，为解放大军作向导，有力地配合了解放余杭和杭州的行动。

三、杭州地区的解放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不甘于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将其统治区的主要工厂、学校、科研机构迁往台湾和华南，同时制订了破坏城市的计划。杭州人民群众在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委（地下）领导下，广泛开展保护城市的斗争。1949年5月3日，杭州城区解放，至5月底，全市各县全部解放，杭州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的建立

在于子三运动期间，为进一步开展全市各大中学校的工作，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简称杭州工委）。1947年12月，杭州工委成立，洪德铭任书记（次年1月，由陈向明接任）。杭州工委成立后，积极在各校发展党的组织和进步力量，到1948年5月，共发展新党员30余人，先后建立艺专、杭高等支部，并基本掌握了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针对敌人的破坏阴谋，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据此精神，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明确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要在保存国家元气，给人民留生路，在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的基本口号下，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散、反迁移、反裁员和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等具体斗争。

杭州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杭州工委

翻印了新华社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党员和进步社团的学习材料，并向社会各界散发；向竺可桢、苏步青、蔡竞平等进步人士寄发新年贺信，希望他们坚守岗位，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以锄奸小组名义向部分反动头目寄发警告信，宣传革命形势，警告他们不要与人民为敌到底。几个系统的党组织都在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中，进行形势任务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强调在胜利的形势面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隐蔽力量，坚守岗位。为防止敌人在解放前夕捕杀党员和进步群众，党组织将一部分暴露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转移到解放区和本省的游击根据地，留下来的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迎接黎明的到来。

1949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派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林枫到杭州，将市工委和杭州工委合并，建立中共杭州市委，由林枫、柯里、方晓、唐为平、陈伯亮、陈向明、刘加林7人组成，林枫任书记，柯里、方晓任常委。市委下设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向明；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柯里、副书记徐恭慧；文教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加林，辖大专、中学、文化、教育4个区委和浙大1个总支，并有专人分管外县和铁路沿线的工作。市委成立后，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城市，反对敌人的搬迁、破坏活动作为中心任务，组织党员和广大群众全面开展反对破坏，保护工厂、学校和重要设施，迎接解放的斗争。

与此同时，金萧工委成立整风整军委员会，发出“大刀阔斧整顿思想，雷厉风行加强纪律”的号召，组织开展整风整军工作。1949年4月下旬在富阳龙门、大章村一带，组织支队直属部队，路西、江南等县的党政机关和地方部队，路北、江东、江西、江北等县政府（办事处）的部分干部及武装人员参加学习。金萧工委还指示各县党组织无论如何要拿出5—10天时间学习《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迎接大军入城、配合接管等准备工作。金萧工委在1949年

初派往各城区工作的各路党政军力量，也根据形势的发展，以各种形式开始协助解放大军对各县的解放。

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在即。针对国民党当局“不让一颗螺丝钉落入共产党手里”的阴谋，市委指示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手段，广泛发动群众，成立护厂护校组织，开展保卫工厂、学校、桥梁等城市重要设施的斗争。

钱塘江大桥是东南地区重要的交通设施，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战略价值。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两次到杭州，部署在杭各军事单位迁离并对炸毁钱塘江大桥进行重点布置。针对敌人的阴谋，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杭州地下党组织，要特别保护好钱塘江大桥，强调这对于保证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恢复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市委成立后，决定将保护钱塘江大桥作为保护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由市委书记林枫亲自部署和指挥。通过各方面力量和关系，市委很快掌握了敌人的炸桥计划，争取到倾向进步的浙赣铁路局工务处设计课负责人华允璋和钱塘江大桥桥工队队长赵燧章对护桥工作的全力支持，并通过他们团结桥工队员积极开展护桥斗争，如转移、隐蔽、保护大桥的工程图纸和施工器材，密切监视大桥上的一切情况，迫使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直属工兵营官兵撤出桥梁要害部位炸药、延缓炸桥行动等。与此同时，隐蔽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高层的地下党员余森文获知敌人详尽的炸桥计划和负责实施炸桥的工兵营具体情况后，多次找其负责人做思想工作，使其答应撤下大部分炸药，仅留少量在公路桥桥面上，以象征性的炸桥来应付上司。经过两方面的紧张工作和斗争，到杭州解放时，钱塘江大桥得到较好保护，仅公路桥面和少量钢轨略有损坏，要害部位完好无损。经桥工队紧急抢修后，杭城解放的次日，钱塘江大桥就已恢复通车，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渡过钱塘江、解放浙江全境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保护钱塘江大桥的同时，市委还领导开展了保护工厂的斗争。杭州电厂工人顶住资方多次下达的关机、炸机命令，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在场内外巡逻，防止特务破坏，使这座杭州唯一的发电厂完整地保留下来。华丰造纸厂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用石块、沙包堵住工厂大门，架设电网，护厂队轮流放哨，严防国民党溃兵和特务进厂破坏。在杭州最大的纺织企业杭州第一纱厂，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护厂委员会，在厂内外日夜轮流值班、巡逻。杭州电信局地下党支部冲破局方“不在班的人不许留在局内”的禁令，组织积极分子日夜轮流值班、巡逻，并与南下解放军取得联系，向他们介绍杭州的情况。杭州铁路支部发动城站站区各单位及浙赣铁路局机关各处进行罢工，迫使路局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撤逃布置，并发动工人将机车关键部件拆散藏入水塘，抵制国民党当局企图撤逃机车的阴谋，保存下12台机车。解放后，这些机车成为浙赣路上首批投入运行的机车车辆。在党的领导和广大职工的积极参与下，杭州解放前夕，先后有30多家工厂企业成立群众性的护厂组织，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

为粉碎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浙大等重点学校南迁的阴谋，在党的领导下，浙大等校的广大师生员工掀起了护校运动。在浙大党总支直接领导下，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自力更生构筑围墙的活动，成立了有学生、工友数百人参加的安全队，在各校区内巡逻。在浙大护校斗争的推动下，全市有20多所学校建立了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护校组织，开展储备粮油食品、保持水电供应，组织纠察队、巡逻队，进行救护、消防训练，秘密清点校内资产设备等工作，并在部分学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诱骗学生去台湾当兵的阴谋。市委还多次召开杭州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代表联席会议，交流学运情况和经验，鼓舞学生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积极、有效的工作，全市各大中学校基本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通过围绕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杭州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各阶层人士，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杭州市及各县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价值的单位和设施，为解放和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经济奠定了基础。

党对国民党军工和情报部门的策反工作

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简称浙保修械所），对外又称力余铁工厂，主要从事枪械制造、修理和丝绸机械、铁路零部件加工等，拥有各类机械设备30多台、工人200余人，是当时杭州设备最多、技术力量最强、最有实力的一家机械制造工厂。1947年，力余铁工厂党支部建立，周建新任书记。1949年初，浙保司令部开始进行撤退准备，命令浙保修械所紧急修复枪支装备部队。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浙保修械所所长马湘平的策反工作也已展开。

早在1948年底，中共党员吕方东受华东局统战部委派，以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与马湘平进行接触，动员其保护工厂、迎接解放。1949年4月，吕方东再次来杭，指示马湘平组织进步工人开展护厂斗争。在马湘平的支持下，周建新建立起38人、每人配美式卡宾枪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日夜巡逻护厂。浙保司令部派驻修械所的警卫班，也在马湘平、周建新的策反下，接受纠察队的指挥。为应付浙保司令部的催促检查，党支部发动全厂工人将所有的机器拆卸下来，装箱造册，藏在修械所试枪的壕沟里。党支部还对所内几个顽固分子，派专人进行监视控制，同时千方百计滞缓浙保司令部作出的撤退计划。浙保司令部撤退后，周建新、马湘平领导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护厂，防止国民党溃兵和特务的破坏，确保这一军工单位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雷达研究机构，也是当时具有国内最高军事科技研究水平的军事机构之一，策动雷达所人员起义对未来新中国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底，国民党命令

雷达所撤离南京去台湾。南京地下党组织通过打入雷达所的关系，争取雷达所先迁至杭州。1949年1月，雷达所迁杭后，所内进步青年张叶明即到浙大与原浙大学生会负责人、地下党员谷超豪接上关系。市委把力争雷达所留在杭州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指派谷超豪等以中国科协杭州分会成员的身份直接联系张叶明，组成策反雷达所工作的核心小组。张叶明等在所内爱国技术人员中进行半公开地传阅《科学时代》《展望》《文萃》等进步书刊、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共的政治主张、组织座谈会、参观企业等活动，使他们了解一些企业开展的团结职工、保护物资器材的情况，为护所活动打基础。1949年3月，国民党命令雷达所继续撤退，杭州党组织下达护所指示，张叶明等团结一些青年技术人员、技工、学徒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护所斗争。他们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并做通了所长葛正权的工作。在他的支持下，发动所内群众加固仓库，器材装箱造册，取出枪支组织防护队日夜巡逻，防止国民党溃兵抢劫破坏等。经过党员和所内进步分子的积极斗争，雷达所顶住了国民党的南迁命令，粉碎了所内个别反动分子煽动的“发钱、散伙、回家”“把汽车开过钱塘江”的阴谋，为解放后组建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杭州支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为应变潜伏需要，在台湾总台尚未建成、新布建的潜伏电台又不能与南京总台发生联系之际，于1948年12月27日成立的过渡性电讯中枢，受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电讯处直接控制，公开名称是国防部通讯第十五支台。1949年3月中旬，中共党员武振平受中共茅山工委上海中心支部派遣到杭州，与在杭州支台任台长的表姐夫厉培明接触。厉培明深感国民党政权的前景黯淡，萌生了脱离特务组织、寻求新的生活出路和政治前途的想法，希望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将自己掌管的杭州支台所属单位，包括苏南、苏北、上海三地和浙江的情报、电台通讯密码等提供

给共产党，以求立功赎罪。经过多次接触和细致工作，1949年4月下旬，武振平在中共茅山工委上海中心支部同意后，向厉培明公开身份，代表党组织领导杭州支台起义。厉培明很快整理好一份潜伏电台的清单，通过武振平转交给党组织。4月28日，厉培明与武振平按照“分散隐蔽、等待解放”计划，以拖延的办法成功应对国民党军统浙江站的撤退命令，带领电台工作人员起义，将全部文件、密码、关防及仅有的两支手枪上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杭州支台人员的起义，为解放后破获国民党保密局在京沪沿线和浙江等地的潜伏特务组织、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贡献。

杭州市区及各县的解放

1949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该《纲要》要求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无锡、上海、杭州地区之敌，并直出浙赣线，切断敌人退路。根据总前委指示，三野前敌委员会对各兵团渡江后经营新区的任务做了明确划分，决定由七兵团兼浙江军区，经营浙江，并强调，在渡江后，必须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挺进，一举占领钱塘江大桥，切断敌人南逃之路，保证京沪杭战役的顺利完成。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28日，三野决定第七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挺进，抢占钱塘江大桥。5月2日，第七兵团所属之第二十一军抵达余杭，迫使国民党余杭县县长率保安部队投诚，解放余杭并随即召开各师负责人会议，决定六十一师攻取杭州市区，六十二师由市区西侧穿越群山直插钱江大桥，切断敌人向南逃窜通道；六十三师由西侧绕过杭州，占领萧山，保证杭州侧翼安全。

5月3日拂晓，六十二师一八五团歼灭六和塔的国民党守军，占

领钱塘江大桥北端桥头堡，迅速向桥南端挺进夺取大桥。随后，攻取玉皇山，控制城南制高点，并迅速占领闸口电厂和渡口。六十二师主力则沿玉皇山、二龙山、六和塔和大桥一线，向杭州市区发起进攻，下午2时许攻占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凌晨，负责攻占市区的六十一师从余杭出发，兵分三路：一八二团沿灵隐，经岳坟、北山，首先突入市区，于上午9时占领杭州火车站，10时控制东南部市区；一八一团从古荡、松木场、昭庆寺进入市区，午前占领艮山门火车站，控制杭州东北部市区；一八三团进占杭城西部地区，师直属队直插以国民党省党部为中心的市中心地区。3日下午3时许，杭州解放，解放军在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市区。第二十三军参加了郎广战役，在歼灭准备退守杭州的国民党军队一部之后，也于3日黄昏进入杭州市。第二十二军进驻武康、安吉地区。在解放杭州的战斗中，第二十一军以伤亡13人的代价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多人。

在解放大军南下的同时，中共金萧工委迎接解放的工作也全面展开。金萧工委在年初派往各县区工作的党政军力量，从4月底到5月上旬，单独或协助解放军以各种形式解放了杭州周边各县。

4月26日，金萧支队命令第四大队同江北独立大队从富阳县场口渡过富春江，过新登、攻分水。30日下午2时，分水县城解放，分水成为杭州地区最早解放的一座县城。

4月下旬，浙东行政公署第三专员督察公署与金萧支队部联合发出通知，劝令各县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立即派出代表与金萧支队谈判城市和平接收事宜。国民党富阳县政府于29日派出各界代表到龙门商谈和平解放富阳事宜。5月1日，富阳办事处根据上级指示派出部分同志进入富阳县城。3日，金萧支队主力与富阳办事处从大樟村出发，向县城疾进。4日傍晚，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一八五团一营到达富阳。国民党富阳县自卫大队4个中队的官兵缴械投诚，富阳县和平解放。5日上午，金萧支队政委张凡率支队主力渡过

富春江入城，与解放大军会师。

4月26日，金萧支队江北独立大队向新登县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成功争取到县自卫中队大部分官兵投诚。5月3日晚，江北大队派部追击弃城而逃的国民党新登县长等人。4日上午8时，江北大队列队进城，新登解放。

在附近各县相继解放的形势下，国民党桐庐县县长于5月5日清晨率自卫队、警察弃城出逃。6日晚上，金萧支队二大队从富阳到达桐庐，桐庐解放。

随着杭州的解放和钱塘江大桥的失守，滞留在萧山的国民党部队仓促南逃。5月5日下午2时，金萧支队萧山办事处主任蒋谷川率部进入萧山县城。3时后，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先遣部队抵达萧山，两军胜利会师，萧山解放。

4月29日，金萧支队天目大队到达临安县玲珑乡，要求国民党临安县县长徐渭寻和浙保独立营长徐润杰和平迎接解放。5月3日，县自卫中队和浙保独立营3个连共200余人投诚起义。4日上午，天目大队进入临安县城锦城镇，临安县和平解放。

在三野七兵团南下杭州的同时，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十二军经皖南、浙西北山区直出浙赣线，千里追击国民党残部。5月1日，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向淳西重镇威坪进发。2日上午，部队在威坪附近击溃国民党暂三师第五、第六团，进入淳安县城。二野第十一军三十三师自安徽屯溪直插遂安县，4日拂晓，三十三师从北面进入遂安县城，遂安解放。5日上午，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侦察连从淳安进抵梅城。下午，三十五师后续部队到达梅城，建德解放。同日，第十二军三十四师从淳安出发，傍晚到达万松镇，寿昌宣告解放。

经过解放军和金萧支队的英勇奋战，到5月29日，随着昌化、於潜的解放，杭州地区各县全部解放。

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在人民解放军和各地方武装的通力协作和英勇奋战下，杭州市区及各县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对杭州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从此，杭州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五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本章提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从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到1952年底，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经过抗美援朝、土地革命及其他民主改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建立国营经济、合理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等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为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杭州于1953年制订了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到1956年底，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杭州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此后杭州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为了建立新政权，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接管城市、建立各级政权和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的斗争。

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指示，确定了“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并抽调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8000多人，组成省、地（市）、县、区各级接管领导机构，准备成套地接收浙江全省特别是杭州等重要城市。5月6日，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员会成立，谭震林任书记，并主持召开第一次省委会议，确定解放初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迅速分配干部，实行战略展开，集中干部接管城市，保证不乱，完成会师，了解情况。”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发布电令，宣布在杭州市实行军事管制，正式成立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任命谭震林为主任，负责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恢复社会秩序、帮助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地方人民政府等。

市军管会成立后，遵照“宁缓勿急，稳步前进”的指示，着手对各系统进行全面接管。市军管会的政务部、文教部、财经部、军事部、公安部、工业部等，分别选调大批党员和干部，到机关、工厂、企业、学校担任军代表，从5月8日起，全面对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国民党政府、军警、司法机关、官僚资本银行、工厂企业及文化教育事业等单位进行接管。至6月底，全市绝大多数部门的接管工作顺利完成（个别部门到8月底完成）。

1949年5月9日，省委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中共杭州（地下）市委书记林枫《关于前杭州市委工作的报告》。10日，省委、市军管

会召开杭州解放会师大会，南下干部，坚持浙东、浙西游击斗争的同志和中共杭州地下党员欢聚一堂，誓言为建设新杭州而团结奋斗。在此基础上，11日，省委作出《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鉴于杭州市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由谭震林、杨思一、张劲夫、李丰平、顾德欢（未到职）、林枫、柯里、李代耕、周力行、汪星（未到职）、李迎希组成新的中共杭州市委，谭震林任书记，杨思一、张劲夫任副书记。^①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市长。军管期间，新市委在市军管会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市工作，日常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办理。新的杭州市委成立的方法与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中央要求全国其他城市学习、借鉴杭州的方法。

市委、市政府成立后，市域各区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全面加快。1949年5月12日，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第一至第八区公所。30日，分别成立了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和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周边县各级人民政权建设同步展开。5月15日，中共杭县县委成立，成为解放后杭州周边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随着富阳完成政权组建，杭州周边相继建立了14个县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市、区两级党政机构成立后，杭州市立即着手废除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制度。10月11日，杭州市召开第一次区、局长联席会议，要求在12月底前，一律取消保甲制度，建立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并决定在上城、下城和江干区开展试点工作。10月23日晚，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在西牌楼小学会堂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城市居民委员会，标志着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开始终结。到1950年3月，杭州完成了取消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全市共建立了571个居民委员会，形成了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行

^① 1950年1月1日，中共杭州市委正式宣布公开办公，市委机关办公驻地在圣塘路27号。

政管理体系。

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标志。1949年8月，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0名，列席代表8名。会议审议了谭震林所作的《克服当前困难，建设新杭州》的报告、副市长吴宪的工作报告，决定成立疏散难民研究委员会、生产供销委员会等。随后，8个城区和周边各县也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协助党和政府克服困难、搞好工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杭州解放后第一次具有广泛代表参加的大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及人民当家做主、参与政权建设的具体体现。

在召开各界人民会议的同时，党领导下的工会、农民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人民团体相继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进城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1950年2月，杭州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首届杭州市总工会委员会。到1952年底，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基本建立起来。杭州解放后，为“把农民尽快组织起来”，到1951年春，省委、市委在杭州郊区和周边各县普遍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1949年6月，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市各机关、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大会，部署青年团组织建设工作。1950年5月，杭州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成立杭州市学生联合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学联执行委员会。1953年5月，杭州市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杭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1949年10月，市委妇女工作部召开各界妇女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全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并开展工作的基础上，1953年1月，杭州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杭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1952年9月，杭州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大会，宣布结束杭州科协的历史使命，其工作由杭科联筹委会接替。

工会、农民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人民团体的普遍建立，密切了党和各界群众的关系，对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生产、扩大党在杭州的执政基础等具有重要意义。

稳定社会秩序、落实省委“六大任务”

1949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暂时放到农村去、以农村兼顾城市的工作指导方针，决定七月、八月、九月除杭州、宁波等城市留必要干部负责城市工作外，党的大部分力量转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完成征粮4项工作。9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确定了“必须继续贯彻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适当地照顾城市”的基本方针，并把原来规定的农村四大任务扩展为六大任务，增加了减租、组织群众大多数这两项任务。

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杭州市委对杭州的征粮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干部深入农村积极地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结合剿匪、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完成征粮任务。杭州郊区和各县根据土地质量优劣、产量多寡等情况，将征粮任务分配到户，减轻农民负担。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征粮竞赛和争当征粮先锋模范等活动，踊跃缴纳“爱国粮”“翻身粮”“胜利粮”。到1950年底，杭州市郊区征粮任务基本完成，富阳、新登、临安、昌化等周边各县也完成或超额完成征粮任务，保证了军粮民食，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和城市各项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杭州解放之初，国民党败逃前在杭州及周边各县布置的土匪武装四处破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为此，1949年5月起，省委、省军区多次指示，要求在浙人民解放军各部集中力量彻底消灭在城市和乡村中的残余反动力量，迅速肃清土匪、散兵游勇，并提出以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为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工作方针。7月底，市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清剿匪特等工作，要求把军事与群众密切结合起来，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克服

困难，坚决打击匪特活动。杭州市区的剿匪斗争，从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清除各类非法武装、反动组织开始，继而全面展开收容遣散散兵游勇和登记国民党军官等工作；对周边各县的大股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则集中优势兵力予以聚歼。到1954年9月，杭州地区残余匪患被彻底平息。

在开展剿匪斗争的同时，从1949年9月起，市郊和各县农村以农民协会为基础，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地主恶霸的斗争。各地召开反霸斗争大会，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参加。会后进行清算斗争，把恶霸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极大地震慑了不法地主。在斗争恶霸地主基础上，各地农村普遍进行了劳动创造世界、打倒封建势力等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国之情。剿匪反霸斗争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反动势力妄图破坏新生人民政权的企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胜利果实，为解放初期城乡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1949年9月15日，华东局颁布《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同月，省政府发布《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实施补充办法》，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等出租的土地，一律按原租额的30%减租，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除地租外，其他任何变相剥削和陋规均应取消与禁止。为做好减租工作，从1949年6月起，市委、市政府和各县着手开展土地调查工作，明确减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工商业家和祠堂庙宇。10月，市委、市政府和周边各县普遍召开干部、农民和各界代表会议，确定以减租为中心，结合反霸征粮，开展建立政权、废除保甲制、巩固农会组织、建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到1950年7月，杭州郊区和各县农村的减租减息运动基本完成。通过减租减息，贫苦农民在斗争中被组织起来，成了农村的主人，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

1949年夏至1950年春，面对钱塘江流域洪灾和严重春荒，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救灾度荒工作。1950年3月，省委发出“厉行节约，渡过春荒”的号召，要求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应尽量节省、一切可以栽种的渡荒早熟作物应尽量多种等。市政府下发《生产渡荒救济暂行办法》，要求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安排有劳动能力的困难户参加生产，增加收入等。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种救灾措施相继实施，全市人民顺利渡过1950年春荒。面对严重灾荒，杭州历史上首次做到了不饿死人、不发生难（灾）民潮，让人民群众深切地看到了新社会的希望。

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

人民政权建立之初，投机资本空前膨胀，生产资本日益萎缩，不法分子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经济面临着濒于瓦解的境地。面对严峻形势，1949年5月9日，市军管会颁布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全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16日，军管会又宣布，禁止以金银、银圆计价和自由买卖，对非法从事金银、银圆交易的投机商、地下钱庄进行坚决打击。6月底，市军管会公安部门突击清查继续非法活动的金银贩子，查封地下钱庄，没收或贬值收兑大批黄金、银圆。经过一番斗争，市场上银圆公开买卖绝迹，人民币开始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为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

为平抑大米、棉纱等商品价格，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行为，杭州从嘉兴、绍兴等周边产粮区大量征购和调集粮食、棉纱等，华东区财经委员会从江西调拨大量大米，支援杭州与不法奸商作斗争。杭州对外水路、陆路交通恢复后，各地大米、面粉、黄豆等从苏南水路和江西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杭州。在准备充分的基础上，杭州与上海等周边城市统一行动，及时抛售粮食、棉纱、棉布、食盐等重要物资，逐步稳定市场。同时，银行、税务、公安、交通等部门通力合作，加大

打击投机的力度，遏制投机之风。“米棉之战”的胜利，有效遏制了猖獗投机行为和社会恐慌心理的蔓延，稳定了物价和社会秩序。

195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决定。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市委、市政府采取了“量入为出”、统一调度使用全市所有物资的措施，在各企业事业单位中执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堵塞经济漏洞。全市还实行了企事业单位人员生活资料配售等制度。到5月底，全市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现金管理的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初期市场混乱的情况。

组建国营企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将杭州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是解放初期党的重要工作。通过保厂、保业等斗争，解放前在杭的官僚资本企业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1949年5月30日，市军管会发布《对原有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企业各部门应立即接管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的命令，市军管会各部门按系统对在杭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国民党财政金融机构进行了全面接管。完成接管工作后，市委、市政府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把官僚资本企业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在财政比较困难的基础上，挤出部分资金陆续新建和扩建一批公营企业，以组建杭州自己的国营经济。到1951年，杭州接管的和由国家投资新建、扩建的工厂企业达77家。由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和新建、扩建国营企业，1952年底与1949年相比，市区工业公私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工业所占比重由8.47%上升到38.96%，而资本主义工业所占比重由91.53%下降到61.04%。国营经济比重虽然还不足一半，但从国民经济的总体来看，由于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已掌握在国家手中，国营经济已经能够发挥主导作用。

在建立和壮大国营经济的同时，市委、市政府贯彻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通过对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调整，提高了生产经营者的信心，促进了杭州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全市私营工商业1951年比1950年，户数增加4534户，生产盈余增加1.45倍。1952年，杭州进行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并组织夏秋城乡物资交流、贷款扶持等支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52年底，杭州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二、巩固新政权的斗争

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成立后，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荡涤了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旧社会的痼疾，建立了新的社会风尚，实现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深刻变革。

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确定了“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方针政策。7月，浙江省委作出决定，要求组织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奔赴土地改革第一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1950年6月，市委在全市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对郊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部署，要求在思想上、组织上迅速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会后，土地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同月，市委发出市郊农村开展土地整理的指示。通过土地整理，对各區土地作出全面统计，说明概况与特点，作为土地改革与征粮的

依据。土地整理的完成，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打下基础。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提早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决定将工作方针由“小心谨慎、稳步前进”改为“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展开运动”。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封建统治，消灭地主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市委下达土地改革工作计划，明确郊区土地改革坚持稳步前进、分批进行的方针，分试点阶段、局部进行阶段和全面开展阶段3个步骤进行。当月，郊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分别在笕桥、艮山两区的笕桥、北草庵、弄口3个乡进行。试点的步骤是广泛宣传《土地改革法》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召开诉苦会明确土改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土地改革工作队组织农民划分阶级，划分的步骤为先地主、富农，后普通农民；先典型，后一般；先本村，后外村；先村干部，后村民。此后，根据党的土地没收和征收政策，结合说理斗争，开展土地分配。到1951年2月，试点工作顺利结束。通过试点，市委基本掌握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一般性规律。从1951年2月中旬开始，郊区土地改革进入局部进行阶段。到4月初，市委完成了江干区、拱墅区等5个区11个乡的土地改革。4月8日，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全面部署郊区各项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郊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杭州周边各县抽调人员组成土地改革工作队。在农村还没有普遍建立党支部的情况下，各地党委、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农民协会三者结合，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力量。1950年秋，各县分别在23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典型试验。11月，各项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到1951年冬，全市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部结束。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农村各项民主改革和政治斗争，彻底摧毁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长期统治，实现了农民

的土地所有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前，杭州是国民党及江浙财阀在浙江的统治中心，其反动社会基础深厚。解放初期，经过剿匪反霸和民主改革，各种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仍有不少散匪、特务潜伏下来。朝鲜战争爆发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气焰十分嚣张。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一切反革命活动分子，予以严厉制裁。30日，省委发出指示，就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作出全面部署。

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下达后，市委进一步明确镇反运动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1951年3月召开的杭州市第二次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确定了全党动员、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方针。随后，市委对镇反运动进行了周密部署，还成立了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镇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并组建了军事法庭，公审首恶分子。全市500人以上的大厂、学校及机关驻地、居民区建立了相应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

杭州镇反运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951年10月结束，共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3409人，逮捕3063人，经群众检举而宣布管制的346人。经过这一阶段，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被打掉。11月，镇反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市公安局通过社情调查掌握了4.8万余名复杂人员的情况，其中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土匪、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等五类人员3.19万人。1952年1月后，又有重点地对判5年以下的案件逐件审查，市级各部门成立审判清理小组，对混入内部的五类人员和政治上不纯分子进行

彻底清理，并坚决肃清在偏远农村地区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到1952年10月，第二阶段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758名，全市绝大多数反革命骨干分子依法受到处理。1952年10月后，镇反进入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开展沿海内河镇反运动、调查摸底及搜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到1953年9月，第三阶段基本结束，全市共打击残余反革命分子1319人。到10月底，全市镇反运动宣布结束，除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外，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转向经常性的工作。

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妄图进行复辟的社会基础，巩固了人民政权，有力地支持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创造了必要条件。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0月2日，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农村，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同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浙江分会（简称浙江省抗美援朝分会）成立，统一领导全省抗美援朝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杭州市迅速开展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时事宣传教育活动。市委先后发出《关于开展时事宣传教育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开展时事宣传教育的意

见》，各级党组织通过形式多样、广泛深入的群众性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必败的信念，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杭州各界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捐献和积极参军参战、优抚烈军属的热潮。

杭州人民在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中，自觉将抗美援朝与生产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和增产捐献活动。工业战线上，广大工人响应市总工会发出的捐献“杭州工人号”飞机的号召，在“车间就是战场，工人就是战斗员，开快机器，多做一件活，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生产竞赛，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广大妇女、青年和社会各界人士亦踊跃参与捐献。到1951年底，全市企事业单位捐款数折合战斗机18架，社会各界自发捐款数折合战斗机24.5架，捐赠慰问款44亿元（旧币）、慰问信20243件、慰劳品58326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市广大工人、农民、学生、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纷纷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参加支援运输和医疗工作。1950年12月，参加杭州市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的500余名青年，有176人当场报名参加志愿军或到军事干校学习。会后，有近万人报名，6022人被批准入伍，224名铁路工人、150名汽车驾驶人员获得批准参加支前运输工作。此外，杭州还先后派出了4个医疗队和护士队奔赴朝鲜前线。

为表达对志愿军的支持和拥戴之情，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市委、市政府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优抚工作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的具体体现。在市委领导下，全市人民开展了各种拥军优抚活动。社会各界纷纷写信向志愿军将士和朝鲜人民军致敬慰问，并捐赠了大批慰问品。各级各部门对荣誉复员军人和烈军属以组织生

产、介绍职业为主，实物补助为辅的方针，着力解决他们的困难。许多单位和群众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自动协助政府帮助烈军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通过这些措施，杭州市军民关系更为密切，既稳定了后方，更鼓舞了前方志愿军将士的士气。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民主自尊心，促进了社会各界和各族人民的空前团结，显示了杭州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伟大力量。

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在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针对各种社会恶势力和丑恶现象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运动，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展开。

首当其冲的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1950年初，市委、市政府组织各部门统一行动，对全市所有妓院一律查封，严禁一切卖淫嫖娼活动，并制定了“加强管理、缩小影响、逐步根除”的方针，对娼妓进行登记，开展教育改造工作。经过教育改造，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少数不思悔改者，被送交劳教院，一边劳动，一边继续接受教育改造。同时，公安部门对50多名老鸨进行强制劳动改造。有关部门还大力查禁卖淫活动，发动群众检举嫖娼案件，严厉打击嫖娼行为。经过努力，到1954年，全市娼妓几乎销声匿迹。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绵延几千年的丑恶现象基本绝迹，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杭州解放初，市委、市政府严厉推行禁毒令，坚决打击制贩毒犯。1952年8月，杭州市禁毒工作委员会成立，统一指挥全市的禁毒运动。各区、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在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广泛宣传烟毒犯罪行为及危害，敦促制贩毒犯坦白、登记的基础上，从1952年8月起，全市先后组织3次集中行动，对毒犯进行坚决打击，并缴获一批烟土、毒资。到1952年10月底，禁毒

运动基本结束。经过解放初三年的持续努力，全市破获涉毒案件329件，逮捕烟毒贩690人，基本打垮了在杭烟毒帮系，扫清了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毒素。全市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赌运动，对在茶楼、酒馆等公共场所以及家庭赌博的，一经发现，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教育、劳役、罚金、拘留等处罚，直至移送法院判处。

在禁赌运动中，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在城乡各地广泛张贴布告，坚决取缔、封闭赌场，没收赌资、赌具，严厉惩处借此谋利的恶霸、赌头和窝主赌棍；一方面深入宣传，帮助嗜赌者提高认识，自觉戒赌。1950年5月，市公安局制定《取缔赌博暂行办法》，加大了禁赌力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渐近匿迹。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确定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的新婚姻制度。为确保《婚姻法》的贯彻实施，6月，市政府制定了《杭州市婚姻登记暂行办法》。7月，市民政局在全市设置了6处登记机关，开始办理婚姻登记。11月，市有关部门制定婚姻登记实施细则、结婚健康检查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带头贯彻执行。11月，市级20个部门组成检查组，检查城乡各地贯彻执行《婚姻法》情况，对发现的包办婚姻、童养媳、重婚、早婚、不准寡妇改嫁等问题逐个查处。

在此前后，市委成立杭州市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在全市开展一系列学习宣传《婚姻法》活动，并深入城乡各个角落，造成了较强的声势和社会舆论。1953年2月，中央将3月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杭州市以“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压迫虐待妇女和妥善处理童养媳、寡妇重嫁及和睦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问题”为重点，抽调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加大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力度。

在开展上述民主运动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部署，

杭州市还大力开展了企业民主改革、农村地区的民主建政和旧的司法制度改革等运动。通过这些民主改革运动，扫除了旧社会的痼疾，肃清了封建主义的遗毒，为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在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农业、城市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全面展开。在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杭州市全面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了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杭州市先后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展开

为保证城市供应，促进城乡的物资流通，1949年7月1日，杭州市区成立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杭江纱厂职工消费合作社。6日，杭州周边第一个县级供销合作社——建德县生产运销合作社（后统一改称供销合作总社，简称供销社）成立。10月23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当前开展合作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合作社工作，在广大农村中以县为单位，在商品集散中心市场或主要特产集散地建立供销商店等。根据这一精神，市委、市政府提出“整顿和发展合作社，发挥减少中间剥削与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的总要求，还明确提出了“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的具体方针。为便于组织领导全市合作社巩固发展工作，11月1日，杭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成立。14日，艮山区弄口乡供销合作社成立，成为杭州郊区第一个乡供销合作社。一个月后，杭州市供销合作总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后，杭州供销合作事业迅速推进。截至1952年，全市14个县和8个区全部建立了供销合作社。

与此同时，通过把接管官僚资本商业企业改组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国营商业开始发展。1949年6月，解放后的第一个市级国营商业公司——杭州市贸易公司建立。此后，全市建立起各级商业经营机构，商业分工也逐步划细。1950年，市专卖事业公司（经营烟酒）、市零售公司（经营粮油柴等）、市百货公司、市粮食公司等先后建立。1951年后，粮食批发和零售市场逐渐由国家控制，国营公司、合作社网点遍及城区和市郊，国营商业的粮食供应占总销量的71.2%。1952年11月，省百货公司在杭州设立了中国百货公司浙江杭州批发站，这是杭州第一个二级采购批发站。自此，从批发到零售商业、集市贸易、专业市场等，杭州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营商业体系。

为把杭州由消费城市迅速改造成为生产城市，市委、市政府挤出有限资金开展了大型工业企业，尤其是骨干企业的兴（扩）建工作。从1949年到1952年末，杭州市通过接管、改造和兴（扩）建等措施，共建成了70多家国营企业。同时杭州电厂、东南化工厂等12家重要的公私合营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在工业生产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杭州市城乡物资交流不断扩大，城乡经济开始呈现活跃的局面。

农村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希望将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模式转变为互助合作的高效生产方式。市委坚持说服教育、自愿互利、结合生产等原则，采取了谨慎积极、稳步前进的步骤。市委先在市郊新塘乡进行试点，组织小型互助组，然后逐步推广。互助组的形式从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特点是农忙互助、农闲散伙、按时结算）到常年互助组（特点是土地入股、包工保产、统一经营、常年互助），进而发展到专业互助组（如运输互助组、副业互助组、茶叶互助组、蚕桑互助组等）。1952年新登县城岭区新堰村成立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全省首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许桂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为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以及科技等各项事业得以恢复与发展。在接管公立学校、保护私立学校、全面废除旧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杭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逐步向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事业转变。1952年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学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数、教职员工数都有所增加。其中中学、小学学生数增长1倍多，学前教育从无到有发展迅速。文化事业全面恢复，专业和业余剧团、文化馆、电影院、图书阅览流通站纷纷建立。1949年5月16日，全省第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在湖滨六公园开业。23日，浙江省第一家人民广播电台——浙江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6月1日，《当代日报》创刊。为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杭州市逐步开展了工矿企业职工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工作，建立了城市妇婴保健站和农村妇婴卫生站，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等。

为改变市区破旧的面貌，市委、市政府遵循“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原则，贯彻“全面恢复，重点建设”和“加强维修，择要兴建”的方针及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根据人力、财力和市民群众需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城市道路、桥梁的整修。西湖疏浚，迈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西湖的第一步。到1952年，市委、市政府先后组织翻修市区柏油路、碎石路、弹石路近56.6公里；对全市桥梁采取维修改建为主、新建为辅的原则，整修延龄桥、平安桥、凤起桥等木桥、石桥98座。一大批市政工程的实施，初步改变了城市破旧的面貌。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伴随着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杭州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春和当年年底，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从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到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形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9月总路线公布以后，广大农民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的热情高涨，全市农村进入发展初级社为主的第二阶段。在1954年1月召开的中共杭州市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市委决定把农村的主要任务转向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决定在良山区乌龙乡三叉村试办一个大型蔬菜合作社。会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工作全面展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引起正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毛泽东的注意。1954年1月，毛泽东前往新登县松溪乡调查农业合作社兴办情况，称赞组织起来的好处。毛泽东视察新登农业合作社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市的干部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化运动。经过发展、整顿、巩固，到掀高潮、再整顿、再巩固，至1955年底，杭州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85个，入社农户达86.75%；周边各县的初级社发展到11277个，入社农户达338729户，占总户数的56.1%。至此，杭州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走向高潮，并且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逐渐展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杭州手工业发达、行业繁多，1952年前后有170多个行业，产品有1800多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从1953年10月下旬起，在解放初试办制钉、服

装手工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又以市供销合作总社为主，在机械铁工业、铁器业、车木业等8个行业中进行建立手工业合作社的试点。1954年9月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由试点迈向稳步推进阶段。到1955年9月底，全市发展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1个，生产合作社54个、生产小组63个，组织起来的人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16%。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为此，国家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由此，以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和私营交通运输业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全面加快。从1953年到1955年夏，杭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主要是在工业中采取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委托经销、代销等，其特点是：国家控制原料供应及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价格，企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性质不变，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业的利润上实行“四马分肥”^①的方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杭州解放之初，在接管城市、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曾对民族工业采取过委托加工、订货包销等措施，也成立有公私合营企业。总路线公布后，不少资本家认识到走社会主义是光明的道路，纷纷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到1955年底，全市有94家私营工厂实行公私合营，并合并改组为41家公私合营工厂；有184户私营商业转变为公私合营；全市国营、合作社和公私合营商业的零售额占全市商业零售额的43.6%，在批发总额中占到93%。与此同时，私营运输业也实行了公私合营。

^① 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30%，工人福利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红利占25%。

到1956年底，杭州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杭州初步建立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呈现出全面活跃和普遍高涨的新形势。在三大改造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造运动的胜利完成，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参政意识显著增强，这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在依法开展基层人大代表普选和各区人大会议召开的基础上，1954年7月12日至16日，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19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审议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杭州市人民政府195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1954年财政预算；审查代表提案；选举出席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杭州市195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1954年财政预算、关于提案审查报告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等4个决议，选举产生了谭启龙等36人为杭州市出席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尚未公布，普选后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形式也还未确定，这次会议没有履行选举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职能。直至1955年6月，在市第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规定，首次选举产生了杭州市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吴宪^①当选为市长，陈碧如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政府也在会上改称为市人民委员会。

^① 1953年7月，吴宪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而作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同年12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行使政治协商的职能。

根据上述规定，1955年12月6日至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苏友谊馆隆重召开，111名委员出席会议，90多名各界人士列席。会议听取了原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胡海秋所作的《关于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共杭州市委第二书记王平夷所作的《关于杭州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市委常委顾春林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传达学习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经过深入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王平夷当选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

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阶段，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成为杭州市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党的建设

杭州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了适应全面执政的需要，中共杭州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解放初期党建工作的展开

杭州解放时，杭州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严重不足，全市只有191个基层党支部和2558名党员。党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分布也极不均匀，作用发挥不够明显。新的中共杭州市委建立后，不仅迅速建立起了县区党委及所属机构，还先后在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委办局和司法、检察、金融机关，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军事系统中开始建立各级党组织。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1953年1月，省委发出指示，要求选拔经过审查与教育的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对象，积极谨慎地发展党员，建立乡级党支部，确立农村领导的核心。据此精神，市委按照“积极慎重，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在全市工厂和农村中，发展了一大批在斗争、工作、生产和学习中涌现出的成分好、觉悟高、政治面貌清楚、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在各级党组织中普遍建立“星期六党日活动”制度，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于6月建立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到1956年底，全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都有了初步发展，全市（含各县）党员发展到3.7万余人，基层党委28个、基层党总支55个、基层党支部2647个，基层党组织的分布趋于合理。

为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尽快提高干部思想和文化素质，市委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工作。1949年7月，市委创办杭州青年干部学校。1952年1月，中共杭州市委干部学校（后更名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成立，专门进行党员干部培训。与此同时，市委大力加强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通过系列的学习培训，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思想觉悟、管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能力都得到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杭州解放后，市委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1949年5月至7

月上旬，市军管会领导先后走访有声望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100余人，宣传党的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8月，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为加强统战工作，1951年8月，市委转发《市委统战部协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计划》，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和开展工作，共同为新杭州的建设和发展献计出力。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农工党杭州市支部委员会、民盟杭州市分部、民建杭州分会、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民进杭州市分会、市工商联组织等先后成立；九三学社和中国致公党虽未在杭州建立市级组织，但也有成员参加活动。杭州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爱国爱教团体也纷纷建立并有了一定的发展。

随着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组织的相继建立，各族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1950年1月，杭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简则》《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补充规则》，选举产生了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联系群众推动工作，动员群众积极贯彻政府法令，大力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爱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团结，不断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杭州的初步尝试。

“三反”“五反”运动

正当党和政府忙于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时候，一些不法资本家以《共同纲领》中关于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为幌子，力图通过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一些党的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引诱，堕落成贪污腐化分子。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开展“三反”斗争。同月，省委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三反”运动作出周密部署，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场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决定，1951年12月，市委召开会议，制订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坚决开展“三反”斗争的计划。不久，市委发出指示，决定到次年1月中旬，除已进行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及个别部门特殊情况外，全市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单位，均要以开展“三反”斗争为中心任务。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经过“思想发动、民主检查”“反贪污、打‘虎’”“对证追赃、定案处理”“思想建设”等四个阶段，揭发了一批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对犯有错误行为的人员，根据“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分别作了处理。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各地各部门在揭发和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清查出一一些机关人员同不法资本家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三反”斗争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反”斗争。同月，省委决定，全省“五反”斗争以杭州市为重点，在全省7个城市同时展开。

按照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精神，1952年1月，市委制定《关于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的初步方案》，决定在市工商联成立工商界“五反”委员会，在各行业、各地区成立分会。2月，市委成立杭州市

“五反”运动委员会，并发动党、政、工、团各界力量全面开展“五反”运动。经过各地各部门的积极努力，5月，杭州市宣布“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全市工商业者和广大群众万余人举行了庆祝大会。

“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挽救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和部分误入歧途的私营工商业者，对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培育勤俭节约、爱护国家财产等新风气具有重要意义。

“新三反”运动与审干、肃反运动

随着党对经济、社会等各项工作领导的全面加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杭州周边地区出现了於潜县农村妇女潘香球迫害案、萧山县手工业工人顾伯贤迫害案等官僚主义典型案件。全国其他地方也揭发出来大批类似案件，这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开始在全党开展“新三反”运动。同月，省委也发出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批评、不忠诚老实、写假报告等各式各样的反党行为和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

接到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指示后，市委对开展“新三反”运动作出部署，要求全市自上而下地有重点分批展开。全市“新三反”运动分“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有重点地组织检查，开展批判，进行处理，教育群众”“在组织制度上研究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巩固斗争成果”3个阶段进行。到1953年8月，市委对“新三反”运动进行了总结。此后，由于工作任务的改变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新三反”运动不再成为市委工作的重心。通过“新三反”运动，遏制了土改、镇反运动后干部中滋生的骄傲自满和不关心

群众疾苦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在两三年内对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纯洁干部队伍，解除有历史问题干部的思想包袱，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1954年12月，省委下发文件，规定了审查干部的范围、步骤、方法和目的、要求等，并对审干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有关政策做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1955年初，市委成立审干办公室。4月，市委下发《审查干部工作计划》，对审干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在市委领导下，杭州市按照收集干部档案材料、从中查找问题，组织社会调查、提出审查与不审查意见，提出结论意见、上报省委批准3个步骤实施审干工作。到1958年底，审干工作基本结束，全市被审查的干部超过了4.1万人。审干工作纯洁了干部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为正确地培养、使用干部提供了良好条件。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后期受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部分地方或单位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和错误。

在审干运动中，1955年5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次指示，要求在全国掀起一场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简称肃反运动）。6月，浙江省委成立领导机构，领导全省的肃反运动。杭州市抽调力量，从1955年6月开始，在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员、工交财贸企业、医疗卫生系统等单位分5批进行肃反运动。到1959年2月，在完成和处理了有关肃反结尾和遗留工作之后，全市肃反运动宣告结束。肃反运动清查出一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肃反运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下，这些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的甄别平反。

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即将开展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繁重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召开党的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有关精神，从1956年4月起，市委作出了筹备召开中共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在认真组织学习党的组织原则和讨论酝酿的基础上，民主选举出各方面的代表303名。1956年6月11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江华^①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市委第二书记王平夷代表市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年来全市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顺利地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全市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就。报告指出：“由于我们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不够熟悉，社会主义的自觉性不高，加以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在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上常常产生右的或‘左’的倾向，其中主要是右的倾向。”^②报告还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角度，对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针对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会议讨论后通过了该报告，并选举出23名市委委员和7名候补委员；选举出39名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与4名候补代

^① 1954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建立书记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为书记处书记。1956年7月后，省委增设第一书记，江华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② 《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员会向党的全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56年6月11日）[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浙内图准字（2006）杭8号，第11页]。

表。6月20日，中共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市委常务委员会，吴宪为第一书记，王平夷、王子达、孙文成为书记处书记。

中共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大会提出“把本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杭州，消灭贫困，消灭落后，需要全市党组织作长期而艰巨的努力”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这符合杭州实际，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结果。同时，大会对改造与建设领域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也真实地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巨大胜利面前，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信心与决心，这也成为以后经济建设中盲动冒进的思想之源。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本章提要

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杭州市抓住机遇，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建起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建成新安江水电站等重大水利工程，为杭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城市建设、交通、通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杭州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党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促进了杭州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同时培养和造就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左”倾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一、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和奴役的杭州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并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法制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提出许多正确的指导方针。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迅速掀起了学习、讨论、宣传、贯彻《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精神的高潮。1957年3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杭州市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深刻阐述《论十大关系》，提出要恰当安排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周恩来的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党中央精神在杭州的学习和贯彻。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中共杭州市委在学习党的八大精神中提出，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市人民的迫切任务，就是要争取更多更好地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积极准备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和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市委、市政府要求在全市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通过增产节约运动，基本上克服了从大发展转入正常发展、稳步前进过程中的困难，比较集中地处理了若干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

1957年1月，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大会收到提案656件、人民来信36件，内容涉及工业、市政建设、教育、文化等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人大制度本身的建设和完善。会议期间，先后有98位代表在大会上踊跃发言，有24位代表作书面发言，他们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既肯定了一年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又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1957年全市人民的中心任务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全面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更多更好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报告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宗派主义的情绪，经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纠正单纯依靠会议和公文进行领导、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搬、凭主观臆断办事等不良作风，力求使自己的工作符合客观实际，防止右倾保守和急躁冒进。

这一时期，市人大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搞好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动员多余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绿化建设等决议和决定，这对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顺利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受到市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从1956年7月到1957年1月，政协杭州市委员会和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多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如何认识和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进行座谈，使各民主党派认清了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市政协设立学习、文教等10个专业工作组，健全了政治协商组织；并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结合杭州实际，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开展学习座谈、协商讨论和参观视察活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深刻阐明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重要性。1956年4月，市委印发《关于1956至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纲要》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保障业务工作时间、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等20条具体措施。

杭州科学文化事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研究机构、科研人员队伍发展壮大，文化场馆、文化团体、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涌现出《十五贯》《秋海棠》等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节目。广大农村在实行合作化运动后，还试行了以包工包产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社管理中的一些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全市各个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满怀豪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促使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

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全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迸发，各行各业比学赶超，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五”计划期间，杭州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以及文化、教

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提前一年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195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370.87%，较1952年增长123.06%，年均增长17.4%。主要产品产量也增长很快，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电力为205.91、水泥为771.73、棉纱为121.98、棉布为190.72。各项主要产品除绸缎外，均远远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水平。1957年全市职工达到6.4万余人，较1952年增长40.42%。

“一五”计划期间，杭州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类型的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国营工业从1952年的31.3%上升为40.81%，公私合营工业从7.38%上升为58.79%，私营工业则从61.04%下降为0.12%。全行业公私合营，改变旧有工业的分散落后面貌，企业管理趋向集中，生产组织渐趋合理。在并厂改组中，还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改造，调整、更新了部分设备，充分发挥了先进设备的潜力。在充分利用旧有工业的基础上，五年中国家在杭州进行工业基建投资达6676万元，新建或扩建企业50多个，其中包括杭州电厂扩建工程、浙江钢铁厂等重大工程和企业。

从解放到1957年第三季度，杭州的工业固定资产已达到7359万元，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动力设备和金属切削机床1957年比1952年均增加1倍以上。“一五”期间，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57.25%，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59%。五年来，杭州市工业试制和生产的新产品，仅生产资料就达300种以上。市属工业中有国家规定标准可比的38种主要产品，已有绸缎、水泥、电石等29种产品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绸缎正品率从1952年的74.0%提高到1957年的93.4%。1957年，全国出口的22种绸缎中有18种是由杭州市设计生产的。

“一五”计划期间，杭州顺利地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合作化。由于郊区农业在生产中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改革耕作制

度，推广先进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兴修农田水利，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达到1967.8万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0%。粮食总产量达12067.5吨，蔬菜总产量达到128.2吨，茶叶总产量达280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31%、152%和13.5%。

在商业方面，1957年市区有零售商业网点12731个，从业人员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61万元，为“一五”计划指标的125.5%。其中，国营商业零售额11749.13万元，占零售总额的53.5%，超过“一五”计划指标。

在交通建设方面，水、陆、空全面发展，长途、短途运输齐头并进。1957年，市区内有短途载货汽车167辆，合计567吨位，全年运货量达91万吨，货物周转量671.4万吨公里，分别为“一五”计划的195.69%和166.6%。1957年，杭州拥有客车126辆，座位4211个，客运量711.8万人次。1957年，水上运输航道达2014公里（其中1900公里可通机动船），完成运输量264万吨，货物周转量21770.82万吨公里。民用航空业开始起步，1957年完成旅客发运量9.71万人次。

在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方面，“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维护费比1952年分别增加14.54%和26.7%。城市面貌同解放前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240万元的祥符水厂日产自来水2.5万吨，解决了拱墅区工业用水和城北居民生活用水问题。

在西湖风景园林建设方面，1952年开始疏浚西湖，至1958年完工，完成投资453.83万元，平均水深从0.55米浚深到1.8米，蓄水量从800万立方米增加到1000多万立方米。环湖公路建设，岳庙、灵隐寺、净寺整修工程，苏堤、三潭印月、阮公墩的堤岸加宽工程均告完成。

“一五”计划期间，全市教育经费支出1484万元，为三年恢复时期的11倍，约占财政总支出的16.98%。以西湖区古荡乡为中心，划出810公顷土地开辟文教区。1957年，市区各类学校达869所，其中

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高等学校6所、中等专业学校10所、师范学校2所、普通中学51所、小学615所、幼儿园196所、盲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181448人，其中高等学校学生12004人、中学生31237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6669人。

“一五”计划期间，新建市第二、第七、第八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市五云山疗养院等医疗机构。各区普遍建立卫生所、联合劳动保健站、妇婴保健站、街道卫生院等，形成市、区、街道三级卫生保健网。至1957年，省、市、区级医疗机构286个，病床3840张，卫生技术人员6471人，分别为1949年的453.9%、255.8%、271.5%。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开展，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在文化体育方面，1956年，杭州市成立剧目整理小组，发掘、改编传统优秀剧目，使濒临绝境的11个剧种获得新生。通过整合，组建杭州京剧团、杭州越剧团、杭州话剧团等23个文艺剧团。书法、绘画、电影、美术等文化事业也得到一定发展。1957年，市区有电影院7所、文化站5个、图书馆1个、博物馆1个。体育事业也有了快速发展。建立航海俱乐部、射击俱乐部等体育团体，建成人民体育公园等体育设施。先后举办杭州市运动会、工人运动会、学生运动会，并选派代表积极参加全国和省的各类比赛，多次获得好成绩。

城乡人民生活在“一五”期间得到明显改善。1957年与1952年相比，杭州各经济部门职工的年均工资达634元，增长121.14%；居民储蓄存款达到2641万元，增长到26.94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人民政府从接收的公房中，拿出一部分空房分配给困难职工居住，同时兴建35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占当时全市住房面积的15%以上。1951年开始施行劳动保险条例，为职工支付的劳保费用，到1956年累计达915万元。城市居民就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平均每个劳动者负担的家庭人口，从1950年的3.71人（包括就业者本人）降低到

1957年的2.89人。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56年，农民户均收入557元，农民的商品消费量不断增加，供销社对农民的零售供应额从1953年的350万元增加到1956年的854万元，增幅达2倍多。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得到提高，文教、卫生、科研机构职工的年平均工资，1957年达到714.74元。

杭州在“一五”计划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杭州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正当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较大波折。国内由于社会改造的急促和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未能完全克服冒进的影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恶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右倾的严重性做出了错误估计，“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发现问题后采取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使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诱发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部分农村要求退社等不稳定事件。仅1956年第四季度，杭州就发生了80起群众闹事事件。为了正确解决国内社会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正确处理矛盾的理论和方法。4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广场，向2000余名县（市）以上党员干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问题的解答》的报告，深刻剖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形式及解决办法，并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杭州迅速掀起了学习、贯

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高潮，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分配不公，如合作社的积累与分配，职工的工资、生活福利的改善及粮食供应、就业等；二是作风问题，即一部分党和国家干部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引起群众不满。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由此开始。21日，中共杭州市委下发《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意见》，全面部署整风运动。市委要求全市各级组织认真总结检查本部门在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脱离工农兵群众、脱离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顾团结的宗派主义现象和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在运动中，鼓励各阶层群众采用“鸣”“放”的方式向党和各级机关提出批评意见。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市、区两级机关先后召开200多次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外的批评意见。在杭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工商界等单位也分别召开座谈会，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市委真诚听取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建议，意识到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比较严重，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蜕化变质等问题，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推进整风运动进入高潮。

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各方面人士广泛而集中地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的过程中，一些怀疑、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思想，借党开门整风的机会逐渐冒头并开始蔓延。在杭州，同样有人在提意见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情绪化的过度渲染。部分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中与中国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受到打击的人，伺机散布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进行破坏活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强调“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共中央指示的下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放”、大“鸣”，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杭州在反右期间，有2077名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还有1374人被错误地定性为所谓“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成为后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经济领域出现了冒进的倾向。“大跃进”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批“右倾”、反保守、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全国一步步走向高潮的。

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新修订的“农业四十条”和15年赶超英国的要求，12月召开的省委二届二次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浙江日报》发表了《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的社论，把敢不敢“大跃进”作为“两种对立思想的斗争”，号召共产党人要当“促

进派”，而不能当“促退派”。这篇社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他在对社论略加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

为贯彻省委二届二次会议精神，1958年1月，市委举行全体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到会作指示。会议提出，必须大力克服保守思想，鼓足干劲，乘风破浪，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加速杭州的社会主义建设。《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新的生产高潮。会后，全市各行业分别召开促进生产高潮誓师大会，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跃进”的热潮。在批保守、“大跃进”的声浪中，2月，市委重新制定了《杭州市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草案）》。《规划（草案）》改变了1957年的规划中有关杭州工业发展主要是积极发展丝绸工业，相应地发展纺织工业、轻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及为地方服务的机械工业的思路，提出要在10年内把杭州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大力发展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和机器制造工业，继续发展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其他轻工业。《规划（草案）》对增长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全市工业总产值“二五”期间要增长1.5倍以上，“三五”期间再增长1倍以上。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实际上突出的是“多”和“快”，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总路线一公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学习贯彻的高潮。6月，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对全省经济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前提下，再一次把实现“农业四十条”粮食亩产指标的时间由3年提前到1年完成，对以钢铁和机械挂帅的工业建设作了全面安排，强调开展“插红旗”“拔白旗”^①运动，确保各项高指标的完成。由此，一场速度争先、数

^① “插红旗”，是指在“大跃进”运动中，把那些虚报浮夸、谎报产量的干部作为“先进典型”的“旗帜”；“拔白旗”，是指把那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干部作为右倾、保守的典型加以批判。

量加码、层层加急的建设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以农业生产指标不断拔高为标志的农业丰产竞赛，是“大跃进”开展的首要内容。为了提早实现“农业四十条”规定的粮棉产量指标，各农业社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兴修水利、积肥造肥、推广深耕密植、大搞技术革命、加强田间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劳动。为了带动群众生产热潮，创造高产纪录，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特别是郊区的干部，还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人人种试验田。全市有7000多名干部“会师”田头，搭草舍2112间，带领群众日夜苦战。在这场竞赛中，杭州相对于其他地方不断刷新的高产纪录，显得比较“被动”，乃至受到了一些批评，市委还进行了检查。^①尽管如此，农业生产的浮夸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由于粮食产量数据不实，国家购了过头粮，以致多数地区出现粮食紧张的状况。

1958年5月后，“大跃进”开始向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扩展。在15年赶超英国和全党全面大办工业的鼓舞下，市委发出了“学海宁、赶温州”的口号，杭州市很快出现了一个大办工业的浪潮。市级各机关、医院、中等技术学校，各区、各乡及农业社，郊区农民和里弄居民，都积极筹办工厂。到1958年10月，市、区共兴办各种工场、工厂11091个。在中共中央提出钢产量在1957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后，全国兴起了大炼钢铁运动。杭州、萧山等市、县为浙江省确定的钢铁生产重点地区，9月8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把大炼钢铁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要求“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杭州市出现了各级领导亲自挂帅，采用“小土群”（小高炉、土法上马、群众运动）等多种手段，机关、学校、农村、部队、街道等广泛参与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不计成本、不算代价，大量投入人力物力搞大炼钢铁，不仅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

^① 1958年10月10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在全市工交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浪费，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杭州市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也很快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

“大跃进”催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规模农业水利建设高潮中，大型农业工程需要统一规划和共同投入，原有的几十户的小社已经不能适应要求。1958年6月，杭州农业社比1957年减少199个，每社平均增长了90户。这一轮并社，各地还大办工业、兴办公共食堂、学校以及托儿所、敬老院，使原有的农业社发生了新的变化。7月中旬，新登县还建成了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大社，有1043户、4221人，称为共产主义公社。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全国兴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29日，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湖人民公社宣布成立。到10月1日，《杭州日报》宣布：郊区522192人全部申请加入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先45个乡的599个高级农业社合并建成13个人民公社。与此同时，萧山、富阳等周边县，也由3467个高级社合并成立124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规模一般相当于2到3个乡，平原地区每个公社7000到8000户，山区每个公社3000到5000户，特大公社有2万多户。

“大跃进”运动初期的人民公社是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是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又是相当于乡一级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人民公社的特点可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一大”，就是指规模大。杭州郊区实行人民公社化时，一般每个公社在1万户左右，远远高于人民公社化之前每个高级社平均268户的规模。“二公”，是指在规模大的基础上，公有制的程度高。由于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因而不仅生产资料实行更高程度的公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且在分配上也要逐步试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人民公社化初期，对农业社原有财产

实行“一平二调”，原高级社的土地、房屋和其他公共财产一律交给公社，原来各个农业社的债务，凡属于基本建设或多年才有收益的转由公社负责偿还。社员的自留地、大片林木归公社，转为集体经营。社员的猪、羊和其他较大的副业采取发展集体养畜场，逐步代替私人喂养的办法以逐步归公社经营。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人民公社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并试行粮食供给制。杭州郊区在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时宣布实现了“四化”，即生产专业化、组织军事化、食堂化、托儿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党和人民急于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促使1958年至1960年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速发展。“大跃进”运动急于求成，在建设速度上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制程度。两者均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初步纠“左”中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察觉，并着手纠正。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正式提出人民公社整顿和建设的方针。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基本上还应该是生产队的所有制，要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14句话”方针。会议提出，要算账，“平调”的钱物该退赔的就要退赔。

1959年3月7日至15日，市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14句话”方针。会后，全市农村人民公社纷纷召开万人大会，宣传整社方针，并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经过调整，人民公社确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

生产责任制；纠正“一平二调”做法，实行“等价交换、多劳多得”原则；修正生产指标，允许包产指标低于计划指标。按照“入伙自愿、退伙自由”原则和“以人定量，发给饭票，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方法，整顿办好公共食堂。经过整顿，大多数原先已经解散的食堂又被重新恢复。同时，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市委还合理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适当降低了积累的比例；并宣布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通过整顿，农村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现象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尽管生产指标仍然比较高，但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社员对权力下放和算账退赔的反映比较好，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在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的同时，市委对工矿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计划指标过高、生产不合理、产品质量不过关和招工混乱问题也进行了整顿。市委在1959年对工矿企业的整顿、巩固、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1958年全民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混乱无序局面。经过初步纠“左”，杭州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杭州地处东南沿海一线，出于战备的需要，在“一五”期间，国家对杭州的工业项目投资比较少。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浙江省委、省人委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发展地方工业的一次机遇，决定将重点放在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重工业上，并对以杭州为重点的工业发展进行了部署。1958年后，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和“大跃进”的热潮中，杭州的工业企业建设与发展也迎来了高潮。

根据省委关于“在杭州新建一部分机电工厂”和“充分利用、积极发展、重点建设、统一平衡”等指示，市委对全市工业进行了初步规划：在半山地区建立冶金和建筑材料工业区，以钢铁、冶金为核心。在艮山门地区建立机械工业区，以重型机械制造为核心。建立江干望江门外的食品工业区、萧山龙山地区的化学工业区、古荡留下地

区的电子仪表工业区，扩大拱宸桥地区的轻纺工业区。按照老厂支援新厂、纺织轻工业支援重工业、精简机关下放干部的原则，市委从机关、企业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建成了半山钢铁厂（1966年12月改名为杭州钢铁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玻璃厂、杭州制氧机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从1958年到1960年，全市工业基本建设投资4.4亿元，是“一五”投资总额的5倍多，其中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5个，100万元以上的项目20个。国家新建、扩建、续建的项目共70多个，其中国家、省、市属重要工厂40多个，涉及工业八大门类。这极大地改变了杭州“西湖加手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了杭州的经济实力，也使杭州开始向综合性的工业城市迈进。1960年，杭州工业总产值达到18.48亿元，比1957年的6.08亿增长2倍多，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1957年的12.5%上升到27.6%。^①

在大办工业运动中，为了实现“跃进”的目标，杭州各行各业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1958年1月至9月，全市出现的重大革新项目达6000多件，试制新产品625件，其中36项新技术、22项新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静电纺织等4项为国际首创。1959年工交、基建、财贸战线上共有技术革新建议78222项，已投入生产的有41718项；全年试制新产品760多种，其中370多种正式投产。1960年全市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重点是大搞设备改革，提高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水平。^②

在工交企业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同时，农业战线也掀起了农具的改革热潮。按照1958年7月《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全市

^① 杭州市经济委员会：《1949—1978年杭州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② 杭州市科学技术局：《1956—1965年杭州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4、95页。

掀起了一切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农业生产工具轴承化运动，仅仅1个月就实现了目标，继而又开始农业生产工具改良、半机械化、机械化运动。到1959年10月底，杭州70%左右的生产队实现了主要农具改革，使用新式农具90多种；同时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为了加速农业技术革新，在大办工业的影响下，农村社队企业也得到初步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水利工程也取得重大进展。从1958年开始，杭州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全民办水利建设的热潮。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继新安江水电站和青山水库之后，肖岭、霞源山等一批中、小型水库和遍布各地乡村的水利设施也相继开工。到1959年1月，市郊完成大小水利工程2478处，出工14.5万多人，另有2000多处工程陆续开工。这些水利工程，既为当时的农业增产增收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农村水利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杭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园林绿化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杭州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在纠“左”的前提下，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在教育方面，新建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浙江化工专科学校（今浙江工业大学）等7所省属高校、3所市属高校和一批中等专科学校；在爱国卫生方面，1958年1月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卫生情况，由此形成了影响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等等。

尽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运动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但是杭州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抓住机会实现了杭州的大发展，从而为杭州此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在全面调整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教训，使全党逐步清醒过来。党中央、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全面调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左”倾思想的根源问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但全面调整促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反右倾”斗争和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改变了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初衷，从纠“左”转向反右。“反右倾”斗争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

在庐山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全市各系统召开党组织会议，围绕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把纠“左”中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言论和行动，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思想和行为，或干劲不足进行批判。1959年12月4日至16日，中共杭州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吴宪致开幕词，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高速度发展工业，1960年工业总产值要确保比1959年增长40%以上，力争增长50%至60%。会议还提出了粮、棉等主要“跃进”指标，以及人民公社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问题。会议提出，在贯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过会议强调，进行以“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戴帽子，不拔白旗，不作组织处理。在继续“跃进”时，尽可能地从杭州实际出发，重视和支持农业生产，对人民生活进行必要的安排。由此可见，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的一些表现有所认识和抵制。但

是会议作出了要高举“三面红旗”^①，继续同“安于中游”“甘居下游”等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作坚决斗争，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进一步向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开战。12月16日至17日，中共杭州市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吴宪为第一书记，王平夷、王子达、关器、李元贞、李濒如为书记处书记。

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并且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跃进”。

在工业发展方面，从杭州的资源情况和生产需要出发，市委制定了发展“小土群”“小洋群”^②企业的规划，并采取了分期分批、逐次推进的办法。在大办企业中，市委强调，“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是发展工业生产的方向。1960年一季度，全市建成并投产的“小土群”“小洋群”工业企业就达60个、小电站167座，并改造了29个手工操作的土纸厂。全市企业职工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竞赛。在一季度后，又提出4月要大超3月，第二季度大超第一季度，实现全面的更好的持续“大跃进”。

在农业生产方面，市委发出建立“丰产畝”的通知，要求人民公社、生产队扩大各种农作物“丰产畝”的面积，提高亩产指标。在“反右倾”、实现更大“跃进”思想指导下，1963年3月11日至26日，市委召开农业五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发展公社经济和整顿公共食堂等问题。会议认为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是必然趋势，在当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要大力发展公社经济，但在实际工作中，导致“共产风”和新的“一平二调”，导致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

^①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是时代的历史产物。

^② “小土群”，是指小型企业、土法上马和群众路线；“小洋群”，是指小型企业、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群众路线。

在城市，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后，杭州也开始试办城市人民公社。5月1日前夕，上城人民公社等第一批3个人民公社成立。5月底，全市城区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新的“大跃进”中，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特别是强调发展重工业，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的资金和物资，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从1957年至1960年的3年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4.8%，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88.6%，而农业产值年均递减4.3%。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快速扩张，摊子过大、战线过长，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严重失调，原材料与加工工业不配套，产品与社会需要脱节。1960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22144万元，比“一五”时期投资的总和还要多2300多万元。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全市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65.72万人增长到79.66万人。全民所有制职工从1957年底的15.79万人增长到32.84万人。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挤掉了农村劳动力，削弱了农业战线，增加了农业向城市提供粮食、农副产品的负担。穷过渡、“五风”盛行，严重挫伤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加上干旱和台风暴雨灾害的侵袭，196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10.82%。同时，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副业基本绝迹。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严重紧张，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

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8月，周恩来等在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这个方针，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经济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号

召“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工业，大办粮食”，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县（联社）和公社由书记挂帅，建立专门组织，动员和组织了9.5万多人充实到农业第一线。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居民响应省委、省人委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区种菜运动。从9月开始，杭州市对饮食业、茶食业等主要粮食制成品实行凭票供应，并通过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工业原材料保障生活供应等措施，千方百计改善人民生活。

为充分了解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中共中央组建了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调查。由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率领的中共中央调查组到达浙江进行调查。调查期间，毛泽东几次来到杭州，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调查组从1961年1月24日开始，先后到桐庐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场口公社友谊管理区环二生产队进行细致的调查。中央调查组经过历时约100天的调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真实反映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的称赞和支持，同时也为全党各级党组织的调查研究工作起了表率作用。市委也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4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检讨工作中的失误。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下达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信，宣布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公社结合算账退赔，以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调整党的农村政策为重点，普遍开展了整风整社。

在深入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1961年5月，中共中央对《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三分供给制”（七分按劳分配）和公共食堂，提出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特别是生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其收入归社员所有；人民公社各级都要加强民主管理，各级干部必须坚持民主作风等。为贯彻“农业六十条”，市委普遍调小了人民公社规模并全面进行整社，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同时，贯彻“八字方针”要求，1961年8月，市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体会议对各条战线提出具体调整要求。会议提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次序，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适当缩短工业和文教战线，加强农业战线特别是粮食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适当加强手工业和轻工业战线；适当缩短加工工业战线，延长原材料工业战线。在财政金融方面，市委要求继续组织收入，紧缩财政开支，加强现金管理和财政监督，进一步压缩集团购买力。

1961年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到1962年1月，杭州市共精简14.7万余人（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学生及回乡的民工）。回农村参加生产的有7万多人。这使农业劳动力增加，商品粮销售量和工资都大幅下降，减轻了市场供应压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停建、缓建32个项目，全市建设投资总额1961年比1960年减少60%，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也开始得到比较合理的调整。1961年的调整及其取得的成绩，对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开了局，打下了基础。

1961年的调整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开始出现转机，但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对调整工作的认识，全党也存在一些疑问和分歧。1962年1月到2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

称七千人大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王平夷、王子达及县、企业负责人共17人参加会议。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思想，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会后，按照中央部署，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及商业体制调整政策的贯彻，使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市场情况日益好转。在对工农业生产进行调整的同时，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进行调整或整顿，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做法，使各项事业得到发展。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在干部中开展甄别平反工作，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为一部分被错误定性为右派的人摘掉右派的帽子。

经过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杭州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的好转比预期要快得多。1963年连续下降的趋势扭转，开始逐步回升。到1965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超过105万吨，比1958年增长26.61%；畜牧业产值达1.36亿元，超过1957年的水平；农田水利、化肥及农业原料得到极大缓解。工业产值达到151152万元，比1957年增长248.47%；主要工业产品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市农副产品、日用商品市场供应好转，价格稳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54384万元，比1958年增长7.2%，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经过整顿，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任务顺利完成。

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七千人大会后，经过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党在发展道路问题上，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分歧也逐渐发展，并使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偏离了正确的轨道。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作出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决定的同时，也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出了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根据中央的部署，10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从1962年冬季开始在全省进行一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放在改造落后队。

在市委常委先期组织学习的基础上，10月20日，中共杭州市委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市委认为，七千人大会后，杭州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没有刮“单干风”，但存在着阶级斗争观点不明确、旗帜不鲜明的问题。会议提出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随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讨论会，学习讨论阶级斗争、面临的形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问题。根据毛泽东关于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指示，市委在强调阶级斗争观点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学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总体思想是既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又要重视阶级斗争。在10月31日县（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市委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的议程时，市委书记王平夷强调，在传达学习中“要把当前工作抓起来”，“阶级斗争只搞到十七级以上，下面不搞”。《杭州日报》1963年的元旦社论中说：“1963年，全市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在城市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

为了取得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经验，1963年2月，浙江省委派出工作队在萧山县东许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3月11日至12日，市委

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参加省委萧山试点的同时，从1963年5月中下旬开始，市委抽调市、县、区、公社四级干部及参加试点的大队支部书记共328人（其中县委书记和市委副部长以上干部16人，县委副书记以上干部76人）组成工作队，由市委副书记陈侠带队到西湖区转塘公社进行社教试点。在试点推进的过程中，市委在全市范围内，特别是农村，进行了“双十条”^①的宣传和学习，并要求各县县委和郊区区委分别选择1至2个公社进行试点。在试点工作中，主要的做法是参照前期试点经验，向干部群众宣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3个文件^②和“双十条”，组织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领导干部带头层层“洗澡”“下楼”^③。最后进行制度和组织建设。

在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1964年5月初，市委办公室制定了《杭州农村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部署》。社教运动在广大农村普遍展开。

城镇“五反”运动从1963年3月开始全面展开。5月以前，重点是反对铺张浪费、违反制度、生活特殊化，领导干部“洗手洗澡”，下“生活楼”。5月以后，根据中央要求，运动转入较集中地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阶段，领导干部进一步“洗手洗澡”，下“工作

① “双十条”：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1月，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前十条”和“后十条”（合称“双十条”）下发至全国城乡每一个党支部。

② 3个文件，指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即《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③ “洗澡”“下楼”，是当时的俗语，指干部的自我检查。在自我检查中自觉交代个人在思想、生活、作风上存在的特殊化以及阶级立场模糊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并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洗澡”“下楼”。

楼”。1964年1月，市委组织各部、局级领导和城区区委书记进行自我检查。通过检查，市委认为运动还存在许多问题，下一步主要是集中进行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解决机关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的问题。根据市委的部署，在工厂企业和机关干部中开展“五反”运动，督促各级干部“洗澡”“下楼”。

党中央、毛泽东一直强调，城镇“五反”和农村社教运动要结合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来进行。根据这一要求，市委在开展社教运动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要把运动与生产、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开展运动促进生产和工作。在工业企业“五反”运动中普遍开展了反浪费、比先进、争“五好”^①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市属商业企业中全面开展了从反浪费、改善经营管理入手的增产节约运动。全市10多万职工投入这一运动，1963年，工交、财贸战线评出“五好企业”21个、“五好班组（科室）”240多个、“五好职工”1300余名，以及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2万多个。农村社教掀起创造“四好社队”^②、争做“六好社员”^③的运动浪潮。1964年，出席市、县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的“四好社队”就有5000多个。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根据这个规定，农村和城市的社教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也称“大四清”）。到1966年上半年，市、区两级机关半数以上干部参加了“四清”运动。8月以后，“四清”运动被“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所取代。

① “五好”，指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学习文化技术好、管理好和互相协作好。

② “四好社队”，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遵守政府法令；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原则；集体生产好，社员收入逐步增加；积极支援工业生产和国家建设。

③ “六好社员”，指政治思想好、集体劳动好、团结互助好、爱护公物好、遵守法令好和勤俭持家好。

在社教运动中，市委很大程度上处于认识上不断紧跟、工作上不断试点、部署上不断调整的状态。尽管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在不断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市委对干部的组织处理还是比较慎重的。同时，市委始终强调要把运动的成效落实在生产上，从而保持了杭州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经济调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参加“四清”的单位在1965年提前完成国家计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有显著提高，达到了优质、高产、低耗的要求，一些企业的生产在这一年还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十年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杭州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杭州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从全国、全省工作的大局出发，结合杭州实际，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领导杭州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有过痛苦的失误，经历了难忘的曲折。尽管在这一时期中“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但总的来看，市委一直把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勇于纠正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带领全市人民艰苦创业，在杭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在这十年中，全市工农业生产增长较快。与1957年相比，196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3%，达到22.97亿元，其中，工业增长122.3%，达到15.12亿元，农业增长22.6%，达到7.86亿元。

这一时期是杭州全面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时期。1957年至1965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达14.5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前7年总投资的7倍。这一时期，包括新安江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杭州半山电厂、杭州重型机械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建成投产，钢铁工业、现代化学工业、建材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电子工业

等诸多新的行业建立，为杭州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传统的轻工、纺织和食品工业也扩大了生产领域，日用机械、化学纤维和塑料制品等新兴产业开始起步，新建了杭州第二棉纺织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等骨干企业。轻工业产品种类增多，产量不断扩大。全市初步形成了从艮山门到半山的重工业区、望江门外的食品工业区、萧山龙山化学工业区、拱宸桥轻纺工业区等重要工业基地，为杭州市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一时期，杭州的农业生产也有新的发展。通过大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1965年末，全市农田有效排灌面积245.61万亩，比1957年增加43.5%。机电排灌面积161.53万亩，是1957年的4.3倍。1958年至1965年，全市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土石方23618万立方米，是前8年的5.3倍。1965年，除林业下降了16.4%以外，农、牧、副、渔产值全面增长。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财政状况改善，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发展。196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亿元，比1957年增长20.8%。国内预算财政收入2.99亿元，比1957年增长72.2%。1965年，全市高等学校10所，比1957年增加4所，年末在校学生1.52万人，增长26.3%。高中、初中、小学在校学生增长48%，幼儿园入园儿童增长5.1%。卫生、邮政、城区道路、园林绿化、市政交通等方面都有所发展。

总而言之，对杭州来说，这十年是努力探索的十年、艰苦创业的十年，也是曲折发展的十年。通过这十年的发展，杭州市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锻造了一支创业型的人才队伍，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内乱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

本章提要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直接插手，以及地方帮派分子的肆意破坏，杭州成为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然而，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始，“左”倾错误就受到杭州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他们与极左路线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忍辱负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最终引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四四运动”。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经过“文化大革命”严峻考验的杭州各级党组织领导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迈向全新的时代。

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与极左方针的贯彻

经过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调整，杭州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而“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6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就杭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部署，强调“要及时掌握情况，不论学校工厂，都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加强领导，除开展‘文革’的几个重点企业外，其他企业不主动号召贴大字报，群众贴出来，领导积极支持”^①。

杭州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兴起于文教领域。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杭州第十一中学等市区几所中学的学生率先贴出大字报。根据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对文教系统由点到面进行文化革命的部署进行调整，提出允许各校师生贴大字报、开声讨会，支持师生起来“革命”。在省委对杭州的“文化大革命”作出部署后，6月5日，市委再次向各区、各部门发出指

^① 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员会工作日志（六月份）》（1966年7月）。

示，强调“要密切注意形势变化，领导思想必须紧紧跟上”，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积极加强领导”；同时，提出“大字报不能贴于校外，学校不能停课”等指导性意见。

1966年6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的消息。当晚，《杭州日报》发表市委授权起草的《杭州人民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拥护新的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次日，全市许多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商店和人民公社纷纷举行集会，写大字报，投书报社电台，表示热烈拥护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决定。运动逐渐冲破原来的限制，不单出现了部分学校停课，一些学生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校外，并到市委上访，要求派出工作组到校领导运动。反对“反动学术权威”的“四大”^①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声讨的内容也从声讨“三家村”发展到揭发学校内的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对学术权威”。

面对急剧兴起的运动，根据市委常委会的决定，从6月23日起，市委以市委联络组的名义向全市普通中学、专业学校、剧团和杭州日报社派出工作组。工作组进驻以后，一方面支持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对群众意见较大、被贴大字报较多的基层领导成员，帮助他们到群众中做好检查；一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组织、发展坚定的左派队伍，依靠他们去发动、团结和教育群众。在团市委的配合下，各驻校工作组依靠各校共青团组织，一度将占全市中学生中约30%的团员组织起来，发挥核心作用，团结广大学生。在工作组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度失控的学校运动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得到了多数干部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1966年8月6日，根据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① “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揭发、大批判。

议和8月5日省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市委召开第一次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将各校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各校师生选举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撤销工作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进一步削弱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内乱局面的出现。

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简称“斗批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8日，“十六条”向全国播发。9日，《杭州日报》全文刊登“十六条”的内容。此后，市委组织300多名机关干部分头到部分工厂、学校、机关和文艺团体进行宣传，大批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向市委和市人委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打倒‘走资派’等一切‘牛鬼蛇神’”“打破‘四旧’”。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全市各大专院校、中学和部分工厂、街道、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类造反派组织纷纷建立，“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学校内部发展到全社会，斗争的矛头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发展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者。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激化，杭州出现了学生“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部分企业生产停产闹革命等乱象。

北京和部分外省红卫兵到杭州串连，到各校大肆宣扬“怀疑一切”“炮打一切司令部”，介绍“冲机关经验”。杭州部分中学生和少

数工人打着“炮轰市委”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市委机关，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扩散开来。

全面夺权与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6年10月初，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过去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当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会后，各地造反派队伍迅速扩大，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也迅速升级。

1966年10月底，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工人翁森鹤^①等20余人擅离生产岗位，向中央接待站反映所在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所谓问题。市委接中央接待站通知后，派人到厂传达市委的意见：逐步撤销工作队，改派联络组，增补厂“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内的工人代表名额，使之占多数等。在翁森鹤等人“赴京告状”的影响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杭州市以企事业单位人员为主，包括市、区机关单位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建立，并迅速取代了学生红卫兵，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导力量。

11月13日，省、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数万名造反派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检讨，宣布撤销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市委也随之宣布撤销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并宣布“文化革命期间被工作队和企业党组织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应一律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11月28日，市委就全市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所谓“错误”作出检讨，市委常委及市委派至各校

^① 翁森鹤，杭丝联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反革命、打砸抢、敲诈勒索等罪行，1978年被依法逮捕，后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的工作组也分别到校作检讨。12月底，造反派组织先后多次聚众冲击市委，市各级行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革命”的篡党夺权恶潮。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以“省联总”^①为主的浙江和杭州的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1月10日，“省联总”下属的杭州市24个造反派组织“授权”杭州日报社造反派接管《杭州日报》。次日，《杭州日报》出刊“新1号”，宣称“新的《杭州日报》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吹鼓手，为组织革命造反派的造反队伍而战”。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指示。当日，杭州市市级机关造反派组织和市公安局造反派组织分别宣布对市级机关和市公安局夺权。16日，“省联总”和所属30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展开“省市联合夺权”行动。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市委被迫多次发文，要求各下属单位要在“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及时向‘省联总’汇报工作情况”。市委在造反派的胁迫下，未经过任何正常组织程序，对大批干部给予停职反省、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到1967年1月底，市级机关和全市各级党政领导权被造反派所夺取，各企事业单位甚至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落入造反派之手，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① “省联总”，全称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

在掀起夺权狂潮的同时，造反派对市委负责干部的迫害也逐步加剧。1967年1月，市级机关造反派组织在研究所谓“斗争大方向”问题时，拟定了“打倒王平夷，砸烂王家店，彻底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行动纲领。“杭州市炮打旧市委联络站”采用先搞臭后调查、先写材料再搞旁证等弄虚作假方法，将大部分常委诬陷为“假党员”“老反革命”。王平夷被定为“混入党内的杭州地区头号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于1970年6月18日含冤去世。杭州的许多干部、群众也受此案株连，遭到打击迫害，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的一起重大冤案。

在“全面夺权”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的“省联总”和“红暴派”^①两大造反派组织，出于“夺权”的需要，互相攻击。1967年6月至9月，杭州及所属的富阳、萧山、余杭、临安等县，先后爆发大规模武斗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鉴于全国普遍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和不断升级的武斗情况，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作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据此，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甚至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

3月23日，以浙江省军区为核心，结合驻浙三军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省军管会”），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省军管会成立后，为了履行军事管制和军队抓工农业生产的职责，杭州军分区机关和各县区人武部派出大批干部到“三支两军”各点指导工作。同日，省军管会发布决定，对杭州市公安局及城

^① “红暴派”，是指1967年2月由翁森鹤等人组织成立的“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是与“省联总”对立的浙江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

区各公安分局实行军事管制，并向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先后派驻军代表。28日，省军管会杭州市工作组进驻市委。此后，各县区人武部也会同当地驻军分别对派性较重、秩序混乱的临安、富阳、建德、淳安、余杭等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实行军事管制，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造反风潮开始消退，工作逐步走向稳定。到1967年12月底，全市各单位基本实现革命大联合，60%左右的老干部得到解放并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在抵制派性和“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述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①于是，成立“三结合”^②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就成为造反派夺权后成立新机构的目标。9月，省军管会决定开展建立杭州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并组建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全市掀起一轮建立革委会和“解放”干部的高潮。到11月底，全市120多个基层单位分别建立了革委会，98%的企业单位、88%的中学、市郊15个公社中的大部分按单位实行了“大联合”，全市178名被打倒的部局级干部中有76名被“解放”。

随着两大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实现和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的成立，成立市革委会的条件已相对成熟。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省军管会的批复，12月20日，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子达、汪石川等分任主任、副主任。市革委会成立后，原杭州军分区生产办公室的工作逐步并入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1968年4月12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4页。

^② “三结合”，指由老干部，人民解放军、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结合组成的领导班子。

日，中共杭州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简称“市党的核心小组”）成立，作为全市党的领导核心，指导市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至1968年底前后，市属各区、县也相继建立革委会及党的核心小组。

市革委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基本的秩序和权威，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时两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剧烈。

极左方针的贯彻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发展的结果，它的危害不仅反映在政治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也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运动发表了许多“最高指示”，成为开展“斗、批、改”运动的理论依据。由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一系列“最高指示”的群众运动被迅速推向高潮。在杭州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先后掀起了印刷和发行毛泽东著作、举办毛泽东思想培训班和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高潮。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培训班的高潮中，仅1968年上半年，全市就举办各类学习班3万余期，有230多万人（次）参加。市革委会还发动了群众性“三忠于”^①和“一祝二唱三读”^②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从1968年8月底，市革委会开始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城市和农村的学校、文化、卫生系统等单位，对这些单位“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1968年，全市有10万多名工人、贫下中农和军队指战员参加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表面上制造了一片理论学习的繁荣景象，实际严

^① “三忠于”，是指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② “一祝二唱三读”：一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唱，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读，读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语录、读毛主席最高指示。

重背离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助长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

1968年，《人民日报》等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查清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号召。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1968年4月，市革委会就建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各县、区、局也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运动同步展开。当月中旬，市级机关就有114名干部被清理，其中部局长59人，涉及的性质是所谓的叛徒、特务和汉奸、土匪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大批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导致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同时，杭州还发生了“砸烂公检法”重大事件。市公安局42.8%的干警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接受审查，市中级人民法院30%的干部被批斗或非法隔离审查，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被长期“靠边”、批斗。企事业单位的保卫干部和治保人员被打成“反动公检法的黑爪牙”“反革命地下军”或作为特务揪斗。全市公、检、法系统彻底瘫痪。

在国家机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各地大量创办“五七干校”，让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1968年10月，建德县革委会率先组建了县“五七干校”，将一批县级机关干部下放干校劳动。到1968年底，全市有5000多名各级干部，先后到市县两级“五七干校”或公社、农场、生产队插队劳动。同时，市工交、财贸、文卫等系统和各区级机关70%左右的干部也陆续到生产队、工厂或农场办“五七干校”，一面进行“斗、批、改”，一面参加劳动。全市直属厂矿企业中，约78%的单位将本单位70%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下放到生产第一线。

在大办“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的同时，全市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步掀起高潮。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青年学生递申请、写决心书，要求奔赴农村、边疆。在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时间里，全市共有116880名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

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全面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于1964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主要内容。杭州广大农村地区通过普遍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兴修水利、围垦海涂等生产建设中，作出了显著成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演变成“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经验，成为向农村推行“左”倾错误的工具。以“政治评分”代替“工分挂帅”和“物质刺激”，用“只能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搞“三献一并”^①，影响了农村干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响应毛泽东“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1969年12月底，省革委会不顾浙江的实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大搞夺煤大会战，提出1970年、1971年全省煤产量达到200万吨和300万吨的目标。在夺煤大会战中，全市大搞“小土群”煤窑。“为革命找煤，为革命报煤，为革命节煤”，全市每日出动找煤的群众，最高时达16万人。1971年8月以后，杭州市的夺煤大会战运动与“工业学大庆”运动结合，并逐渐被后者所替代。夺煤大会战是一场在不计成本、不顾科学条件情况下进行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失败的运动。

“斗、批、改”的“左”倾思潮也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学校领导体制开始改革，逐步建立起由学生、职工和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体制。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大办各种“五七学校”。文化系统的“斗、批、改”，围绕摧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部”和“工农兵占领舞台”“突出革命化”进行。卫生体系的“斗、批、改”，则在“打倒城市老爷卫生

^① “三献一并”，指献出自留地、宅基地、零星果树和合并生产队。

部”的口号下，将许多有经验的专家、领导，以各种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予以打倒，将一大批医务人员下放基层劳动锻炼，严重影响了城市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同时，刚刚起步的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影响，初步得到扼制的以血吸虫病为主的农村疫情呈上升趋势。

在极左思潮加剧发展的背景下，1970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共杭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王子达代表杭州市党的核心小组作大会报告。报告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号召“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把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坚决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报告提出“在二三年内把各县建成大寨式县，三五年内实现粮食、煤炭自给”等目标。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王子达为市委书记，汪石川为市委第一副书记，邱强、周峰、徐树年、程忠顺为市委副书记。大会全面贯彻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路线，所提出的一系列“左”的政治、经济方针，在此后的几年里主导了全市政治、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走向，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大会提出要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等指导性意见，对后来的一些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纠“左”与反纠“左”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以一批老干部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和许多群众的各种方式的抵制、抗争。林彪、陈伯达^①等大搞阴谋活动

^① 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也引起了毛泽东高度警惕和严重不满，在一定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

在整风中努力纠正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一些“左”的做法和现象就受到了市委的抵制。市委希望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把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并在实际行动上进行了抵制。在“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同时，纠正“左”倾错误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

1970年8月底至9月初，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林彪、陈伯达大搞阴谋和分裂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我的一点意见》，组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并宣布对其进行审查。1970年11月和1971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等文件，推动全国由上而下的“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的开展。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1971年1月起，“批陈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开展。在市委的部署下，各级领导班子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此后又在全市近万名基层党员干部中，分批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①发生。10月，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把林彪事件传达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并要求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2月中旬以后，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从10月开始，市委将“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采取先党内后

^① 1971年9月13日，在策动武装政变阴谋破产后，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地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宣讲、与群众一起学习讨论等方法，从机关到基层全面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精神。市革委会举办了2期大批判培训班，组织了6支大批判战斗队进行巡回批判，各单位也召开了群众批判大会。然而，由于省委个别领导采取消极方式极力开脱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浙江的揭批林陈反党集团运动的开展遇到较大阻力，杭州的“批林整风”也一直停留在表面阶段。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任浙江省委常委，主持省委工作。省委班子的调整，全面推动了全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11月，省委决定陈安羽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主持杭州市的“批林整风”工作。1973年1月，市委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和工作会议，对市委两名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解决了“市委领导‘批林’不深不透，划不清界限，不坚决从宗派主义的圈子里跳出来”的态度问题。会议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要求在各个领域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批林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及时引导到搞好生产、战备和各项工作中去，努力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尽快改变杭州地区面貌。

在开展“批林整风”、批判极左思潮期间，杭州在省委的领导下，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入手，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一大批干部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迈出了纠“左”的步伐。

从1972年11月到1973年7月，陈安羽、陈侠、万进东、王醒等一批老干部被充实到市委、市革委会领导班子。市委、市革委会对两委机关进行调整，将市革委会办事组和市委办公室合并，改组为市委、市革委会办公室；撤销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设立组织口、宣传口、工交口、计划口、财贸口和政法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市公、检、法系统全面恢复职能；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不但恢复了活动，发展了会员，还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进行

了换届。党的统战、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左”倾错误，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各项事业重新发展起来。1973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高校招生还应进行“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用开卷形式”的要求，杭州举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次高校招生文化考试。

在“批陈整风”时期，杭州的社会政治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平稳态势，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970年6月，市革委会下达《杭州地区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快战略后方建设，改变工业布局，积极发展粮食生产，进一步建立强大的农业基础”，“尽快建立以‘五小’^①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的指导思想和1970年起五年的基本任务目标。“四五”计划的制定，初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完全无序状态，促使20世纪70年代初全市经济基本形成向上发展的势头。

1971年6月，“工业学大庆”运动兴起后，市委提出要“摆正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位置”，全面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此，市委对一些搞派性的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重新恢复了一些被废弃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以老工人为主体、吸收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质量攻关小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全市工业经济有了较大进步。197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连续第三年实现10%以上的增长。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也得到了发展。1970年中央重申继续贯彻“农业六十条”，是杭州农业农村工作纠“左”的转折点。1970年、1971年杭州农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连续两年达到8.4亿元，1972年突破9亿元，达到9.16亿元，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

^① “五小”，一般指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五种工业企业。

16.6%；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41万吨，比1965年增长33.6%。^①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大力开展，杭州地区涌现出了被誉为“江南大寨”的“南堡精神”及“围垦精神”。197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75亿元，比1965年增长62.5%；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46亿元，比1965年增长66.2%。^②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杭州经济发展的最高值，1973年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杭州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伴随着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对外活动的相对频繁，杭州的城市建设受到重视，一批新型大型公用建筑逐步兴建。笕桥机场候机大楼、杭州剧院建设完成，杭州饭店、中山公园、花港观鱼及三潭印月的九曲桥等整修、加固一新，西湖园林景区、灵隐寺、虎跑、六和塔等风景点及旅游配套设施得到改善。交通、供水、公交、环保等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生育等政策也开始实施。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增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央的势力。王洪文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主题讲话，煽动造反派进行“反潮流”^③。党的十大后，参加大会的翁森鹤等一批在整党建党期间被吸收入党并充实到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返回浙江，打起

①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杭州市统计局：《杭州五十年》，杭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64页。

②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杭州市统计局：《杭州五十年》，杭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3页。

③ “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党的十大对反潮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表述，就是以“三要三不要”为标准来区分正确潮流与错误潮流。“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煽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杭州的“反潮流”行动，直接导致派性斗争升级，形成新的派别。

“反潮流”的旗号，拉帮结派，不断向省委、市委发难，严重阻挠全市的“批林整风”运动，使各项纠“左”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和进行下去，并再次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

9月初，市革委会常委内的造反派先后率人冲击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的十大文献学习会，占领市委会议室，并在杭州街头张贴大字报，指责市委领导的“批林整风”是“否定文革，打倒一大片，组织路线恢复文革前的旧政权，排斥打击新干部，包庇老干部”，声称要“反潮流”。针对“反潮流”活动，9月21日，市委常委会指出，不能回避矛盾，不能瘫痪，要领导，要指挥，不能因为有大字报，就顾虑不敢工作。市委还召开多个会议统一对“反潮流”问题的认识。在市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和郊区区委书记会议上，多数干部纷纷表示“要发扬‘五不怕’精神，坚决抵制错误的路线和政策”。省委也多次指示，不要到处串连，搞派性活动。

受江青等人的煽动，省市造反派罔顾省委、市委指示，“反潮流”活动越闹越大。从10月上旬起，一批帮派人员多次冲击省委。11月，造反派又鼓动300多人占据屏风山招待所，组织所谓“赴京控告团”（“山上派”）对抗省委、市委，造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全市政治和社会的严重动荡。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早在1月13日，江青就写信和派人到浙江某部驻军防化连送材料，进行“点火放炮”。2月4日，《人民日报》撇开浙江省委，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批林批孔”取得初步经验》，提出要联系浙江实际，批判省委负责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复辟思潮”（简称为“两否一倒”）的所谓“批林批孔”经验，定下了浙江“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基调。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省市造反派的“反潮流”活动遂与“批林批孔”运动合流，批判所谓“两否一倒”成为其切入口。1月15日，省市造反派召开所谓纪念“一月风暴”万人大会，并联名发表文章，扬言“不打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想，不粉碎开倒车的阴谋，决不罢休”。在1973年纠“左”中进行的市委、市革委会组成机构调整，全部被推翻恢复原样，宣布“凡是有关生产指挥组的一切事宜都不再办理，上交印章，有关事务由常委直接处理”，“不承认现在所谓的市委办公室、市革委会办公室这个机构，再不能继续工作”，进行公开“罢工”。2月12日，市委成立城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4月8日更名为市委“批林批孔”小组）。随后，各县、区以至人民公社都建立了“批林批孔”小组。在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全市各级“批林批孔”小组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实际上一度夺去了党委的领导权。

1974年2月中旬，市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连续召开原各组负责人会议和区、局负责人会议以及市革委会机关干部大会，布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3月1日，市委正式发文恢复市委、市革委会办事组。此后，又重建了工宣队办公室，市文教卫生各局及城区工宣队办公室也相继恢复。市革委会办事组和工宣队办公室恢复后，即对一批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受到审查、作过政治结论的造反派进行了重新审查，否定了原结论，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和工作；对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被推翻原错误政治结论的老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维持原错误结论，要求他们停职检查，个别人甚至被取消了四届人大代表的资格。从3月2日起，在市委“批林批孔”小组的操纵下，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否定了市委有关“批林整风”的会议精神，对陈安羽、陈侠、万进东三人进行所谓“两否一倒”批判，并将万进东和市委组织口2名负责人交送屏风山帮派据点关押批斗。

为了进一步配合造反派的“反潮流”活动，揭开所谓“领导班子

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那些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1974年5月，市委“批林批孔”小组无视省委关于“地市县不开三全会，不许层层揪斗干部”的指示，擅自召开市委、市革委会、杭州警备区党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统称市“三全会”）。会议完全否定了“批林整风”运动期间市委纠“左”所做的工作，对陈安羽、陈侠、万进东等人错误地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批判”，号召所谓“要狠批克己复礼，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狠批中庸之道，坚持斗争哲学；狠批上智下愚，大搞群众运动”。对于市“三全会”的召开，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多次给予严肃批评。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提出“改造民兵，重建民兵”的口号。1974年2月14日，在造反派的压力下，市委正式发文成立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市委“批林批孔”小组违背省委关于仅在杭、宁、温三市成立民兵指挥部的指示，不但将民兵指挥部组织扩大到县区一级，而且公然向省委打报告要求配发枪支弹药。6月至9月，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撇开警备区、人武部和各级党委，直接批准建立各级民兵指挥部共219个单位，人员发展到5万余人。在市委“批林批孔”小组个别负责人的指挥下，市民兵指挥部肆意调动民兵，冲击上访群众聚集的招待所、所谓不同观点人员的会场等，造成多次大规模武斗，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造反派先后通过“冲口复组”，排斥、批斗老干部，建立杭州市民兵指挥部，一度篡夺市各级党委和军事机关对民兵的领导权后，又在各级“批林批孔”小组支持下，大搞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干部（简称“双突”）。1974年3月11日，市委“批林批孔”小组以市委名义向省委打报告，要求吸收翁森鹤、贺贤春^①等10人为市委常委，其

^① 贺贤春，“文化大革命”中的帮派分子，曾任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月18日和21日，中共浙江省委批准对其实行隔离审查和拘留审查。24日，他畏罪自杀。26日，省委批复杭州市委的请示报告，同意开除反革命分子贺贤春党籍。

中3人为市委副书记。由于该报告未获省委批准，市委“批林批孔”小组便擅自将翁、贺等6人安排为市委“列席常委”，为全市大搞突击提干开了先例。3月19日，翁森鹤等人联名致信市委，提出一份要求充实到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各大组中去的60多个“敢于反潮流的工人代表”的名单，要市委“迅速研究并且三天内落实解决”。在造反派和多方的施压下，市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其中50人分别任市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及市公安局等组办局负责人。此后，市和各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及基层单位，普遍刮起了“双突”之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杭州市突击入党的总人数为8278人，突击提干近3500名^①，其中许多人进入市级机关及各县、区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双突”对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由于在“批林批孔”旗号下的批判所谓“右倾复辟思潮”和“双突”的恶劣影响，全市局势出现新的混乱，干部人人自危。“双突”引起的大换班，在一些单位发展成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分裂了党组织和群众，导致武斗发生、企业非生产人员增加、机构臃肿，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杭州市国民经济状况再度恶化。

三、全面整顿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浙江“双突”引起的严重混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催生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贯彻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和全面整顿取得的成效，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步认清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场革命或社会进步，从而形成了一场自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党中央顺应人民的意志，果断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① 市革委会政工组：《关于杭州地区组织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74年7月16日）。

开展全面整顿

浙江省“双突”等严重问题所引发的不稳定局面，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74年11月和12月，中央先后通知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杭州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共16人赴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浙江问题学习班，磋商形成《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强调：两派必须无条件停止武斗，释放被抓人员；不准抢枪、发枪，不准跨地区、跨行业搞串连、拉队伍；对“双突”问题要慎重处理等。然而，在江青一伙的直接干预和翁森鹤等帮派头目的破坏下，中央的指示不但没有贯彻，反而是派性冲突更加激烈。

1975年2月8日，毛泽东视察南方到达杭州。在了解严峻情况后，他批准采取措施，解决浙江问题。4月13日，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中共浙江省委落实整顿措施。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7月13日，省委经研究讨论，形成《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简称《请示报告》）报送中央。7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的《请示报告》和《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即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

7月20日，省委宣布调整杭州市委领导班子，张子石、陈文书分任市委第一、第二书记。23日，省委决定张子石、陈文书、蒋宝娣、周峰、陈安羽、陈侠等组成杭州市委办公会议，代替市委常委会。市委就“批林批孔”以来的问题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全市各级党组织召开会议，公开传达中央指示精神。

在学习传达的同时，根据中央〔1975〕16号文件的指示精神，省委和市委开始着手解决帮派问题。7月8日，省委采取果断措施，拘留审查翁森鹤。27日，省委又决定将省市其他主要帮派分子张永生、贺贤春等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撤销三台山帮派体系山头“浙江省工人政治学校”，查封所有文件、物资、武器弹药、车辆等。与此同时，市委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市工代会和各县区局工代会。8月4日，市

委又严令通过“双突”进入机关的帮派分子必须在8月8日前回原单位原岗位工作，不得参加8月起召开的市直各局党委常委和市委机关各组（办）领导会议。到9月，全市通过“突击提干”进入各县区局机关以上单位的1303人中，有1216人返回了原单位、原岗位。对突击入党的党员，则按照党章规定进行甄别，做出重新办理入党手续、除名或清除处理。

通过对中央〔1975〕16号文件的贯彻和对各级党组织的充实调整，市委和全市各级党委的领导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从而为同期展开的全面整顿打下了基础。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内乱、扭转局面的方针政策，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而杭州的全面整顿则是从1975年7月中央〔1975〕16号文件下达后，在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领导下展开的。

1975年7月省委工作会议后，省委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在全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派性、纠正“双突”、增强团结、发展生产的高潮。为了推动整顿工作，确保整顿工作取得实效，省委确定将杭丝联、杭州钢铁厂等八大厂作为批派性、促生产的试点单位。根据省委要求，试点单位组织开展了“一学三批五大讲”^①群众自我教育运动，进行批派性、促生产试点。试点单位通过狠批派性，提出要削平一切大大小小的山头，自觉拆“墙”、填“沟”、解疙瘩，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掀起生产高潮。

在省委和中央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杭丝联、杭州钢铁厂等八大

^① “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不久又增加了批资产阶级派性，成为“一学四批五大讲”。

厂的整顿初见成效。7月，八大厂的生产开始大幅度上升，与6月相比，杭丝联产值增长348%，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第二棉纺织厂、浙江麻纺织厂和杭州制氧机厂产值分别增长29%、515%、340%、37.2%，杭州齿轮箱厂创造了年内最高月产量。在八大厂的带动下，全市各企业生产形势也大幅好转，丝绸系统产值增长22.4%，棉纺织系统产值增长58%，机械系统产值增长61.2%。

在八大厂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先恢复生产，后解决问题”和省委抓好“一学三批五大讲”群众自我教育运动的指示，市委和各县、区、局领导纷纷下基层蹲点，组织工作组进驻有问题的企业、农村社队，开展整顿工作。通过半年多的整顿和批派性、促生产，杭州的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回升。到1975年底，全市绝大多数停产、半停产的工矿企业恢复生产，经济效益逐月攀升。1976年1月5日，市委举行万人报捷大会，市、区属300家企业向大会报喜。

同时，其他战线上的整顿工作也全面展开。从1975年7月起，市委结合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对群众反映较大的治安问题进行治理整顿，对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事件进行坚决打击。从9月起，全市又先后进行了治安秩序和城市交通秩序大整顿。到年底，市公检法系统共召开公判、批斗大会500多场次，处理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各企事业单位紧密配合学习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活动，开展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重违法乱纪等犯罪活动，揪出一批长期在派性掩护下作案的贪污盗窃分子。

为了解决副食品供应紧张问题，省市联合组成副食品调查组，分别对蔬菜生产和猪、禽、蛋、鱼等副食品的产销供应工作，以及延安路菜场职工的服务意识进行调研。根据省市调研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工商局派出多个调查组进菜场，协助抓市场供应。市与各县组织了4000多名干部到农村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几十万社员

日夜投身农田基本建设，全市农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反对“四人帮”的斗争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猖狂反对和顽固阻挠。同时，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毛泽东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

在杭州，这场运动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而后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1976年1月到2月，《杭州日报》陆续摘登各地“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及反映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2月7日，1800余名工人代表集会，要求回击教育界、科技界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在杭的省市科研单位部分干部和科技人员也举行批判会，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的开展，让少数人特别是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受到批判的帮派分子看到了希望。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断煽动下，杭州的部分帮派骨干上蹿下跳，到处串连，把批派性说成是“右倾翻案”，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

从1976年3月起，杭州市出现了一股为翁森鹤翻案、否定八大厂整顿的思潮，并很快演变为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部分领导干部的恶劣行为。部分企业基层党的工作受到帮派死硬分子的干扰，使1975年下半年以来全市持续好转的工业生产再次下滑，全面整顿工作基本停顿。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国民经济发展反复起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社会不稳定。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厌倦情绪，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得到改善。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抵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以后，市委就强调，运动要在各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能搞串连、拉山头、搞战斗队等。1975年12月20日，市委召开县、区、局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部署中央开展运动指示的同时，也传达了省委负责同志的北京来电，认为“七、八、九三个月（浙江）没有刮右倾翻案风”^①。此后，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市委也是“对运动领导的不够主动，不够有力，对学习和批判抓得不紧”^②。一些地方党委在领导运动中也是如此，不但反复重申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且强调要坚持原则，大胆工作，并对派性干扰进行批判。同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对“批邓积极性不那么高……存在着一种厌倦情绪，不大想批”^③，使得各种批判活动敷衍了事。由于多数企业的党组织顶住压力，坚持生产，全市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态势基本保持了稳定。

从1976年第二季度起，尽管全市工业生产普遍出现下降趋势，但由于市委和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顶住压力，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没有造成社会和生产的严重混乱局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杭州人民无比悲痛，全市各界干部群众纷纷自发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用各种方式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而在此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出各种禁令，不准全国各地群众佩戴黑纱、戴白花、开追悼会和各种悼念活动。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

①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社会主义时期）》，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② 《关于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市委负责同志在市基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5月21日）。

③ 《关于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市委负责同志在市基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5月21日）。

强烈的反抗行动。

2月下旬，杭州汽轮机厂一名青年工人编写了《总理遗言》^①，以示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满。这个材料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3月，杭州街头贴出《当前的斗争与我们的态度》等各种大字报，深切怀念周总理，把斗争矛头直指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从4月1日起，杭州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规模愈益增大。当日凌晨起，杭州钢铁厂、市公交公司、浙江大学等许多单位的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延安路南端，将嵌有周恩来遗像的各种花圈和写有“谁冲击、诬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化悲痛为力量，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等内容的大幅标语悬挂、张贴于解放路百货商店周围等市区最主要的热闹地区。4月4日清明节这天，杭州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杭州钢铁厂部分职工在少年宫广场设置周总理灵堂，1200多名职工参加悼念活动。解放路、延安路、湖滨路等杭州各条最主要的商业街道沿线周边墙上，布满了群众自发张挂、张贴的各种花圈、挽联、标语、诗词，在寄托对总理哀思的同时，表达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痛恨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烈不满，吸引了成千上万人驻足观看。余杭、富阳、萧山、建德、桐庐、临安、淳安等县的许多干部群众，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但是，这样一场正义行动很快由于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

^①《总理遗言》的大意是“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等。

件”^①的发生而受到镇压，被错误打成“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活动”。省市造反派分子还把从悼念活动中搜集到的所谓“罪证”送到北京，密送王洪文，对浙江尤其是杭州人民群众的正义活动进行诬告和诽谤；同时指派造反派骨干冲击市委大院，逼迫市委召开办公会议，要求市委办公会议成员人人表态。主持省委工作的赖可可在会上说：“杭州市和一些地方出现类似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对幕后策划者，要严加追查。”^②当时的市委负责人也把清明节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王洪文在看了所谓“罪证”后，认定杭州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就是“反革命事件”，并打电话给省委主要负责人，责成“要坚决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要坚决镇压”，“决心要大”，“要追后台”。4月15日，省委正式发文，把杭州清明节悼念活动定性为“类似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者。5月，杭州又掀起了一场以“四四事件”参与者为主要对象的清查逆流。王洪文还指派在公安部的帮派骨干分子两次坐镇杭州，追查《总理遗言》。当月，除多名《总理遗言》起草者外，一批参与杭州清明节事件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也被逮捕，大批党员领导干部被公开传讯、搜查或被秘密审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杭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一举粉碎

^① 从1976年3月底到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邓小平的事件，被称作“天安门事件”。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邓小平的活动，被统称为“四五运动”。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91页。

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公开后，杭州人民欣喜若狂，一片欢腾。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在党中央、省委和市委正确领导下，杭州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对杭州“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

杭州市是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十年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下，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几经反复，给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威信造成了重大损害。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潮起潮落，全市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制约，发展速度明显下滑。

1967年和196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分别比上年下降3.4%和0.8%。1972年的“批林整风”使杭州极左思潮得到初步清算，杭州经济形势一度出现好转。党的十大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势力得到加强，“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全市局势出现新的混乱，前两年已呈好转的国民经济再次受遭严重破坏。1974年和197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再次负增长，分别比上年下降7%和1.3%。

十年间，杭州“三五”“四五”计划受到严重干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3.3%，是杭州解放以来经济发展处于最低水平的阶段，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生产和生活陷入困境。工业总产值年均只增长5.1%，大大低于“文化大革命”前年均增长16%的水平。农业总产值年均只增长1.1%，大大低于“文化大革命”前年均增长5.4%的水平。

十年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萎靡不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按当年价格计算，1976年，杭州市国民收入为16.6亿元，人均336元，与1965年相比，仅增长14.9%，逐年递增率为4.1%，大大低于1956年到1965年十年间约10%的递增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只增长4.5%。到1976年，

全市高校在校学生仅为8579人，相当于1965年的56.6%。许多名胜古迹遭到破坏，旅游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全市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和长期受党教育、影响的广大群众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们一方面与极左路线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一方面顶住压力，忍辱负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成了一股正确力量，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推动着全市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工业领域，全市电子、机械、轻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其中电子仪表企业从1965年的10家发展到1976年的70家，职工人数由1878人增加到1.29万人；机械工业形成载重汽车和手扶拖拉机批量生产能力，先后生产“钱塘江”牌载重汽车3000余辆，生产手扶拖拉机6000多台，引进的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工业汽轮机设计制造技术及关键设备和检测设备，大大提高了杭州工业汽轮机设计制造水平；轻工业方面，新建、扩建了杭州手表厂、杭州自行车厂和杭州缝纫机厂等一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十年间，杭州生铁、发电量、硫酸、烧碱、电石、合成氨、化肥、齿轮箱、缝纫机等一批产品产量有所增长，并从无到有开始生产平板玻璃、汽车轮胎、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等产品。

在农业领域，尽管全市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幅度不高，但总体呈现向前发展。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机械化和小化肥工业建设，到1977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及化肥施用总量分别比1965年增加18.3%和83.5%，显著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推动了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其中1972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高点，为14.1

亿公斤^①，比1965年增长33.66%，基本达到自给。茶叶、蚕茧产量也达到了解放后的较高水平。农业机械化事业也得以起步与初步发展，不仅推动了各种大小农机、农具制造行业的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打下良好基础。

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成果。“肯定这些成绩，丝毫不是要、也不能够说明‘文化大革命’本身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在于说明不应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完全等同起来，更不应该同这期间全党、全国人民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和努力完全等同起来。”^②

^①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第三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4、446、46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页。

第八章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本章提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共杭州市委积极解放思想，领导、组织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恢复民主法制建设等。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社队企业，在城市调整发展战略、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个体工商业等，同时积极尝试引进和利用外资，加强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共杭州市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带领全市

干部群众初步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杭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

“文化大革命”后的初步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杭州市面临的首要任务。

1976年10月，市委召开有5000多人参加的基层干部大会，学习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文件精神，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带头参加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运动。此后，市委作出一系列部署，领导全市干部群众开展“揭、批、查”运动。到1978年底，有关“四人帮”帮派体系在杭州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18件重大事件得到查清或基本查清，90%以上有牵连的人得到查清或基本查清，“四人帮”在杭州的帮派势力基本被扫清。

同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有序进行。1977年3月，市委常委会两次召开会议，决定选择有重大影响的“清明节事件”、原市委书记王平夷案件等，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实现拨乱反正的突破口。经过积极努力，1978年4月，市委印发《关于给王平夷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11月，市委宣布杭州“清明节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以此为序幕，市委集中力量平反一批有较大影响的集团性冤假错案，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区也陆续为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和事平反。仅1978年5月至9月，全市就有100多家单位为154名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举行追悼会或骨灰安放仪式。到1979年初，全市得到昭雪平反的集团性冤案有44起，涉及3500余人。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农村认真贯彻市委提出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开展社队企

业整顿，加快农田基本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杭州市尽管遭遇历史罕见的旱灾，但粮食总产量仍达16.7亿公斤，比上年增长21%，棉花总产量增长31.2%，油菜籽、茶、麻的总产量和生猪饲养量创历史最好水平。城市全面开展企业整顿，恢复和健全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从而使工业生产形势迅速好转。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43.96亿元，比1976年增长67.5%；财政收入9.18亿元，比1977年增长29.3%；53%的城镇职工工资增加，职工平均月工资提高到52.8元。万吨冷藏库、清泰门水厂新增8万吨供水能力、江城饭店等10多个重点工程先后竣工，新建职工住宅46.4万平方米，近万家住房困难户搬进新房。

在此期间，1977年8月，市委召开杭州地区文化工作会议，制定文化工作规划，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创作出更多更好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优秀作品。12月，杭州市恢复高考，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对各项教育事业进行恢复整顿。同月，市委决定建立市卫生局党委，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切实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工作，并在各医疗单位普遍建立党委（支部）集体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恢复和建立健全以岗位为中心的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1978年10月，市委、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科技大会，讨论全市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评选并隆重表彰优秀科技成果。这些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初步拨乱反正，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杭州市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初步拨乱反正，扭转了十年内乱造成的困难局面，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积极性，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创造了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其内容和精神极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杭州市很快掀起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潮。

1978年12月23日晚，市委集体收听全会公报，并提出要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把工作的重点和全市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1月，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掀起学习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2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研究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提出在工作重点转移过程中抓紧做好结束“揭、批、查”、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工作。3月，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①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在3月底和4月普遍对干部、群众进行一次形势任务和民主法制教育，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和省委的其他指示精神。

按照市委部署，《杭州日报》及时全文转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市直各单位和各县、区党委（组）纷纷召开会议，学习、交流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市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会，交流学习心得。1979年2月下旬起，市委抽调220名公社正副书记和革委会正副主任，用两个月时间集中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问题，进一步把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到农村基层。

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普遍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初步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思想混乱，为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① 1979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张敬堂兼任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

二、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指示和政策，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解放思想，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坚决拨乱反正。根据中央部署，中共杭州市委大力解放思想，带领全市干部、群众逐步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恢复和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重破坏的各方面社会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和“两个凡是”的错误干扰，部分人、部分单位思想僵化、混乱，极少数人甚至怀疑、抵触中央的决策、部署。因此，尽快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在思想领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成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为此，杭州市先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宣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贯彻等工作。

1978年6月，市委常委会、市革委会开始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9月，市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干部学习会，组织学习真理标准问题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内容，重点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10月3日起，《杭州日报》开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栏，介绍全市各条战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情况。在市委推动下，全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面开展。1979年9月，市委召开常委会，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见，研究杭州市深入开展这场讨论

的措施和意义。不久，市委举行报告会，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就进一步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报告，强调各级领导机关要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这一学习和讨论深入下去。会后，全市各级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这场思想解放活动逐渐普及到基层。通过讨论，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9年4月，市委在《杭州日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广泛深入地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使之深入人心，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不久，市委组织部召开党支部工作座谈会，提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全市落实政策座谈会和大庆式企业命名授旗大会上，市委再次强调要对全体党员和职工群众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此外，市委领导带头给市委、市革委会机关党委所属各支部的党员上党课，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组织力量编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课教材、宣讲材料等，印发给各级党组织参考、学习。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把本职工作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6月30日，市委第一书记陈安羽^①主持召开常委会，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开展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

^① 1981年6月，陈安羽任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工作。7月，市委召开市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区党委（组）负责人会议，部署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七一”讲话精神，要求分期分批地组织干部集中学习贯彻。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许多机关、工厂、工地、学校、医院、连队等基层单位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杭州市在思想路线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活动。它从根本上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思想混乱局面，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党的政策

杭州市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不少冤假错案，给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社会关系，是实现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1978年3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决定为部分干部平反、恢复名誉，落实相关政策。11月27日，市委常委会决定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周峰担任组长。12月11日，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正式成立。1979年3月，市委批转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强调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快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判刑的错案等“三类案件”以及其他冤假错案的复查处理。

全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就改的原则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对“文化大革命”以前政治运动中的重大案件进行清理和纠正。到1980年6月，全市基本结束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政治和刑事案件的复查工作，其中对“三类案件”、因刘少奇案受株连的案件、

原判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等，全部予以平反。同时，各县（区）人民法院结合复查工作，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申诉案件进行了复查处理，对其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查证，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在落实政策、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从1979年1月起，全市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他们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其子女成分也一律定为社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随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1979年11月，杭州市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并在1981年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在此期间，全市相继开展落实干部政策、右派“摘帽”和错划改正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工作。到1978年9月，全市1600多名学非所用科技人员的工作得到调整，1024人恢复技术职称，其中452人的职称晋升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主任医师等；到1979年1月，市委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揪斗的16416名干部重新作出结论、落实政策；到1980年9月，全市处理反右派斗争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基本结束，3200余名错划人员或受右派问题株连的家属得到改正及安置。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及因胡风问题受到处理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给予平反纠正。此外，市委还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落实了有关党的民族宗教、台胞侨胞等方面的政策。

杭州市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的有益探索，显示了党勇于面对并及时改正自身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品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了有利于安定团结、发展生产的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法制工作全面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法制工作全面恢复。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市委常委会对会议精神进行学习讨论，并召开各县、区和市直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会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1980年3月，市革委会依法成立杭州市选举委员会，到1981年初，全市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完成，共选出县、区代表3838名。随后，各县、区陆续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县、区人大、法院、检察院工作全面恢复。

1981年12月，杭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876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市1980年财政决算、198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以及1982年财政收支安排初步设想的报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并通过有关决议，决定改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为杭州市人民政府，选举陈侠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峰为市长。12月30日，新当选的市领导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在人民路28号举行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挂牌仪式。

1981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会委员482人。会议听取并讨论市委第一书记陈安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和市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列席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政协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市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提案审查报告决议，选举产生由66人组成的市政协四届常委会^①，选举陈安羽为

^① 一说会议选举产生由82名常委组成的市政协四届常委会。参见杭州市政协办公厅：《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改革之光——杭州市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1—47页。

新一届政协主席。

1979年底，市委召集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就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进行协商。之后，市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等五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在摸清基层成员状况、健全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正常组织生活。1982年8月和11月，致公党杭州市临时支部和九三学社杭州市分社先后成立。至此，杭州市的民主党派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7个，成员也显著增加。市侨务办公室和对台事务办公室也先后重建，恢复侨务和对台工作。

市级群团组织的恢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已开始。1979年6月，杭州市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杭州市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至1979年10月，全市已有964个基层单位建立工会组织，会员达30余万人。到1980年底，全市有16个局建立工会工作委员会，5个区建立工会办事处，萧山、余杭等七县先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成立县总工会。1979年6月，共青团杭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全面恢复杭州市共青团组织的正常活动。会后，经市委批准，团市委在基层团组织较多的局设立共青团工作委员会。1981年11月，杭州市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38名，选举产生市青联四届常委会。1979年6月，杭州市召开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妇联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市妇联领导机构成立后，全市妇女工作得到恢复，并逐步开展正常活动。

市司法系统的恢复方面，1978年5月，市委决定将中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改为党组。1980年12月，市委批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临时审判委员会。1982年8月，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成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各区、县人民法院也先后建立了审判委员会，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基本恢复。1978年6月，市委发出通知，决定杭州市和各县、区分别建立人民检察院。8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对外办公。不久，各区、县先后重建人民

检察院。同月，市公安、检察、法院联合发出《关于批捕案件和起诉案件的办理程序的联合通知》，规定起诉案件由公安机关预审终结后向所在地的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在此基础上，1979年12月，杭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成立。1980年12月，市革委会印发通知，决定建立杭州市司法局。为加强对全市政法工作的领导，1981年12月，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正式建立。至此，杭州市政法机关全部得以恢复和重建。

杭州市全面恢复民主法制工作，有力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混乱局面，初步落实和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三、改革开放的起步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25项政策和措施，并强调集中精力使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是首要任务。此后，中央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杭州市委深入探索、稳步开展全市各方面改革、调整工作，打破旧有桎梏，放手发动群众，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起步。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长期以来，杭州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广大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生产经营管理高度集中统一，分配上实行“大锅饭”制度，严重抑制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日益

迫切。

1979年春，桐庐县至南公社桃源大队田坪生产队率先将山地、水田分包到户。同年春夏之交，萧山县河上公社上山头生产大队下圩畈生产队自发将粮田包产到户。市委对农村的新情况高度重视，经过实地调研，提出允许农民试验、帮助解决难题的意见。1979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农业生产成效显著，引发周围社队学习效仿。市委因势利导，于1980年3月印发通知，要求把建立、健全各业生产责任制作为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重点来抓，对公社、大队、生产队所经营的农、林、牧、副、渔和工、商各业都根据生产队的需要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成本、定工分和超额奖励制度。按照市委部署，全市广大农村地区逐渐出现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比例奖赔、包干到户全奖全赔、统一经营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1980年10月，市委召开县（区）委书记和分管农业县（区）长座谈会，提出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决定权在农民，农民要求搞包产到户的，政府应当允许和支持。会后，杭州市开始普遍推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具体实践中，市委从解决各级干部对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认识问题入手，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依次出现三个推进：耕地承包从山区、半山区向平原和城郊发展，大农业承包从耕地向林地、畜牧、水面发展，农村产业承包从农业向二、三产业发展。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逐步从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劳、到户，从包产到户比例奖赔发展到包产到户全奖全赔。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全市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彻底丢掉思想包袱，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数量迅速上升，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市基本普及。到11月，全

市36288个生产队中，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达2883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79.46%；继续实行专业承包到组的2323个，占6.4%；继续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5131个，占14.14%。

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杭州市社队企业迅速发展。1979年10月，市委召开全市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提出抓好粮食生产这个主体、插上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两翼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发展社队企业列入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号召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到1980年，全市社队企业发展至9388家，从业人员31.31万人，总产值7.58亿元。1981年4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市级各局、各厂要对社队企业总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公社进行帮助，特别是对利润在1万元以下的公社进行重点帮助。9月，市委批转市社队企业局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社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认真处理好社队企业调整、整顿与巩固、发展的关系。会后，市、县（区）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社队企业发展，到1981年底，全市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0.8亿元。

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受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企业严重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干部、职工劳动生产积极性严重不足，企业生产效益低下。为此，1979年10月，浙江省革委会发出通知，把杭州制氧机厂、杭州中药二厂等38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红雷皮鞋厂、富强服装厂等10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列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范围。1980年3月，市革委会决定首先在红峰百货商店、杭州利民食品厂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试点中，各企业普遍在收益分配上初步破除“基本工资不能动”的旧观念，打破“大锅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38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实行扩大自主权改革后的第一个季度所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就增长4816万元，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7.8%。1980年6月，市委、市革委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搞好扩

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意见》，新增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等59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113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扩权试点单位。到1980年底，试点范围扩大到115家市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140家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分别占全市两种类型企业总数的63.4%和57%。与此同时，市革委会决定在51家长期亏损或微利、生产任务不足、利润下降等困难企业中分别试行利润包干、亏损总额包干、盈亏自负、超计划利润留成等办法。市属8个工业局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办法，各局对所属企业也分别明确经济责任。通过这些改革，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奖金分配、资金使用、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任免、生产用工等方面开始拥有一些自主权，企业活力初步展现出来。

在公有制企业扩权、改革的同时，杭州市个体工商业突破“左”的思想桎梏并逐渐发展起来。1979年10月，市革委会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开展个体工商业户登记发照的报告》，决定从有利于安置待业青年、活跃市场、满足城乡人民多种需要等方面出发，适当发展一批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工商户。1980年3月和10月，市革委会两次出台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肃清“左”的影响，解除各种顾虑，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发展。到1980年底，全市发展个体工商户1588户、1692人，其中市区579户、589人。为促进个体工商业进一步发展，1981年10月，市革委会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发展城市个体工商业户及其管理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帮扶个体户。1982年11月，市政府召开个体经营户座谈会，要求各地各部门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认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扶持和指导个体经济。在市委、市革委会（市政府）领导下，各区、县相继建立个体工商业管理机构，宣传个体经济政策，并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货源、资金等实际困难。至1982年底，全市个体工商业发展到6786户、7438人，其中市区1954户、2135人。

在这一时期，杭州市还积极调整城市发展战略。1978年，杭州市把城市定位由原来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调整为“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并在《杭州地区“五五”后三年和“六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初步设想》中，提出把杭州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和风景旅游城市。1978年7月，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共同成立杭州市城市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王芳任组长，调集各地区及有关部门技术力量加强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①1979年1月，省委书记王芳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汇报，并对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城市性质、人口和用地规模、城市布局、道路系统、西湖风景区保护、城市发展速度以及市政公用设施等问题提出明确意见和要求。1980年4月和8月，市委常委会两次召开会议，初步拟定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并强调要保护好西湖风景区，妥善处理发展工业和保护风景的关系，要从长远着想、近期入手，为远期发展留有足够的余地。经过紧张、积极的努力，1981年11月，杭州市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由省政府正式报国务院审批。在编制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杭州市适当调整市区工业布局，特别是严格控制重污染工业，搬迁大部分工业企业至城市外围或者卫星城镇，以保护城区自然环境和西湖风景区的旅游资源。

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杭州市大力调整优化国民经济布局和发展重点。1979年5月，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此后，全市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恢复经济秩序和调整国民经济工作。工业生产领域，优先发展轻纺工

^① 杭州市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至“一五”时期、“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编制过第一轮、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此次为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

业，抓紧生产市场紧缺产品；对现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并转几十个产品被淘汰、生产无门路的企业；针对煤炭和部分原材料不足等困难，大力开展经济协作和节能、节约原材料等工作。基本建设方面，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工程项目，加强居民住宅、市政设施、轻工基建、文教卫设施和商业网点等领域投资。经过调整优化，杭州市轻纺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机械制造、化工等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开始转变，交通、电信、邮政、商贸、旅游等事业得到发展。

对外开放新起点的形成

1978年10月，市革委会召开外贸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动员和组织力量加快发展对外贸易。12月，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干部大会，提出各地各部门要从不敌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对外开放工作开始迈出步伐。

外资外经工作继续发展。1978年9月，市委批准建立杭州对外贸易领导小组；10月，市委决定从市、区各局抽调83名青年职工以加强、充实杭州市对外贸易局。几年内，外贸收购供货业务迅速发展，年供货值从1978年的41718万元增长至1982年的70091万元，年均增长约14%，出口商品品种也逐年增加。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港资方面，1979年2月和4月，杭州红雷丝织厂、杭州电子计算机厂与日本、香港地区的企业开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对外补偿贸易等，此后，杭州市“三来一补”贸易业务迅速增加。1980年4月，杭州房地产企业公司与香港均威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营协议，合资建设、经营华侨新村项目，并在1981年底竣工。在此前后，还有一些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投资者先后来杭州考察，并签订一批投资意向合同，但由于当时政策条件、审批环节以及贷款资金等因素限制，项目均未实现。

友好城市工作初步开展。1979年2月，杭州市与日本岐阜市缔结

友好城市，岐阜市成为杭州市第一个国际友城。缔结友城关系后，两市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杭州市先后向岐阜市派出百余位进修生、实习生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岐阜市举办“西泠印社吴昌硕书画展览”“杭州物产展览会”等；岐阜市不少企业家多次组团来杭传授经营管理经验，并且双方民间交流频繁。此外，1982年5月和8月，杭州市分别与美国波士顿市、菲律宾碧瑶市签订缔结友好城市协议书。根据协议，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城市管理及市政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侨务、对台工作开始起步。1978年3月，市委召开杭州市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侨务工作精神，共同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10月，杭州市革委会侨务办公室成立。1979年3月，市委召开全市侨务工作会议暨杭州市第二届归国华侨代表大会，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积极性，不断加强爱国大团结、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加快四化建设步伐而努力。在党的政策引导下，广大侨胞、侨眷大量来杭探亲、旅游、观光、洽谈商务合作等，并通过捐款、捐物或牵线搭桥引进外资等各种方式支持杭州市各项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至1982年，全市累计接受海外捐赠钱、物达34次（笔），按当时物价或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累计约27.6万元，同时累计侨汇收入约854.4万元。1978年至1984年来杭观光旅游的华侨、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人共计37.05万人，占境外来杭旅游人数的43.2%。此外，部分归侨侨眷投资灵隐斋堂、杭州侨光化工厂等，参与杭州经济文化建设。杭州市还积极加强对台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对去台人员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并建立档案，加强对在杭台属、亲友的宣传教育，引导去台人员为杭州市经济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调整

科技体制改革的起步。1980年9月，市革委会批转市科委、市财税局《关于我市科学研究单位试行扩大自主权等问题的报告》，决定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6家科研机构进行扩大自主权及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科研的改革试点。1982年6月，市政府批转市科委等单位《关于加强厂矿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厂办科研机构，加强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等6条具体意见。在市委领导下，全市科技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扩大国有科研院所自主权，6家扩权试点单位在人事、计划和经济方面有了一定自主权，其他市属科研机构也实行经济方面的改革，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建立杭州市科技开发服务公司，专门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活动，为开展技术交易活动创造了条件；厂矿企业逐步建立科研机构，1979年出现首家民办科技机构“杭州交叉技术研究所”；每年评选、奖励市级科技成果，从1979年起，每年评选、奖励上一年度的科技成果100项左右，并增加科技成果奖励类别和额度；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加强技术协作；等等。

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办学体制的突破。1979年8月，市委召开全市教育系统基层干部会议，提出抓好城市中学职业班的试点和办好农业中学，着手中学教育结构的改革。1980年9月，市委成立杭州市中等教育结构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关于举办职业中学（职业班）的意见》，对职业中学的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学制、领导体制、毕业生分配等作出明确规定。按照市委部署，市教育局在五四中学、红星中学试办职业高中班，实行“一套班子挂两块牌子”的体制，在全省率先进行城镇职业中学教育改革试点。此后，杭州市继续调整中学阶段招生比例，稳步发展初中，逐年减少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增加职业中学和职业班招生数量。到1982年，全市有职业中学（职业班）37所，专业10多个，在校生1192名，占普通高中在校生的8%。与此

同时，全市对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陆续进行恢复和发展，并新建一些中等专业学校。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杭州市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办学，逐渐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新体制。1979年4月，杭州钱江业余补习学校创办，开全市社会力量办学之先河，也是全国第一所由民主党派成员创办的业余学校。到1982年底，全市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到20所，学员4万多人。此外，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杭州市还通过大力发展校办企业来改善办学条件，使这一时期全市校办企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初步发展。1978年5月，杭州市文化局恢复成立，此后，全市大部分剧团和文艺团队相继恢复和重建。在市委领导下，市文化局先后召开区、县群众文化工作会议，街道、乡镇文化站（中心）建设座谈会或经验交流会等，体系化部署、推进全市文化艺术工作。1979年春，杭州市举办首届“西湖之春”音乐会，860余名文艺工作者表演80多个节目；次年4月，成功举办第二届“西湖之春”音乐会，并邀请上海著名越剧演员参加。1981年10月，举行杭州地区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历时5天，来自7个县的134名民间艺人表演16个富有民间特色的节目。

卫生事业的调整。1979年，市属医院建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进一步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主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医院工作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同年，市红十字会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结余留用”的“五定一奖”制度。1980年，市卫生局将该制度在全市医疗卫生单位推广，初步调动了卫生人员的积极性，逐步改变了吃“大锅饭”的现象。在做好防治职业病和肺结核、精神病、麻风病防治方面，从1980年起，杭州市对工业职业病矽肺和工业毒害苯等中毒病人进行普查，并对生产环境2000多点次、3400多个尘毒样品浓度进行测定，为改进全市劳动条件提供科学依据。1981年3月，市委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防治血吸虫病的

宣传教育、队伍建设、分类指导等工作。会后，全市组织力量开展查灭钉螺活动。到1983年，经省血防办公室考核，桐庐县和萧山县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从此杭州市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体育事业的调整与发展。1980年，市革委会批转市体委《关于恢复和建立系统和基层体育协会的报告》。市体委、市总工会、市教育局等单位先后发出《关于开展冬季群众性体育锻炼的联合通知》《关于杭州市少体校重点班学生实行“三集中”的通知》等，要求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并对市少体校的教学机制进行探索性改革。全市群众性体育活动迅速发展。据统计，1980年市区有20余万人参加各单位联合举办的越野跑、接力跑、登山、拳操等体育活动；100余万人参加夏季游泳活动；48个系统765家企事业单位的21500余名干部职工分别参加市职工篮球、乒乓球、田径、游泳、棋类、拔河、跳绳等体育比赛；市区坚持每天晨练的群众在10万人以上。到1982年，杭州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增至16家，业余长跑队增至25个，各种体育辅导站增至150多个，市属厂矿建立各种运动队484个。全市在部分学校逐渐恢复或建立体育传统项目，1980年，市区21所中小学中开设田径、游泳、篮球等9个运动项目，萧山、桐庐等七县94所县属中小学中设立训练点。

杭州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全面调整与发展，有力地增强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稳定。

第九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本章提要

中共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共杭州市委以建设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为目标，以旅游业为先导，全面开展并深化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改革逐步推开。随后根据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杭州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工作。与此同时，1988年，国务院批准杭州市及所辖萧山等四县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为杭州在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动力，杭州开始创办各类经济、科技开发区，这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发展空间。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提出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目标等。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系统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按此精神，中共杭州市委从地方实际出发，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展开杭州的改革开放。

城市建设目标的提出和第五次党代会的召开

1983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强调“杭州市是省会所在地、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应着重发展与风景旅游有关的服务业、食品工业以及对城市没有污染的产业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事业等。这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明确了杭州的城市定位、特色和发展导向，对保护西湖风景名胜区、加快杭州改革开放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贯彻落实城市总体规划，讨论和确定今后一段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198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厉德馨^①代表市委作题为《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简要回顾了杭州市第四次党代会以来十三年情况，根据中央、省委对杭州市的发展要求和杭州市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杭州市的建设目标。第一，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要求做到：风景优美，环境整洁；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供应丰富；文明礼貌，社会安定。第二，形成以杭州城市为中心、众多的小城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实体，即充分发挥城市和农村各自的优势，实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文明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上述目标，报告提出杭州市的建设发展方针，并就发展风景旅游事业、加速工农业生产发展、改进商业服务工作、抵制精神污染、发展教育科学

^① 1983年4月，浙江省委决定，厉德馨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文化事业等“两个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作出部署。

大会讨论通过这个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杭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83年11月8日，五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厉德馨为市委书记，钟伯熙、张浚生、许行贯、杨招棣为市委副书记，孔宪连为市纪委书记。

杭州市第五次党代会是杭州市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结束了第四次党代会后十余年间一直没有召开党代会的不正常状态，对杭州市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规划城乡建设蓝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市农业生产责任制迅猛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民个人生产的关系如何处理、农业生产如何稳定协调发展等。为此，1982年11月，市委提出，要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无论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引导农民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1983年7月，市委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从大田继续向林业、牧业、渔业以及经济特产等方面扩展；要在搞好承包制的基础上，把应该统一经营管理、群众要求统一经营管理的事情，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统一起来。按照市委部署，全市各有关县、区积极统一县（区）、社、队三级干部的认识，大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山林、水面、经济作物等各个领域扩展，引导基层积极签订承包合同，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权利、义务。到1984年1月，全市大田作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5%以上；全市集体山林、内塘和山塘、适合养鱼的水库和外荡水面等普遍实行联产承包制。通过全面实施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杭州市粮食生

产和许多重要农副产品连年丰收。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开展禽蛋、水产、水果、奶制品等开发性生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市综合开发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取得显著成绩，建成一批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出现肉、禽、蛋、奶、鱼、菜、果、花“八鲜”进城的可喜局面。

杭州市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为开展以国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企业严重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职工缺乏生产劳动积极性，企业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市委、市政府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杭州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1984年3月和4月，市政府先后出台措施，要求放宽二轻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权限，全面开展企业扩权工作。1985年1月，市政府继续扩大企业在生产计划、劳动用工、机构设置及厂级以下干部任免等10个方面不同程度的自主权。1986年4月，市政府出台措施，要求继续简政放权，适当增加企业财力，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工业企业普遍实行以“包、保、核”（包产量、质量、消耗，保全厂总目标，严格考核）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内部经济责任制，对工资和奖金分配制度实行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浮动、岗位工资、全额计件工资、工资含量包干等多种改革。1986年6月，市委、市政府学习兰溪经验，全面部署落实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明确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两个层次的分配原则。1991年6月和1992年2月，市政府两次出台措施，进一步放开企业在生产计划、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物价资金等方面的权限，由厂长（经理）统一领导企业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通过这些改革，全市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普遍获得“松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1984年7月，杭州市确定杭州机床厂

等12家企业为第一批试点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厂长（经理）负责制单位。在试点过程中，针对如何正确处理厂长、党组织、工会三者关系的问题，市委组织部、市经委、市总工会下发《关于厂长、党委、工会的职责权限以及协调关系的实施细则（试行稿）》，赋予厂长（经理）在干部任免、职工聘用、工资分配、厂风厂纪整顿和建设等方面的权限。经过分批分步骤推广，到1987年底，全市有503家国营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占总数的63.6%，其中市属预算内国营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达到99.39%。为进一步深化企业领导体制改革，1987年12月，市委召开市属大中型企业厂长、书记会议，部署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党政分开和机构改革工作。会后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开展工作，企业党政分开和机构改革工作迅速推进，企业机构基本达到“精简、精干、效能、服务”的目标，大量党政干部转岗到生产、经营、科研第一线。

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市委、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配套改革。1983年8月，市政府批准《杭州市劳动合同制试行办法》，决定以后凡市区全民所有制和县（区）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招收新工人，全部采用合同制。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到1983年底，全市招用劳动合同制工人共计8219人，使劳动合同制试行迈出可喜的一步。在此基础上，1985年6月，杭州市开始试行干部招聘合同制；1989年，杭州市全面推开搞活固定工制度；1991年，杭州市开始进行劳动、工资、保险制度（简称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并试行固定工全员劳动合同制。到1992年末，全市三项制度改革企业达到357家，参加改革的职工达13万余人。在改革过程中，杭州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规范并有序发展，“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新招工原则和制度在全市推行，城乡劳动力共同实行市场竞争就业的格局逐步实现；全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职工工伤保险实现基金统筹，各项保险参保覆盖面逐步扩大，同时城镇待业保

险、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进一步推进。

在开展上述改革的同时，杭州市还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积极发展横向经济协作，推进利改税、价格管理、商品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为搞活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和配套政策。

杭州市以国营企业改革为中心，积极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冲击了“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陈腐观念，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对提高党委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

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大潮，1984年6月，市委、市政府向省委、省政府并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报告，要求给予杭州市发展旅游事业的自主权，扩大杭州市的经济管理权，批准杭州市实行对外开放城市的特殊政策。7月，杭州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世界经济导报社等单位发起召开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理论讨论会。会议提出，杭州应以旅游业为重点，协调一致地发展经济和科学教育事业。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由省委、省政府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月，省委副书记吴敏达，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厉德馨等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汇报杭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设想和请求。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讨论杭州市改革和开放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赋予杭州特殊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强调杭州市作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应当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在旅游体制改革和旅游事业发展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并积极拓展航空、铁路等方面的对外交通。

根据省委和中央精神，1984年5月，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正确理解并执行对外开放方针，积极引进外资，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杭州旅游城市建设。8月，市委召开工作会

议，确定杭州市当前的工作方针是“双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造现有企业）和“双开”（开放、开发）。与此同时，杭州市先后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和经济开发总公司，分别由市委领导挂帅，统筹安排杭州市的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工作。此后，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精神，明确强调要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光旅游城市”。

为此，杭州市清理了西湖景区内的各种违章建筑，搬迁占据重要风景点、名胜古迹的单位和各种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开展景区污染防治工作，优化景区综合环境；维修或复建岳飞墓（庙）、西泠印社、灵隐寺等几十处文物古迹，围绕西湖新建、扩建、修建虎跑、阮公墩等公园、风景名胜三十多处，并先后建成开放湖滨一公园、少年宫西侧景区、镜湖厅景区等，修建基本沟通西湖各主要景区内及风景林区间的游步道。为理顺体制，1983年8月和1984年11月，市政府先后批准成立杭州市旅游公司、杭州市第二旅游公司，分别经营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务。在此基础上，全市旅游企业迅速增加，到1985年，全市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旅游服务公司等达到62家，经营涉外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达到8家。此外，杭州市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和内资、外资一起上的方针，加强宾馆酒店、商场商店、铁路民航、邮电通讯等服务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引进外资、港资兴建黄龙饭店、中日友好饭店、新侨饭店等现代化国际旅游酒店，批准望湖宾馆、华侨饭店、杭州饭店等经营涉外业务。富阳、桐庐、建德、淳安等县也依托当地的优势资源，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并相继形成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桐庐县积极开发瑶琳仙境，年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1986年至1990年，全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8283万人次，回笼货币约75亿元人民币。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杭州的对外开放。在积极接待国（境）外游客来杭旅游观光、探亲、商务考察的基础上，杭州市先后组织和参加

杭州市友好访问团、中国妇女代表团等不同的外出访问团组，访问日本、菲律宾、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学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经验，签订重要设备或关键技术的引进合同，与日本向日市结成友好城市关系，开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1984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建立，统一管理全市日常外事工作。1986年8月，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和杭州市对外经济委员会合并成立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全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在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在保障传统的外贸供货基础上，杭州市外资外经工作蓬勃发展，从1983年到1987年，全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0家，总投资18228万美元，协议外资4736万美元，项目涵盖宾馆酒店、纺织、食品等二、三产业。

以旅游业为先导，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是市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结合地方特点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探索。它促进了西湖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开发和建设，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企业技术改造水平提升和产品更新换代，有力地带动了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杭州市大规模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市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有了明显改善。但是，部分党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部分党员出现理想淡漠、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少数党组织或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部分单位知识分子入党难。

为此，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1984年9月，市委召开整党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在整党中着重解决好四个问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端正各部门的业务工作指导思想，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组织体制改革；纠正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作风和影响本地区、本单位开创新

局面的其他突出问题；认真做好清理“三种人”^①的工作，抓紧搞好“第三梯队”建设。在市委领导下，从1984年9月开始，全市整党工作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分四批进行：第一批是市委，市级各部、委、办和有下属单位的局（公司），城区各区委和区级机关；第二批是没有下属单位的市属企事业单位、各县县委和县级机关、城区街道居民区、市郊乡镇基层党组织；第三批是各县的乡镇机关、县属企事业单位；第四批是村级组织。在每一批次的整党中，各整党单位都按照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的顺序，依据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集中整改、组织处理、党员登记等步骤，围绕市委提出的任务进行整顿。到1987年3月，全市共有8600多个单位、21.3万余名党员基本完成整党工作，共查处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违法乱纪案件42起，组织处理犯有各类错误的党员2413名。1987年8月，市委发出通知，宣布全市全面集中整党工作结束。

为进一步清除组织人事工作中“左”的影响，1984年5月，市委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以“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的思想为指针，迅速适应改革的形势，掌握好选人、用人的标准和办法，改进干部管理制度。1984年7月，市委转发市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市管后备干部名单的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建立领导干部后备名单工作，搞好“第三梯队”建设。按照要求，市直各部门党委（党组）和各县、区委一方面积极清除“左”的影响和旧的用人观点，大胆选拔和起用德才兼备、勇于进取的开拓型干部，大力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推荐、组织各级干部参加党校、电大、夜大、业大、函授、自学考试等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

^① “三种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水平、专业水平和文化水平等。在推进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各级组织部门按照干部队伍“四化”要求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和教育工作。经过努力，全市干部队伍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一批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和业务技术水平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并初步建立一支后备干部队伍，为杭州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是改革开放初期杭州市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举措。它加强了全市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等方面的建设，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为杭州市有序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在严峻考验中深化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加快改革和体制转轨中，通货膨胀严重、工农业增长比例失衡、不法分子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198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共杭州市委按照中央和浙江省委部署，认真贯彻执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各项方针。

坚决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即将开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机，198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吴仁源^①代表五届市委作题为《同心同德 深化改

^① 1987年5月，吴仁源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革 争取杭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的报告。报告提出1989年至1993年杭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杭州的优势，实施以科技进步为依托，以外向型经济为先导，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优化结构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使以西湖为中心的风景旅游事业更加兴旺，使杭州的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稳步、协调、健康地发展。根据这个基本思路，报告提出杭州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经济发展纳入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

大会审议和通过这个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和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88年11月8日，六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吴仁源为市委书记，卢文舸、虞荣仁为市委副书记，周玉玲为市纪委书记。

在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指导下，全市上下迅速开展治理整顿工作。市直各部门和各区、县（市）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清理基本建设项目、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清理整顿公司、严惩投机倒把等，积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到1988年底1989年初，全市治理整顿工作出现良好开端，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打断了治理整顿进程。

1989年4月，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到5月底6月初，动乱逐渐演变成一场反革命暴乱。在全国大环境影响下，4月至6月，在杭部分高校出现许多大字报、小字报或诗词、标语，部分师生举行非法集会，成立“杭州高校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在北京平息政治风波后，在杭部分大学生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策划指挥下，做出拦截车辆、设障堵路、冲击铁路运输、煽动

工人罢工等极端错误和违法的行为，令杭州市区的局势一度趋于恶化。

对此，市委、市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妥善应对。1989年4月至5月，市委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通报有关情况，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强调学生对党和政府工作有意见，应当通过正当渠道提出，反对采取非法游行、静坐、罢课等错误或违法行为，不允许成立各种名目的非法组织，已经成立的一概不予承认，要求学生必须无条件复课，各地各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局势。

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按照“正面疏导、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维护秩序”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妥善处理政治风波。全市宣传、教育部门和在杭各高校有关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及时向广大师生传达中央和省、市委精神，揭露政治风波真相，明辨是非、统一思想。市直各部门和各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护厂、护店、护路，努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市公安机关对社会上的非法组织和违法犯罪行为，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果断采取措施，及时予以处理，并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坚决打击趁机搞破坏、搞骚乱的各类犯罪分子。到6月中旬，杭州市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取得了制止动乱、维护稳定的重大胜利，使全市逐渐摆脱了政治风波的影响，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在彻底平息政治风波后，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要求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同月，省委召开八届四次全会，强调各方面、各条战线都要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服务。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9月，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清理整顿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和从事商业批发、对外贸易、物资供应的公司及金融性公司等，认真查处违法乱纪案件，建立健全公司的各项管理规定和制度。11月，市委召开六届四次全会，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调整工业

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坚决贯彻落实压缩投资总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和信贷规模过快增长、消除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状况等治理整顿措施。

在开展治理整顿的过程中，针对一度出现的工业经济负增长、财政状况恶化等情况，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有保有压，加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大宏观微调和保供促销力度，从信贷、财政、税收、物价等方面克服经济结构性疲软问题；不断深化改革，鼓励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横向联合或承包租赁经营，增强企业活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创新发展和引进外资等，逐步增强经济活力。同时，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的基础上，1991年，市委、市政府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治理整顿如期结束，同时杭州市也圆满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通过治理整顿，全市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初步调整，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秩序大大好转。全市经济环境、经济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经验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为开展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杭州市坚持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1987年，杭州市把改革的重点放在逐步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杭州市引导253家市、县属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为期2—4年的承包合同，占同口径企业总数的84.6%，其中杭州汽轮机厂、杭州拖拉机厂等4家企业还进行招标选聘承包经营者试点。为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克服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1988年，杭州市全面推行全民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制

度。当年，全市共有301家企业签订承包合同，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形式有上缴税利、实现税利、外贸收购值并上缴税利、劳动实物量、超额报酬提取、岗位工资、全额计件、亏损包干等10多种。1990年一轮承包到期后，多数企业签订了二轮承包合同。1992年以后，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多数发展为企业深化改革的其他形式。

在搞活企业的过程中，杭州市陆续出现企业兼并重组。1988年9月，市政府印发《关于企业兼并中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企业兼并和产权转让必须坚持自愿、有偿、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其他性质企业均可以互相兼并，并就兼并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资产处理、职工归属、承包经营企业的承包责任、土地所有权等方面作出规定。1991年9月，在市委支持、协调下，杭州娃哈哈食品厂成功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为全国瞩目的企业兼并典范。在此之后，杭州市企业兼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亏损企业或困难企业纷纷提出走杭州罐头食品厂的道路，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则主动寻找兼并对象，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兼并其他企业的申请。到1991年底，市属320家工业企业中有54家进行兼并、合并，涉及比例为17%，兼并的范围从本系统、本行业、本地区转向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兼并的形式从单一的无偿划转转向购买式兼并、承担债务式兼并、股份式兼并等多种形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杭州市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列入生产资料市场、金融体制改革、全国第二层次综合改革等方面的试点范围。以此为契机，杭州市积极开展各项配套改革。为此，市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大力培育劳动力、金融、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市直各部门和各区、县（市）积极行动。1986年4月，杭州钢材市场正式成立并开市交易，从1987年起，木材、水泥、废钢铁等其他生产资料市场又陆续放开，使生产资料市场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到

1990年左右，全市共有市场95个，年成交额约为30亿元。金融体制改革方面，1986年10月，由杭州市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杭州市金融市场成立，同时建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到1988年，全市建立市、县、信用社三级拆借市场15个，全年拆借资金累计达175亿元，1991年全市金融机构拆借资金累计达到213亿元。此外，全市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出现数量众多的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证券市场、外汇调剂市场也获得蓬勃发展。

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杭州及所辖的萧山、余杭、富阳、桐庐、临安五县（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一系列的特殊政策，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7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发展外向型经济规划，提出1988年至1990年间杭州对外经贸的发展目标，要求初步形成多产业、多形式、多层次的外向型经济基础，为实现全市经济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杭州市以双轨承包的形式把市政府向省政府承包的出口计划，分别切块承包到各区政府、主管局和市属各外贸公司，并在实行承包的基础上，鼓励生产企业和外贸经营企业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工贸、农贸、技贸联合，建立“工贸结合，产销见面”的一体化出口生产经营体系。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后，杭州市粮油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等14家市、县进出口公司和杭州丝绸印染厂等19家生产企业获得对外经营权，可以直接面向国际市场，自主选择客户和洽谈业务。到1990年，全市圆满完成外贸第一轮承包任务，全面完成省政府于1988年下达的自营出口创汇基数、收汇基数、上缴中央外汇基数三项主要指标。1991年杭州市开始实施新一轮的外贸承包计划，各进出口公司在国家取消对外贸各种补亏的情况下通过综合运筹，均实现盈利，在建立企业自负盈亏机制方面迈出扎实的一步。

在大力推进以承包经营为重点的外贸体制改革的同时，杭州市积极争取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钱江台商投资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并确定开发、建设方针。1990年3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次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高新区；5月，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12月，杭州钱江投资区江北管委会正式组建完毕并对外办公；1992年5月，下沙区块首期6个项目正式开工，拉开开发建设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幕。在对外资外经工作方面，到1990年底，全市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34家，一些企业还在技术改造中走出了一条从引进技术到引进资金、利用外资改造企业的新路子。

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的发展

1984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乡镇企业^①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应该成为振兴农村经济、促进城市工业大发展的一个大的政策”，要求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加强城乡经济联合协作，促进乡镇企业更快发展。在此前后，市委、市政府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抓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领导班子和财务整顿，建立和完善生产经营责任制，加强科研活动和技术改造，加强行业结构调整和多种行业联合，在信贷、税收、原材料供应等方面提供优惠或支持等。在市委领导下，全市乡镇企业经过集体、个人一起上，大、中、小型企业并进的发展历程，取得显著成绩，并形成以纺织、机械、建材等工业为主，食品、造纸、化工、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子、仪表灯等行业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到1990年，全市乡镇企业共有7.12万家，职工人数为81.03万人，总产值达150.63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7.7%；涌现出拱墅区石桥乡、萧山区航民村、杭州万向节总厂等一批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乡（村）或骨干企业。

1982年11月，市委批转市园管局党委《关于欺负个体经营户干

^①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

静事件^①的检查报告》，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正确认识个体经济的作用，积极扶持和指导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1982年11月和1987年8月，市政府两次召开个体工商户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敞开大门发展个体经济，鼓励个体工商户正当经营，保护个体户合法权益。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工商局一方面单独或会同市商业局、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简化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和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在经营范围、营业场地、网点布局等方面放宽政策，扶持个体工商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整顿市场秩序，取缔无证经营、非法经营等，为个体工商户合法经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他部门和各区、县也积极冲破“左”的观念束缚，高度重视个体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个体经济发展。

在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和持续放宽政策的引导下，杭州市个体经济发展很快。到1992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到117310户，从业人员198556人，分别为1978年的439倍和277倍，并呈现出行业逐步向第三产业及旅游业发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者迅速增加、从事贩运的人员日益增多、从路边设摊走向坐堂开店等特点。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些雇工大户逐步向私营企业发展。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后，全市陆续有625家个体工商户换领私营企业登记证，成为第一批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杭州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滋生蔓延，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影响下，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1989年的政治风波更

^① “干静事件”：1982年初，杭州市已经领取个体流动摄影营业执照的返城知青干静在西湖边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时，受到个别国营单位人员的排挤、刁难和打击，营业执照也被强行取走。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应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是加剧了这种混乱。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989年10月和12月，市委先后召开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和六届四次全会，分别作出在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在企业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的决定。按照市委部署，11月，第一批市级机关赴农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奔赴全市乡村，全面展开以“稳定、鼓劲、改革、发展”为基调的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在具体实践中，各地把活动与民主评议党员、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相结合，与“刹歪风”“评三户”^①活动相结合，与农村工作实际相结合，尽量避免空洞式大道理说教。1990年2月，市级机关和各城区共抽调500余名干部奔赴各企业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活动，同时协助企业开展工作。活动紧扣“稳定、鼓劲、实干、发展”主题，把思想教育贯穿到每个阶段、每个环节。1991年企业形势任务教育更名为企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市区街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一起统称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于是，1991年下半年，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在全市广大农村、企业和城市社区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进展顺利，城乡社会风气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为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1989年3月，市委决定在全市基层党组织中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从理想观念、模范作用、组织观念、遵纪守法和群众观念等5个方面，对每个党员进行评议，并对不合格党员分别作出劝退、除名、限期改正、开除出党等处理。1990年2月，市委召开全市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

^① “刹歪风”“评三户”：刹聚众赌博风、封建迷信风、婚嫁丧葬大操大办风，评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双文明户。

要求抓好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部署开展“双争双评”^①等工作。此外，市委还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党的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按照市委部署，“双争双评”活动经过试点后，在全市各基层党组织广泛开展并长期坚持，并与整顿农村后进党支部与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相结合。活动中，各级党组织对评比出来的后进党支部和不合格党员，均进行整改或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涌现出来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进行表彰。

在妥善应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后，全市各级党组织按照市委要求，对风波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清查清理（简称“双清”），并在市级机关和市属大专院校的党员中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在此基础上，市委成立干部考察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全面展开对县（局）级领导干部的考察工作，考察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干部一贯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廉政情况等，并依据考察结果作出不同的决定。同时，市委还在县（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建立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新任领导干部上岗培训和领导干部轮训制度等，全面加强杭州地方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建设，全市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混乱局面得到扭转，党政机关的作风和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逐步好转，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事业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3年1月，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

① “双争双评”：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争创先进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和民主评议党支部。

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作出部署。杭州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部署，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大力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科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要求改革科技拨款制度，大力开拓技术市场，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1984年6月，市政府召开科技工作会议，宣布实行研究所所长负责制等6项加强科技工作和实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措施。1986年5月和1987年11月，市委、市政府两次出台措施，要求深化科研机构改革，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加强科技经费和技术市场管理，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等等。按照部署，全市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并逐渐深入。通过实施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改革科技拨款制度、推行技术承包、加强横向联系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全市的科研机构、科研队伍和科研手段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改革取得显著的成果。

到1990年，10个开发类型的科研机构基本完成削减事业费目标，并不断拓展科研面向经济的路子，实行经费自给；部分市属科研机构累计创办科研生产经营实体30余个，并与企业建立横向联系，技术收入约占科研经费总收入的25%；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11.8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为4.9万人，完成引进国外智力项目23个，聘请专家34名；完成派遣项目8个，派出人员20名。

此外，全市各类民办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机构显著增加，成为科技队伍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等。9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若干意见》，提出对初中和小学采取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法，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使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等。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结合杭州地方实际，1983年12月和1986年6月，市委、市政府两次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市教育部门一方面在市区实行市、区二级办学，另一方面在富阳县的三个乡试点乡（镇）政府管理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工作，并推动各县（区）也分别进行试点。1985年，杭州市经省政府验收合格，成为全省第一个基本达到普及初等教育的市。到1986年6月，全市七个县和市郊的初中、小学基本由县（区）统一管理改为由县（区）、乡（镇）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在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方面，全市各部门、各县区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有一些市属普通高级中学学校转型为职业高中或办起职业班，而且有部分企业子弟学校也办起职业教育。此外，杭州市在继续办好杭州师范学院的同时，积极向省级部门和省属高校争取资源，先后办起杭州工业专科学校、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分校、杭州农业专科学校，为杭州培养了一批高等专业人才。

1988年12月，市委书记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教育工作，要求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加快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强调要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重点，着力解决中小学校舍不足、教师住房困难等问题。1991年，市区中学全部实行校长负责制，各县中小学也在逐步推行。此外，全市职业技术教育、地方高等教育继续发展，教育投资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力度明显加大。

杭州市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科研院所由“单纯科研型”向“科研经营型”过渡。教育体制改革，改变了教育部门独家办学的不合理状况。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调动了科技、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各项事业改革的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实施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市委、市政府将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纳入重要日程。

在文艺改革方面，1984年2月，杭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厉德馨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加强文联建设、整顿和加强市级专业文艺团体、着手建设杭州市文化中心等十项措施。1985年9月和1988年1月，市委两次召开全市文艺座谈会，提出对有贡献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实行晋升工资、解决住房、发放临时津贴等精神和物质奖励措施，强调要改革文艺体制，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进一步调动文艺工作者积极性等。在市委领导下，市文联重建工作顺利完成，文艺创作成果丰硕。杭州杂技团、杭州歌舞团先后到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比赛或访问演出，并且屡获国际大奖。

与此同时，市属艺术表演团体开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或与企事业单位挂钩，结成互利互惠的文化经济联合体，或自开“以副补文”渠道，积极开拓文化市场。此外，市属文艺单位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上也进行了改革，克服了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

端。1986年，市属专业剧团的营业收入达到100余万元，创汇达13.25万美元。1990年底，杭州歌舞团作为全省唯一专业艺术团体代表参加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经验交流会，并在会上作专题发言，获文化部颁发的“完善管理、促进创作、活跃演出”奖。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1982年11月，市委、市政府隆重表彰全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并就进一步做好血防工作作出部署。1986年8月，市政府决定在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全面推行技术经济责任制，并要求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市委、市政府还就防治霍乱、肝炎和地方病作出一系列部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杭州市首先在农村乡镇卫生院开展改革，由各地卫生院根据卫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分别或结合实行经费补贴、任务补贴、浮动工资、积分评奖考核或经济技术责任制等。此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由进一步开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实行乡村医生报酬补贴，发展到卫生院划归乡镇政府分级管理，建立乡村医生协会和农村卫生协会等新的组织形式，进而开展合作医疗和乡镇企业职工统筹医疗等，使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城镇，市属1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实行以社会效益为首要准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责、权、利相结合的改革。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逐步实行院（站、所、校）长负责制、目标管理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并允许预防保健机构实行有偿服务。与此同时，全市的卫生防疫、预防保健、计划免疫和中医药事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与1978年相比，1992年全市拥有医疗机构1767个，增长79.83%；卫生技术人员32628人，增长71.79%；平均每千人口医生数由1.46人增至2.55人；病床数由14042张增至25606张，增长82.35%；全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71.68岁提高到75.65岁，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体育事业改革方面，1982年5月和1986年6月，杭州市先后举

行第十届、第十一届运动会。1985年1月市委批转市体委党组《关于加强我市体育工作的报告》，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体委要锐意改革，改变“独家办体育”的局面，推动体育运动不断向新的广度和高度发展。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一系列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的措施。全市城乡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众、群众自办的体育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基层体育组织自办的体育竞赛活动、赞助性的体育比赛活动、群众体育工作的达标单位等日益增多，群众性体育工作展现出勃勃生机。到1992年，杭州市级单项体育协会发展到34个，县区级体育协会发展到182个，街道、乡镇体协组织发展到154个；西湖、下城、拱墅等9个区（县、市）成立体育总会，全市群众体育组织初步形成三基网络。

与此同时，自1985年起，全市中小学普遍开展体育达标活动，到1990学年，开展达标活动的学校有2884所，占全市中小学总数的86.76%；达标学生有397455人，占适龄学生的87.57%。此外，全市体育产业、体育设施建设、体育对外交流和竞技体育工作等均取得显著成绩。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1984年3月，市委、市政府批转《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继续深入宣传党的基本国策，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计划生育责任制。1988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求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计划生育的各项指标真正落实到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到户、到人。在会上，市政府与有关区、县（市）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层层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各项责任制。全市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各项工作，并着力加强人口理论、计划生育政策、法律及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引导人民群

众逐步转变婚育观。杭州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大成绩。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杭州市改革与发展文化、卫生、体育、人口与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提升了城市软实力。

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

针对城市建设“欠账”多、城市建设和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市委、市政府大力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

1982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中、东河综合治理专题会议，决定成立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开展中、东河综合治理。1983年5月，市政府重新成立京杭运河钱塘江沟通工程指挥部，并下设沟通工程处作为办事机构。1984年1月，市政府转发《杭州市一九八四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点》，提出开工建设西湖引水工程，改善西湖水质。

在市委领导下，市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市京杭运河钱塘江沟通工程指挥部和市园管（文）、城建、规划、财税等部门及有关城区通力协作，积极投入三大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1983年3月，中、东河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动工，经过100多家工程建设单位、几十万治河大军历时五年的努力，工程于1987年12月提前完成，1989年7月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工程总投资2.18亿元，包括河道治理、污水处理、路桥建设、拆迁房建设等10多个单项工程、近500个单位工程，工程之间互相交错，环环相扣。1983年11月，京杭运河沟通钱塘江工程正式动工，1988年12月全部竣工，1989年6月通过交通部验收。整个工程总投资7391.63万元，沟通航道从艮山港起，至三堡入钱塘江，全长6.97公里，包括新建500吨级的三堡船闸（年通航能力300万吨）、11座桥梁，以及农田水利设施、拆迁安置房等20个单项工程。1985年2月，西湖引水工程正式动工，1986年9月建成

通水。整个工程总投资 1169 万元，由取水头部、泵房、（地下）输水管道、输水隧洞、明渠和出口等部分组成，日引水 30 万吨，33 天就把西湖水换一次。1987 年 1 月，作为引水工程的后期配套工程，西湖水主要泄出口圣塘闸改造升级工程启动，进一步加大西湖水的泄出功能。

在加强三大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杭州市积极加大住宅建设综合开发力度。1984 年 4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基本建设会议，要求改革国家统包住宅建设的传统体制，大力发展商品住宅，把住宅建设体制搞活。不久，市政府先后印发《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基本建设和建筑业改革的意见》《杭州市房屋建设开发暂行规定》《杭州市房屋建设实施细则》，要求新建住宅“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综合开发、成片建设”，公建配套设施与住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交付使用，并强调要积极发展商品住宅。按照市委部署，仅 1985 年，市区住宅竣工达 118 万平方米，2 万户市民群众搬进新房。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全市城区开发改造较大的旧城近 20 处，总面积 200 万平方米，先后竣工住宅 50 多万平方米。

1984 年 6 月，市政府印发《关于扩大城区管理权限的决定》，提出房管、环卫、市政、园林、环保等方面的部分管理权限下放到区，实行市、区两级管理；比照省对市的财政体制，各区分别建立区级财政；等等。1986 年 1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城区工作会议，提出城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加强管理，服务四化，服务居民”；强调要逐步理顺市、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条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此前后，市委、市政府还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 and 基层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扩大各城区在城市管理、规划、服务等方面的权限，充分发挥城区多功能作用等。

按照这些部署，市财税部门协助各城区在 1985 年相继建立区级财政，实行与市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体制。市财

贸部门分两批向各区下放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企业，到1987年，除指定企业外，全部下放完毕。市城建、交通、房管等部门与各区及所属部门经过实践摸索，在城市维护与管理方面逐渐形成新的体制：市容管理实行以块为主、综合治理，城市垃圾的收集、清运管理职权全部下放到各区；改进、扩大各区对城市规划管理的办法和权限；市区主要桥梁全部由市交通、城建部门进行管理，延安路、解放路等30条（段）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由市市政部门管理，其他城市道路由所在区的市政管理部门维护；市园文局负责养护西湖名胜区园林及沿湖行道树，其他城市园林及行道树由所属区养护管理；各区域建部门设立环境保护科（管理站），市环保局为市政府在环保方面综合协调监督的职能部门；市房管部门在行政、业务及房产经营等方面与各区进行明确分工。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87年，全市初步建立“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建管并重”的体制，市、区管理体制调整取得重大进展。

杭州市加强城市建设、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是新形势下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探索，明显改善了城市面貌与环境质量，提高了群众住房条件和生活质量。

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指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20世纪末的近20年内，要抓紧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等四件工作，并强调，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全党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下文简称“经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下文简称“严打”）等，并于1986年9月召

开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杭州市委按照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部署，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完善人大、政协各项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市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人大和政协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如何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更好地开展工作，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完善人大、政协各项制度，是杭州市在新形势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探索。

按照市委部署，市人大、政协组织积极适应形势需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1982年1月，政协杭州市第四届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设置委员会、工作组的简则》《关于各项会议制度的若干试行规定》等，并设立相关工作机构。此后，市政协常委会先后制定或修改《市政协四届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组织简则》《关于开展评选政协工作积极分子活动的意见》《关于设置委员会（会、社）工作组的简则》《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杭州市政协提案工作试行条例》《杭州市政协联谊会章程》等，并增设或调整专门委员会（工作组）。同时，1982年2月，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市人大常委会例会、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视察工作、加强与市人大代表联系、加强与县（区）人大常委会联系等五项制度，并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此后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完善《杭州市人民代表工作暂行办法》《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暂行办法》《关于人事任免表决办法的决定》《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的暂行规定》《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规定》等，并进一步调整常委会机关办事机构。

在市委的领导和市直各部门、各区（县、市）的支持下，市人大、政协积极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行使权力、履职建言。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动员、部署全市各级人大认真开展宪法草案的宣传、教育和征集意见工作，并及时学习、宣传《宪法》《刑法》《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等，提高人民群众守法、用法意识。市人大常委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地方立法工作，并于1987年5月审议通过杭州市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到1992年3月，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城市绿化管理、城市房屋拆迁等制定地方性法规10件。在具体实践中，市人大常委会还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文明礼貌月”活动、清理整顿收费工作等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工作或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出台规定或听取有关方面报告，监督和支持“一府两院”开展工作。1984年和1989年，杭州市分别进行两次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市人大常委会认真研究和精心安排，指导各县、区依法开展选举工作，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选举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推动换届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市政协以一年召开一次全会、一季召开一次常委会等为基本工作制度，并围绕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与建设、教育改革、文物保护、振兴丝绸工业等经济社会发展或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委员进行参观视察、专题调研、座谈讨论、撰写提案议案等，及时向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献计献策。此外，市政协广泛开展海外联谊活动，经常组织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代表人士参加学习会、座谈会、报告会以及参观访问，积极宣传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政策，把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引导到杭州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并通过亲朋故旧，共同为促进祖

国统一大业出力。在富有人民政协特色的文史资料工作方面，市政协认真征集、编辑各个门类的史料，并组织力量加强对杭州历史的研究，做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自1987年5月起，市政协长期大力帮扶畲族群众聚居地桐庐县莪山乡发展经济，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杭州市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打击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和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82年2月，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经打”的精神，研究确定杭州市具体执行的措施，并决定集中纪检、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等各方面的力量，抓大案要案的落实。此后，市委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广泛学习和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行“三定”（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责任制，重点抓好市、县（区）直机关中的大案要案，成立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等，把推动“经打”斗争逐步引向深入。在市委领导下，市直各单位和各县、区普遍开展思想动员，部署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从人、财、物等方面调配力量，使案件查处工作得到落实。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到1984年10月底，全市共立案审查各种经济犯罪案件1576件，涉及党员366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约285.07万元。此后，全市进一步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内部经济案件的发现和查处工作。1987年3月，根据市委要求，全市“经打”工作移交给市检察院，转为反贪污贿赂的经常化工作。

在开展“经打”斗争的同时，杭州市积极开展“严打”斗争。1983年7月和8月，市委两次召开会议，要求从快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此后，市委多次听取全市“严打”斗争情况汇报，提出调集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政法部门

工作，学习、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①，召开宣判大会震慑犯罪分子，表彰“严打”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等，推动“严打”斗争逐步向纵深发展。在市委统一领导下，1983年8月，全市对刑事犯罪分子采取第一次集中搜捕行动，打响“严打”斗争的第一战役第一仗，共捕获犯罪分子1843名，打掉犯罪团伙129个。1984年1月和7月，全市先后开展“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二仗和第三仗，一方面从第一仗中未触动过的地区或单位揪出一批犯罪分子，另一方面集中搜捕一批隐藏深、手段毒、作案猛、危害大的犯罪分子。此后，全市先后组织、部署“严打”斗争的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各三仗集中行动。到1986年10月，全市共组织“严打”斗争3战9仗，使当年全市刑事案件发案率较1982年显著下降。集中行动结束后，杭州市结合社会治安形势，继续坚持“严打”方针，从重从快摧毁一批危害严重的犯罪团伙、犯罪窝点，破获一批重大刑事犯罪案件，有效打击了犯罪分子。

为从根本上逐步减少违法犯罪和治安问题，1982年6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内保工作和社会治安，推广厂与厂之间的治安联防，加强城乡接合的郊区的治安管理等。1985年3月和6月，市委办公室先后印发通知，决定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情况，讨论重大问题，落实责任制。此外，市委还多次召开会议或印发通知，要求加强治安保卫队伍的整顿建设，组织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认真做好对有轻微劣迹行为的青少年、暗娼、“两劳”回籍人员、乞丐、盲流等人员的教育转化，开展扫黄打非工作等。

按照市委部署，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形成在市、区（县）

^① 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牵头、公安局组织实施并负责日常工作，各业务主管部门确定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体制机制。在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区党委（党组）带领下，全市绝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建立了安全保卫责任制，做到责任、制度、奖惩三落实；大部分街道（乡镇）、居委会（村）以派出所为主，把辖区内的退休工人、教师和热心群众等组织起来，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治安联防队、工人纠察队、人民调解队伍等群众性治安组织，并在教育管理、组织建设、经费保障、设施配备等方面加强工作，推进基层治安工作；一些基层党组织纷纷做好“两劳”人员的帮教工作，成功挽救一批失足人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杭州市积极开展“经打”“严打”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成功实践。它沉重打击了各种严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展开

1981年3月，市委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抓好舆论宣传、实际行动和组织领导等工作，迅速掀起学雷锋、树新风和“五讲四美”^①活动高潮。3月下旬，市委决定采取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分工负责、综合治理的办法，对市容卫生、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进行整顿。此后，市委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每年3月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大力开展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学雷锋学先进的“三优一学”竞赛活动等，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突击性活动和坚持经常性制度结合起来。

^① “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1981年8月，共青团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与“五讲四美”合称“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各地各部门广泛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雷锋、做好事、讲文明、树新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每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省、市领导都主动深入街头、商店、工厂、西湖风景区等，带头参加清洁卫生、维护交通秩序、服务市民（游客）、植树造林等活动。市直各部门（系统）和各城区积极治理“脏”“乱”“差”，不仅在厂区、居民区、学校、西湖风景区等大量植树造林，清除垃圾、废土等，而且积极整顿交通秩序、维护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秩序。活动中，市、区两级各部门积极开展争创“文明车间”“文明班组”“文明宿舍”“五好墙门”“五好家庭”等活动，并且先后制定《杭州市人民守则》《职工守则》《学生守则》《居民公约》等，建立大量群众性的卫生、交通监督岗等。同时，农村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创建“五好家庭”、争当“五好社员”等活动。不少公社（乡镇）、生产队（村）创办“文化中心”“青年之家”“民兵之家”“文化技术学习班”等思想文化场所，制定乡规民约、党群联系户等规章或制度。

随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不断深入，1985年初，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不再单独举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要求全市各部门围绕建设文明单位的目标，把“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逐月安排好，使全市的文明礼貌活动逐渐走向日常化。1986年3月，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要求狠抓市容卫生，每年开展两次文明市民评选活动，实行“门前三包”。4月，市委、市政府与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杭州军分区等十支驻杭部队的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广泛深入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并在会后印发《杭州市军民共建工作会议纪要》，决定把加强思想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支援市政建设、培育军地两用人才、“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活动纳入共建内容范围。自1987年起，市委每年年初都发布军民共建规划，年中召开共建经验交流会，年底进行总结和考核评比，推动军民共建活动深入发展。

在市委领导下，军民共建活动逐渐成为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从单项活动到综合活动、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通过共建活动，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双拥”工作扎实有效，部队各项建设有力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在军民共建活动的带动下，部分区、县和单位还开展警民、工农、厂居、厂街、兵民等各种形式的共建活动，并取得积极效果。

杭州市开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力地克服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旧的、不健康的、消极的现象，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性、纪律性，对进一步端正党风、改变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十章

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本章提要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时期。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鼓舞下，中共杭州市委结合杭州实际，制订并实施了“三、四、五”发展战略，掀起了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高潮，积极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跨入新世纪，杭州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擘画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城市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确立了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杭州掀起了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高潮。

确定“三、四、五”发展战略

199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按照中共杭州市委的部署，全市各地各单位党员干部采取多种形式，紧紧围绕如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分期分批进行南方谈话精神的学习讨论，并从3月下旬起普遍开展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的大讨论”。市委紧紧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结合杭州地方实际，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逐步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加速杭州现代化进程的工作思路，并在1992年12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上正式提出“三步走”“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五项保证”的发展思想，简称“三、四、五”发展战略。

1993年10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金明代表六届市委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为争取提前实现杭州现代化建设第二步发展目标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总结全市解放思想大讨论和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的成果，重申杭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计算）人均达到6000元；第二步，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达到1万元；第三步，到20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杭州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政治、科教、文化中心和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报告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为第三步发展目标奠定基础，为此，杭州要着力培育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五项保证。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落实人口、土地、环保等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把发展外向型经济、第三产业、乡镇企业和科学技术，作为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五项保证，即要实

现上述发展目标，必须全面落实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五项措施。

大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七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杭州市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0月26日，七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李金明任市委书记，王永明、沈跃跃、沈者寿任市委副书记，吴键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杭州市第七次党代会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会议。大会进一步确定的“三、四、五”战略发展思想，为20世纪90年代杭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5月，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召开，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以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系统配套的改革。以此为指导，1992年，市政府出台措施，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对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相抵触的行政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废止或修改。

杭州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主要措施是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赋予生产经营自主权，鼓励企业兼并、联合和优化重组，引进外资进行“嫁接”改造等。与此同时，在一些企业还进行了劳动人事、工资、劳动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仅1993年，全市新组建企业集团44家（累计88家）；试行股份制22家，其中万向集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筹资2.39亿元；实行劳动人事、工资和劳动保险制度改革的企业

达153家。到1995年底，全市有48.3万城镇职工与企业确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占全部城镇职工的95%。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从1992年开始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到1996年底，实现城镇企业和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制度“全覆盖”。与城镇企业改革相配套的待业（失业）保险、救济制度，及最低工资标准和再就业等制度也同步建立起来。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市委、市政府成立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并于1994年10月确立杭州西湖丝绸工业公司等17家企业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出台试点企业在法人财产权、资产投资主体、公司组织制度、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举措，还明确了试点企业在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股权设置、国有股利使用、产权流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方面的政策，使全市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5年，在国务院确立的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榜上有名。到1997年，全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约3700家，七县（市）企业改制面也达70%以上。

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出台《杭州市企业改革三年规划（1998年—2000年）》，提出把市属国有工业企业扭亏脱困与企业改制、机制创新统一起来，对产品有市场但负担过重、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2000年初，市委先后召开杭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前实现改革脱困“三年两目标”^①动员大会、杭州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经验交流会，全面启动和部署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工作；市政府要求制订“一厂

^① 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两目标”是指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策”改革脱困方案，采取企业改制、产权转让、优势企业并购、破产、加强管理等多种方式，从税收政策、土地盘活、封闭贷款、技改贴息等多方面支持推动国有企业扭亏脱困。杭州市成立产权交易中心，允许对外合作项目、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国有土地、房产、企业资产及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等上市交易。在改制过程中，有的通过出售资产、减持股份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从而优化股份结构，将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有的引进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改制，并加快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有的通过债权转股权改革，引进外来资本，把企业改造成多元投资主体，形成多种经济成分混合经营体制。通过改制、破产、停产歇业、并购（出让）等途径，到2001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制219家，改制面达到97.78%。到2002年，杭州市基本完成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脱困目标，从根本上解决了部分企业长期亏损的问题，激发了企业活力，大多数改制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稳步发展的轨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1992年12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为此，市委、市政府对直接管理企业的行政机构采取转、并、撤的办法^①，精简重叠结构，减少层级，提高办事效率。通过改革，杭州初步形成国有资产的决策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资产经营层（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和授权经营企业）、生产经营层（国有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行体系。在进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委对全

^① 转、并、撤的具体内容：转，即把一些直接管理企业的行政机构逐步与行政、财政脱钩，转为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的经济实体，不再履行行政职能；并，即把职能相同、重复设置的一些机构，合并起来；撤，即把多余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环节加以撤销。

市党政机构也进行了相应改革^①。经过改革，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的职能被剥离，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为加快商业企业和商业流通体制改革，1992年3月，市政府召开会议，部署在国合商业企业中开展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放开试点改革。市本级首批确定37家企业，各县（市）、区选择113家企业为“四放开”试点。9月，全市“四放开”改革全面推开。到1992年底，全市有834家企业实行“四放开”；全市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18.7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商品购销计划也进一步放开，市管商品的定价权全部下放，取消猪肉、鲜蛋、豆制品凭票供应，市场调节价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达到90%以上。在此基础上，杭州市加快国合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到1997年底，在全市1325家独立核算的国合商业企业中，有456家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改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9.22亿元，接近突破300亿元大关。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此，杭州市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和建设规划，在市区和县（市）建设了一批大型综合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到1995年底，全市已发展各类市场553个，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49个，占浙江全省超亿元市场的1/5强，超10亿的市场达14个。全市以金融证券、劳动力、人才、土地、技术、信息为重点的各类要素市场，市（县）房地产交易、企业产权交易等产权交易网络，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也快速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财税、养老保险、医疗

^① 1995年制定的《杭州市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规定调整后的市级党政机构58个，其中市委8个，市政府50个，比原来71个减少13个，精简18.3%。同时对市人大、市政协、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规定，并对各城区的机构改革提出要求。

保障等体制也逐步改革完善起来。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基本完成，杭州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体制的建立，使杭州在全国形成一定的体制竞争优势，也为新世纪杭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杭州市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1992年5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意见》，提出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要求从市、县到乡镇，从第一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为此，从1993年起，杭州市陆续出台鼓励外贸出口、鼓励外商投资、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根据外资投资额、经营期限、投资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对外资企业给予不同的税费减免优惠，对外商重点投资企业实行现场办公，解决外商企业生产经营、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承载能力，市委、市政府还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健全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调整扩大其区域范围，用改革的举措为开发区发展注入动力。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杭州市出现了引进外资、扩大外贸、开展外经合作的高潮。四大开发区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成为全市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孵化、成长。到1999年末，四大开发区共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0.50亿元，协议外资和实际吸收外资分别为26.61亿美元和11.85亿美元，占全市协议外资和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43.2%和37.8%。借助四大开发区的辐射带动，余杭、桐庐、淳安、临安等省级经济开发区加快建设，大批乡镇工业功能区也快速发展起来，推动全市逐步形成城乡联动对外开放网络。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杭州市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到1999年，全市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3866个（其中开业投产1685个），总投资105.87亿美元，吸收外资31.32亿美元；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来杭投资，投资领域从工业领域扩展到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从2000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了招商引资“三年倍增”计划，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杭州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万向、华立等知名企业迈出跨国并购的步伐，一批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尝试通过跨国并购做强做大。

旅游业是杭州的先导产业。1992年5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十次全会提出，要抓住时机，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充分发展旅游业在对外开放中的先导作用和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渗透、催化作用。1995年12月召开的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提出，要把杭州建成现代化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根据上述发展目标，杭州市一方面加强旅游业发展规划制订，加强景区项目建设，另一方面采取放开旅游产业投资政策、改革旅游价格管理体制、加速旅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促进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销售、筹措旅游行业发展基金等多种措施促进旅游市场化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杭州市积极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在全市开展生态环境和市容市貌改善工程，把新景区的开发、重大节庆项目与杭派女装、杭派餐饮及西湖等传统旅游项目整合在一起，在传统优势中融入现代因素。1999年1月，杭州市成为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在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方面，2000年10月至11月，杭州市隆重恢复举办西湖博览会^①，以后每年举办一次，使杭州旅游业从观光游“一枝独秀”向观光游、会展游、休闲游“三位一体”转变。为增强

^① 1929年，为了纪念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带动经济发展，浙江省国民政府在杭州举办盛况空前的西湖博览会，轰动全国和西方，开创了中国现代会展业的先河。

全市全域旅游综合竞争力，2001年7月，市委、市政府启动实施“旅游西进”战略，在规划共绘、交通共建、市场共拓、产业共兴的原则下，在构筑全市一小时半交通圈的基础上，构建形成全市一小时半旅游圈，进而打造全市一小时半经济圈，通过增强中心城区的集聚辐射功能，带动西部五县（市）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市区逐步形成以延安路、解放路、庆春路、武林广场、城站广场等为中心的繁华商业区和拱宸桥、艮山门、南星桥商业副中心，各城区和各县（市）也形成一批以大中型商场为龙头、合理布局的商业街。杭州市专业市场快速发展，零售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到2002年，全市共出现工业品、计算机、建材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家具、花鸟等门类齐全的各类专业和综合性市场668个。

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五个不”“四个不限”的方针^①，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支持群众大胆进行创业实践。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除了人们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担忧。1992年12月，市委提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杭州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全市贯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精神，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1993年11月，市政府召开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① 所谓“五个不”，即不动摇，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攀比，与享受国家特殊政策的省、市不攀比；不争论，不在“姓资姓社”上纠缠；不张扬，不提口号、不写文章、只做不说，扎扎实实埋头干；不气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四个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

持下，全市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既有小商小贩，也有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还形成服装、针纺、制笔、机械、箱包等一批有特色、有优势的区域块状经济，覆盖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至1999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17.31万户、从业人员27.2万人、注册资金34.25亿元；私营企业2.55万家，雇工29.19万人，注册资金155.8亿元。个私经济工业总产值达727.6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4.67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1.9%；上缴国家税收14.56亿元。为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2000年9月，市委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鼓励个私工业进入工业园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并给予减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乡镇企业是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6.2%，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增加农业投入、缩小城乡差别、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和小康进程的必由之路；要求“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再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1993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万向集团，鼓励集团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继续大步迈进，向高层次发展。这对全市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大提高，根据1995年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思路，市委采取措施，促进乡镇企业由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知识、资金）密集型为主转变，由分散布局为主向工业小区集中转变，由内向型为主向内、外结合型为主转变。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万向集团。1992年，万向集团鲁冠球提出“花钱买不管”，用1500万元向宁围镇人民政府购买了企业50%的净资产。1994

年，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上市，并成立万向美国公司。1997年8月，万向集团生产的万向节正式成为世界汽车业巨头美国通用汽车的配套产品。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杭州市推动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到2000年，全市乡镇集体企业转制面超过96%，乡镇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经过改制，乡镇企业产权结构和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得到进一步规范完善，新机制的优势逐渐呈现。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相当一批中、小国有、集体（含乡镇）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拍卖、改制等方式转变为民营企业。2001年4月，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2001年起，市委开始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推动杭州由国有经济大市向民营经济大市转变，向民营经济强市跨越。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杭州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从2002年起，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处于全国城市和全省首位。

要把经济搞上去，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这是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导思想。1992年5月，市委召开六届十次全会，正式提出“科技兴市”方针。1995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科技大会，全面启动“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为顺利推进工程实施，市委、市政府确定各子工程的牵头单位及具体任务，并制定考核目标和保障措施。各区（县、市）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也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研究解决本行业、本部门的科技进步问题。在“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的实施和带动下，杭州“科技兴市”战略实施成效显著。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得到实施；以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两大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数据通信网络建设全国领先；新技术、新材料开始在城市规划、建设和市民生活中得到应用。继萧山市、富阳市、西湖区、下城区相继成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市）、区之后，杭州市在1997年荣获“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称号，并且当

年全市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

为了推动杭州高新产业的发展，2000年7月，市委召开八届五次全会，要求实施“一号工程”，以建设信息港、新药港、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教园区为重点，推动“天堂硅谷”建设。2001年8月，市委、市政府印发《杭州市2001—2010年高技术产业规划纲要的通知》，明确将“两港三区”^①建设摆在国民经济的突出位置，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环保等产业。杭州市先后与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并引导部分企业通过组建技术联盟、签署合作协议等形式，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协作，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0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为377.46亿元，占同口径工业销售产值的25.2%；增加值达到93.84亿元，占同口径工业增加值的26.6%；高（新）技术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6177元/人，比全市平均水平高44.5%。杭州初步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支柱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培育四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的实施，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了杭州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更新，也培育起一批战略新兴产业。

二、面向新世纪，开创新局面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按照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精神，市委提出

^① 根据形势的发展，2003年12月，市委把“天堂硅谷”重点建设的“两港三区”扩张为“两港五区”，“两港”即信息港和新药港，“五区”即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教园区、临平工业园区和萧山江东工业园区。

杭州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并部署开展了多项开创性的工作，为新世纪杭州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1998年10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金明代表七届市委向大会作题为《高举伟大旗帜 锐意开拓进取 谱写杭州跨世纪发展新篇章》的报告。报告总结市七次党代会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重申市委七届七次全会提出的把杭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风景旅游城市的跨世纪发展蓝图，并提出杭州跨世纪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任务和方略、举措。

大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杭州市出席中共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1月4日，八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李金明任市委书记，王永明、虞荣仁、朱报春任市委副书记，吴键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市八次党代会是在从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把杭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进而到20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正当全市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跨世纪发展蓝图奋斗的时候，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杭州的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和旅游业发展等造成了严重冲击。面对来势汹汹的危机，市委、市政府结合杭州实际，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是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拉动内需。从1998年二季度开始，全市基本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到1999年上半年每月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率都在150%以上，最高达到172.7%，考虑到对比基数关系，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率一直持续到1999年底。二是千方百计稳定出口。市委、市政府出台措施，引导企业发展加工贸易，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有条件的生产企业申报自

营出口权，大力发展外贸出口业务，并引导企业在巩固东亚、欧美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南美、非洲等地市场。1998年，全市外贸自营出口16.97亿美元，同比增长16.75%；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3.14%，同比增长十多个百分点。三是创新方法，提高利用省外、境外资金的水平。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杭州市一方面积极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另一方面把招商引资同产业结构调整、嫁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等结合起来，拓展招商引资新思路。通过这些措施，1998年全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16个，实际利用外资3.84亿美元，接近前一年的水平。在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26个，总投资和协议外资分别占当年批准数的59.3%和49%，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四是拓展旅游市场，稳定客源。为遏制境外客源大幅下滑的势头，1998年市委、市政府首次召开全市商贸旅游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促销手段，大力开拓国内外旅游市场。按照市委部署，市商贸旅游部门和各区、县（市）继续巩固和发展东亚、东南亚等主要客源市场，重视和拓展港台市场，努力开拓欧美、澳大利亚市场，并积极推出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延伸旅游产业链。通过这些措施，1998年全市旅游业得到稳定发展，境外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10%和4.60%。

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市委、市政府临危不乱，结合杭州实际制定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带领全市人民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使杭州经济在经历短暂波动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也为此后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在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1998年11月，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杭州考察时，强调要把杭州真正建成经济强市、文化名城，“强市名城”从此成为杭州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1999年8月，市委先后下发《关于杭州建设经济强市的若干意见》《关于杭州

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经济强市和文化名城的总体思路，要求把杭州建设成为经济总量大、综合效益好、整体素质高、发展后劲足的经济强市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优良文化风尚、丰富文化生活、先进文化设施、发达文化产业的文化名城。为推动“强市名城”建设，杭州市一方面深入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高新技术产业是第一增长点”的理念，大力实施以“两港三区”建设为重点的“一号工程”，充分发挥科技和高新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融资投资、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方面促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80亿元，经济总量保持全国省会城市第二、副省级城市第三、大中城市第八的位次；产业结构继续得到调整，财政总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省、全国前列。同时，全市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文化系统经营性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全市文艺、广播电视精品创作获国家级奖项68个、省级奖项195个，顺利举办和筹办第五届亚洲艺术节、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西湖狂欢节等。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全市农村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全面完成。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维护社会稳定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市委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1995年12月，市委七届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地方立法和司法、执法、普法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原则，结合杭州实际，健全地方法规体系，强化法制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功能”，“依法治理各项事业”。1997年1月，市委召开七届十次全会

作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市方针的决定。8月，市委印发《杭州市1996—2000年依法治市规划》，提出以实施“三五”普法为基础，以落实执法责任制为中心环节，以加快城市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经济运行行为重点，依法管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按照市委部署，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按照“目标具体化、责任明确化、行为规范化”的要求，分别制订部门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明确本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权限，并层层签订执法责任书。市、区（县、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大对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检查和视察评议。

在各项事业逐步实施依法治理的基础上，1998年5月，市政府召开全面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动员大会，部署在全市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1999年12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决定〉并报送有关情况的通知》，开始全面落实依法行政工作。为确保执法责任制的落实，市委要求加大全市8000多名执法人员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力度，对部分岗位实行定期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市政府成立由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法制局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考核评议小组，制定《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进行评分考核；各执法机关加大行风建设，普遍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创优良业绩、树公仆形象”“三优一满意”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市委大力推动法院、检察院进行司法审判制度规范化、科学化改革和内部运转机制改革，引导全市逐步形成常态化的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新闻监督、市民监督等机制。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同时，杭州市采取多种措施，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1993年，市委要求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调整充实力量，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并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制。1994年，杭州市开始全面实行综合治理目标管理

责任制。1995年10月，全市启动“平安社区”创建活动。此后，“平安社区”创建活动不断深化，延伸至安全文明小区、安全文明村、治安安全单位创建等。在此基础上，市委把“安全”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列入杭州文明城市创建的总体目标。在市委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大力整治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控制重大刑事案件发案率，积极争创一流文明城市。

为确保社会安定，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要求，以“严打”的态势，严厉打击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1996年、1998年、2000年至2001年，杭州市按照中央统一要求，几次开展“严打”斗争。通过“严打”，全市侦破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批捕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打掉了一批违法犯罪团伙，极大地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开展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种严重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坚决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全市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揭露、批判李洪志及“法轮功”蛊惑人心、组织邪教组织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全市各界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深刻揭露邪教组织对家庭、社会的危害，深刻认识其政治野心和图谋。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法轮功”的实质和危害，自觉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稳定；部分被蒙蔽被利用被裹挟的群众也充分认识到“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自觉与其划清界限。以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为契机，市委一方面加大宗教方面的统战工作力度，加强爱国宗教团体领导班子建设，使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爱国信教群众手中，另一方面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违法”的基本思路，下大力气狠抓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的监督整治工作。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大力开展非法宗教场所和团体的清理整治工作，特别是余杭、萧山通过对辖区内非法宗教

活动场所的全面清理整治，有效地保护了信教群众的信教自由，维护了社会稳定。

杭州市依法治市战略的实施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全面好转，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掀起了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为了保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抵制市场经济大潮中消极腐败因素对党健康肌体的侵蚀，必须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市委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要求，全面加强全市党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坚持把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要求，凝聚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投身改革开放，1993年10月，市委在前期全面试点基础上，在全市开展党的十四大精神再教育活动。1994年1月，市委下发通知，在全市党员中开展持续三年的“两学两提高”^①活动。其间，全市还组织开展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活动。这些理论学习解除了人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克服了小农经济思想和等、靠、要等消极思想，增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观念，有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根据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

^①“两学两提高”活动，即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科技文化业务知识，提高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

原则，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改革干部选拔制度，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把那些政治上坚定、勇于开拓、锐意进取、能够打开工作新局面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入各级领导班子。根据这一认识，1992年8月，市委打破常规，推出10个市管副局级领导岗位，在全市范围内首次采用公开选拔的方式选拔优秀干部。此后，公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重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建设的同时，市委还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建立和健全任期审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干部管理制度。为优化干部结构、培养跨世纪的接班人，1994年11月市委七届四次会议后，市委更加重视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的合理配置，进一步重视后备干部的培养和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通过公开选拔、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等干部选拔机制，大批优秀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使得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驾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为落实中央全会精神，市委积极探索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很多亮点。

在企业党建和非公企业党建方面，市委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政治核心地位。针对杭州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1992年12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高度重视‘三资’企业中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市七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要“注重探索在企业集团、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等经济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创造适合这些企业特点的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按此部署，市委组织部对在新经济组织、“三资”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的组建方法和活动方式作出详细规定。在杭州市、萧山市两级党委的支持下，1998年9月，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成立全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委。传化集团组建非公企业党委的

做法和经验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此作出批示：“要认真总结此类经验，找出共性问题。这不仅对浙江有现实意义，对全国也有积极作用。”200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杭州富通集团公司、传化集团和杭州大地网架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对加强新时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

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市委持续开展党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思想教育。1994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提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好”^①要求。市委贯彻中央“五好”要求和浙江省委指示，以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以整顿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村党支部为重点，以创建“小康示范村”和“脱贫致富先进村”为抓手，全面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96年7月，市委制定实施《杭州市委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三年规划（1996—1998）》。为建立一支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具有双带^②本领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自2000年开始，市委实施以村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领头雁工程”。到2002年，全市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实现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45岁左右年龄、具有双带本领的三个60%的目标。

在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方面，市委七届四次全会强调，街道党组织要发挥在街道、居委会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明确提出街道党的建设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管理为重点，以街道居民区工作为基础，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城区工作指导方针进行。1996年，下城区艮山街道党工委首次使用“社区党建”这一概念，并组建“艮山街道社区党建联席会”，使杭州市社区党建迈出具有实质意义的

① “五好”：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培养锻炼一支好队伍，选准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的经营机制，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

② 双带：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

第一步。经过不断探索，全市逐步形成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建组织网络。2000年9月，市委召开社区党建工作会议，作出全面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明确的社区党建工作目标。200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杭视察社区党建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杭州社区党的组织建设向更高质量发展。2002年7月，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在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科普楼诞生。

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市委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思想上，市委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的部署，在1999年7月到2000年5月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在2000年6月开展“思源思进、加快发展”大讨论，在2001年又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制度建设上，杭州市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出台任前公示、干部试用、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划线腾位等制度。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杭州市大力贯彻廉洁从政准则，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通“12345”市长公开电话、“96666”作风效能投诉电话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监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通过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市各级党的组织建设明显得到加强，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能力得到提高，也经受住了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风险考验，为20世纪90年代杭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城市化的推进与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认真执行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同时大力贯彻计划生育、土地、环保三大基本国策，推动杭州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城市化建设的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城市化建设起步，日益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为把杭州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名城，市委六届十一次会议提出，要遵循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保护风景名胜兼顾、改造旧城与开发新城兼顾、中心城市建设与中小集镇建设兼顾的城市建设方针，合理调整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市第七次党代会强调，要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地位。以此为指导，市委提出集中精力、突出重点，加快城市建设的要求。

为广开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市委、市政府变“以资定项”为“以项筹资”，具体措施有：一是实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屋开发并举的办法，组建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公司，重点放在房屋开发的一级市场上，为城市建设筹措更多的资金；二是以庆春路改造为契机，探索实行“以路带房、以房养路、路房结合、综合开发”的办法，取得经验后推广使用；三是积极推行土地有偿使用。这些措施的推出，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驶上了快车道，杭州市在庆春路改造后，陆续开展凤起路、湖墅路、延安南路等改造工程，并取得道路建设、地块开发和住宅建设的综合效益。

1992年12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进行交通道路建设。根据这一新的筹资方式，1993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工建设杭州至富阳高等级公路，这成为浙江道路建设中第一个用“四自”思路组织实施的工程。此后，杭州市在天目山路延伸段、复兴路改造等市区道路建设工程中，普遍采用“四自”模式。同时，杭州市还广泛利用世界银行、外

国政府的贷（赠）款以及外资等，不仅进行道路建设，而且建设西区水厂、运河截污工程和扩建四堡污水处理厂等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杭州市探索以房养路、引进外资、盘活存量、负债建设等多种市场经济手段筹集资金，不仅解决了当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困难，加快了杭州城市建设，而且为以后杭州开展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

党的十五大后，市委、市政府继续推进城市建设投资体制改革，确定“财政投入、市场补偿、有偿使用、合理计价”的指导方针，组建城建投资公司和基金会，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决杭甬高速公路和绕城公路与城区连接道路的交通拥堵，继1996年推出“一隧二桥十路”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工程之后，市委、市政府于1997年又提出“主攻东部、建设高架”思路。经过积极努力，到1997年底，市区道路长度、道路面积、人均占道面积分别比1995年底增长13.7%、31.3%、27.3%，仅两年的时间，市区总道路面积就增加近三分之一。

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建立住房基金和住房融资体系，全市住房商品化步伐逐步加快，居民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在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杭州市根据政府扶持、单位支持、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努力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状况。

城区面积狭小一直制约着杭州的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积极争取城市行政区划调整。1996年5月，萧山市浦沿镇、西兴镇、长河镇（以此三镇为辖区，于同年12月成立滨江区）和余杭市三墩镇、九堡镇、下沙乡（含围垦区）等6个乡镇划入杭州市区；2001年3月，萧山、余杭撤市设区。通过这些措施，杭州市区面积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379万人，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分别上升到第5位、第6位，在长三角地区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

是杭州城市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对新世纪城市发展框架的拉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贯彻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整体素质偏低、经营粗放、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问题。为此，市七次党代会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坚持落实人口、土地、环保等基本国策前提下进行。

在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已处在人口低生育水平。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市委、市政府出台《杭州市计划生育工作“九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尽快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①，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的文明幸福，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1998年3月，市政府批转《杭州市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并在4月召开改革启动大会，提出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改革要坚持“三不变”“三为主”“三结合”的原则^②。1999年，市委、市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纳入加快城市化发展、建设名城强市的总体发展规划中，强调各部门要齐抓共管，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先后启动并不断深化奔小康新家庭计划活动、流动人口“五统一、一服务”^③、计划生育全程优质服务等重点工作，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向

① “两个转变”，即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

② “三不变”，即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人口目标不变，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三为主”，即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结合”，即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③ “五统一、一服务”，即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验证、统一收费、统一考核，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纵深发展。同时，全市计划生育管理不断深化，在原有五城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滨江区，实现六区联动，萧山、余杭两市（区）也稳步推进，全市城市计划生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完善。

进入新世纪后，市委进一步强化人口意识，要求稳定低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环境，积极推进人口宏观管理理念转变和管理体制的创新。200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以“两个坚持”^①“强化两个”^②为抓手，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统筹安排。按此部署，全市推开计划生育统计改革，基本实现从户籍人口管理向常住人口管理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全市计划生育管理基本实现“九五”规划提出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在贯彻保护土地基本国策方面，市委以国土综合整治为抓手，采取一系列保护耕地的举措。1997年8月，市委召开全市农村宅基地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1998年9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推动农村宅基地专项整治工作由点到面全面展开，并确立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建新必须拆旧”的原则。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杭州市迅速扭转乱占耕地建房的歪风，农村宅基地选址一般结合旧村改造和“空心村”整治，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和非耕地。

为切实保护林业资源，1998年10月，市委、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按照“谁批准谁负责、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以区、县（市）为单位制订出1999年到200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在2000年底前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强调严厉打击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刹住不正之风。2001年10月，市政府印发《杭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总体规划》，要求到2010年建设成为结构合理、功能多样、充满生

① “两个坚持”：坚持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坚持依法行政。

② “两个强化”：强化宣传技术服务、强化基层基础建设。

机和活力的比较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全市陆续开展标准化林业站建设、高效林业示范工程建设，不仅继续实行大规模的封山育林，还实施林木采伐证制度，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与此同时，以“三江两岸”水土保持林、大中型水库水源涵养林、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特用林等八大生态公益林工程为重点的生态公益林建设进展顺利，全市城乡绿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城镇、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02年，经财政部、国家林业局批准，钱塘江源头所在地淳安县、建德市共8.87万公顷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列入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为此，杭州市和两地林业部门实行一个护林组织、一套护林制度、一份管护合同、一块封育牌、一张规划图“五个一”管理，实施绿色通道建设、特色林业基地建设、阔叶林保护、发展森林旅游四个结合，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到21世纪初，杭州市林业建设实现了三大工作重心的转移，即林业发展从抓产业建设为主向抓生产建设为主转移，林业管理从抓全面绿化为主向抓封山育林和森林资源保护为主转移，林业生产从抓造林绿化为主向抓高效林业和低产林改造为主转移。

在实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方面，1998年3月，市委提出通过两至三年的努力，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并实施“碧水、蓝天、绿色、清静”工程。为此，杭州市采取各种保护环境的举措。一是建立保护环境目标责任制。市政府每年都与各区、县（市）以及市有关部门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各区、县（市）也把本级政府当年的环保责任目标以及本地亟须解决的环境问题，层层分解到乡镇政府、有关部门、重点污染企业，做到“竖到底，横到边”，真正做到环境保护目标的齐抓共管。二是建章立制，实施制度管理。1998年，杭州市被确定为全国三个总量排污收费试点城市之一。以此为契机，市政府制定《杭州市总量排污收费试点实施方案》，全面推行排污收费制度。2000

年12月，市政府印发《杭州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对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申请、审核、发证、监督、法律责任进行规定。截至2000年，市政府还先后颁布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市区空调设备安装、大气污染控制区管理等47项环境保护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涵盖了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使各级政府的环境管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市委、市政府建立各种工作机制，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如：建立市计委、市建委、市环保局、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工商局联席会议审批制度，禁止审批严重污染环境、违反总体规划和影响景观的项目；建立建设项目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严格控制环境污染。2000年以后，全市“三同时”验收项目的执行率和合格率连年达到100%，基本控制了新污染的发展势头。三是健全管理队伍，加强环境保护监管。2001年12月，市委、市政府对环保局的部分职能进行调整：设置余杭区、萧山区环保局，为区政府组成部门；建立上城、下城等六个城区环保分局，为市环保局派出机构；对富阳、建德、桐庐、临安、淳安五个辖区县领导体制进行调整，改为由市环保局和当地政府双重领导、以当地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健全环保机构队伍的同时，杭州市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投入，加快生态建设步伐，加大对各种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监督、打击力度，对市区污染企业采取限期整改、关闭、停产、搬迁等措施。通过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企业、群众的共同努力，杭州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01年6月，杭州市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保护土地、保护环境三大基本国策的实施，使杭州市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了土地和生态环境，比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和科教事业的发展

1993年2月和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科技、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具体要求等。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杭州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科技、教育改革，在实现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协调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加快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少数人理想信念淡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不正之风、歪风邪气和社会丑恶现象蔓延。为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市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1992年5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动力就没有保证，物质文明建设也搞不好。1994年7月，市委召开七届三次全会，讨论通过了《杭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1994—2000年）》，强调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努力提高全市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以此为指导，市委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深入实施“446”工程，即加强理论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四大建设；发展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卫生体育事业四项事业；开展“塑造天堂新形象”、创建文明省会、创建农村文明新风、创建文明单位、军警民共建及学雷锋活动等六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杭州市持续深入开展各种文明创建活动，特别是积极创建文明城市。1991年9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创建文明城市竞赛活动动员大会，号召全市干部群众为使杭州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发达，环境整洁，市民文明素质显著提高”的文明城市而奋斗。围绕“四优四感”^①文明城市创建总目标，在总结前期创建工作成效的基础上，1997年市委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城市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深入开展“双禁”（禁赌、禁毒）和“严打”斗争，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净化城市风气。10月，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动员在全市开展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以人人遵守“六不”^②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创建文明活动。根据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在全市普遍开展了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示范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党的十五大后，市委根据文明城市创建新要求，狠抓城市生态环境和市容市貌的改善，实施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洁起来”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形象工程。2000年，市委提出把城市作为最大的资源、最大的财富来经营、管理，打响“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城市品牌，使杭州真正成为“杭州人自豪、外地人羡慕、投资者满意”的文明“天堂”。按照市委部署，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不断深入，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开展，城市的文明程度、市民的道德修养持续改善。

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杭州市积极关心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生活。2000年12月，在总结市总工会开展的“社会各

① “四优四感”：1994年7月，杭州市委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1994—2000）》，提出“三优四感”创建总目标。三优，即优良秩序、优美环境、优质服务；四感，即安全感、舒适感、亲切感、文明感。后来在实践中，又充实了优化管理，“三优四感”变成“四优四感”。

② “六不”：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不说粗话脏话。

界送温暖、特困职工沐春风”活动的基础上，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广泛开展“春风行动”的通知》。自此，“春风行动”成为杭州扶危济困的代名词，各种形式的帮扶困难群众、困难家庭、困难地区的结对帮扶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其内容不断丰富充实，从一开始动员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帮扶困难群众，发展到通过政策帮扶、项目帮扶等多种方式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致富。

杭州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城市文明程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市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

实施“科技兴市”方针

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市委认为，如果不重视科技和人才，杭州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难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根据这个认识，1992年5月召开的市委六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全面实施“科技兴市”方针，建立“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9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并通过实施“科技兴市”规划纲要等文件。1992年12月召开市委六届十一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作为杭州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四个增长点之一，进一步提出“科技教育兴市”的方针。会议明确了科教兴市方针的主攻方向，提出了科技进步对全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要从1990年的33%提高到20世纪末的45%。1996年5月，市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市科技进步条例》，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科教兴市纳入法治化轨道。

为贯彻落实“科技兴市”方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科技运行机制，市委、市政府提出“分流重组、择优支持，政策引导，推动发展”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杭州市在科研单位中引

入竞争机制，鼓励科研单位走集科研、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产业化道路，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在包干型科研单位中实行人才、机构分流，实行“一所两制”，走开发型科研单位的道路；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技术进步激励机制；把企业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指标纳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制等。1998年，市政府批转市属科研机构改革方案，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权制度及运行机制为突破口，积极调整结构，合理分流人才，促进科技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在这一政策支持下，杭州市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增加科技投入，创办多种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科技型企业，形成国营科技机构和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型企业长期共存、优势互补、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新局面，同时各类技术市场得到培育和发展，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000年8月，市政府出台全面推进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推动应用型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对社会公益型科研院所实行分类改革。按照要求，全市各科研院所均制订体制改革方案，市药物研究所、市日用化工所等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业，市医药情报所等整体转为中介服务机构。为支持科研院所体制改革，杭州市建立市属科研院所技术开发专项基金，对相关院所资助科研经费。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到2005年，全市市属科研院所转制改革基本完成，改革取得较大进展。

杭州市大力实施“科技兴市”方针，进一步深化了全市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使科技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

创建教育强市

1992年12月，市委召开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建立教育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运行机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1994年8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杭州市1995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①，到2000年，市区、各县城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幼儿入园率城镇达到98%、农村达到85%，聋哑、残障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在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中，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之在高中阶段招生的比例超过普通高中；各级财政要逐年增加教育投入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增加到接近4%；鼓励集资办学、私人办学和利用外资兴办教育事业，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与社会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

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杭州市制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开展“优秀园丁”“先进教师”“教坛新秀”评选活动；出台教工购房、建房、租赁等优惠政策，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积极引进优秀教师，仅1994年到1995年上半年就引进教师700余人。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94年，杭州市231个乡镇全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完成。2000年，市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02年，全市小学入学率达到100%。同时，各种合资、合作办学，公立学校以自有资金新建学校、举办民办班等各种办学方式开始出现，各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全市学校在硬件改善的同时，软件也得到改善，特别是随着录音机、投影仪、银幕、电脑多媒体等进入课堂，教学手段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自1997年开始，全市广泛开展争创“教育强镇（乡）”活动。到2001年，杭州市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现

^① 1991年，杭州市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五个城区和255个乡镇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全市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达73%。

代教育技术实验区。

在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杭州市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要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市委协调、配合下，1993年起，在杭高等院校进行一些局部的院系调整和共建合作。1998年9月，国务院发文批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以此为标志，杭州出现高校合并的高潮。在这一时期，杭州教育学院、杭州师范学校等并入杭州师范学院，浙江电子工业学校、浙江轻工业学校、浙江对外贸易学校等并入浙江树人学院，等等；同时新建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新设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杭州师范学院钱江学院等一批二级独立学院，到2005年在杭高等职业院校有19所。与此同时，在杭高校扩大招生规模，1999年市属高校招生同比增长59.4%，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增长11%，全市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7%提高到18.7%。到2002年，全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在本科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规模也在扩大。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杭州市全面实施大学城建设工程，加快建设下沙高教园区、小和山高教园区、浙江大学三墩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滨江高教园区等，使进入高教园区办学的高校达14所。

在市委领导下，杭州市这一时期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全面快速发展，城乡教育结构进一步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为杭州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第十一章

推进科学发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本章提要

新世纪的头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科学发展观和“八八战略”指引下，中共杭州市委实施“五大战略”，“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推动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市委确立“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目标，全面开展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五大生活品质建设，破解“七大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杭州市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经过十年奋斗，杭州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框架基本形成，城市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领跑全省，城市影响力不断增强。

一、以“八八战略”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7月，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四次全会，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浙江省发展要发

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即“八八战略”。中共杭州市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

2002年2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王国平代表中共杭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作题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揽全局，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报告。市第九次党代会是跨入新世纪后杭州市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会议提出“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任务。

围绕这一任务，会议强调新世纪初的十年，是杭州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揽全局，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坚持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的方针，推进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加强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和党的建设，确保2005年市区、2010年全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为“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大会提出杭州各方面的主要奋斗目标：年均GDP增幅保持在10%以上，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力争成为经济总量大、运行质量高、综合实力强的大都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完善，力争成为运行机制活、外向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大都市；城市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良好，力争成为服务功能优、人居环境佳、可持续发展的大都市；科技教育加速发展，人才集聚功能明显增强，力争成为学习氛围浓、创新能力强、信息化程度高的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力争成为市民素质好、文化品位高、社会秩序优的大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力争成为就业机会多、消费需求旺、生活质量高的大都市；中心

城市集聚辐射功能强，县（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快，力争成为城乡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一体化、网络化大都市。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2002年2月4日，九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国平为市委书记，茅临生、于辉达、朱报春、王建满、叶明为市委副书记，叶明兼任市纪委书记。

正当全市人民为实现市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全国爆发了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疫情。

2003年春，“非典”在广东省局部爆发，迅速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也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生疫情。“非典”疫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2月25日和4月11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非典”防治工作的领导，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并进一步明确卫生、教育、经贸、交通、药监、财政、公安、宣传等部门的职责。4月1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和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强调将“非典”防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同日，市政府决定成立杭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协调小组，并建立协调会议制度。19日晚，杭州市发现、确诊3例输入性“非典”病人，市四套领导班子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建立“非典”防治工作统一领导机构、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和尽快控制疫情等措施，并决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与“非典”病人密切接触的425户、2个单位、1000多人实施隔离。20日下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十条紧急措施。同日，市委、市政府成立杭州市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茅临生任常务副组长；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

党委、政府和各有关单位把做好“非典”防治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市政府印发《杭州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应急预案》，明确“非典”防治的各项工作、要求和“非典”疫情发生后的应急措施等。此后，市委、市政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陆续出台十多项措施，在短时间内迅速编织起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的立体防控网络。

在市委领导下，全市建立起四级防控工作领导体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市卫生、交通、教育、公安、旅游、工商、宣传等系统紧急行动，全力做好医疗救护、阻断疫情传播、社会治安防控、物资供应、市场监管、舆论引导等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组织下，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深入基层，检查防控工作；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动员全市人民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5月3日，全市第一个疫点隔离点“在水一方”社区解除隔离；22日，杭州市解除所有疫情点和留验点；25日，首位“非典”病人治愈出院。截至6月18日，全市累计发现、确诊“非典”病例4例（均为输入性），治愈3例；未发生第二代病人及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现象，全市抗击“非典”疫情取得重大胜利。抗击“非典”疫情的胜利，维护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了杭州危机管理和公共卫生建设水平的提高。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市委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缓解“非典”疫情对部分行业带来的冲击，杭州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实行减免收费等13项优惠政策，有力保证了经济正常发展。抗击“非典”斗争胜利后，杭州又迈入了正常发展轨道。

实施“五大战略”

进入新世纪，杭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000美元，迫切需要提出符合自身实际的新发展战略。市九次党代会后，在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论证，2003年12月召开的市委九届六次全会，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推进城市化战略；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为重点，推进“工业兴市”战略；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重点，推进“旅游西进”战略；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为重点，推进“开放带动”战略；以突破要素供给瓶颈和生态市建设为重点，推进“环境立市”战略。

实施城市化战略。市九次党代会提出，按照“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城市发展战略，构筑一主三副六组团大都市框架。

实施“工业兴市”战略。2001年12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全市区、县（市）委书记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工业兴市”口号。2002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第一次工业兴市大会，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冯根生、宗庆后、鲁冠球，集中出台6个支持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面拉开了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序幕。此后直到2010年，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召开工业兴市大会，明确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思路和举措。

在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过程中，杭州市确立了提升发展传统优势工业、适度发展新型重化工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位一体”的工业发展方针，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从“杭州制造”向“杭州创造”的跨越，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增添了强劲引擎。“十五”期间，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814.7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6.3%，年均增长29.7%。截至2005年，杭州市重点培育的56个特色城镇工业功能区与6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实现工业总产值1451.28亿元，是2002年的4.2倍。“十一五”期间，2010年，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2500.29亿元，实现利税1216.34亿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91%和170%，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3.8%和22%。

在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过程中，杭州抓住世界制造业梯度转

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逐步形成与城市定位相适应、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五大支柱产业。机械装备业、钢结构、新型建材、精细化工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一批新的产业集群。通过“工业兴市”战略的实施，杭州工业经济总量、规模均居浙江省第一。

推进“旅游西进”。为统筹全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7月召开的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走“大旅游、大杭州、大投入、大发展”的发展路子，实施“旅游西进”战略。“旅游西进”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旅游西进、规划西进、交通西进、市场西进、产业西进五大部分。2001年5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要求大力推进“交通西进，旅游西进”，实施“规划共绘、设施共建、市场共拓、产业共兴、环境共保，构筑大杭州交通，实现一小时半交通圈、旅游圈和经济圈”的战略。7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意见》，并按照“统一规划、有序开发、合理布局、永续利用”的要求，陆续制订《杭州市旅游业“十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纲要》和《杭州市西部地区保护与发展规划》等覆盖13个区、县（市）的“旅游西进”规划。在2005年之前建成以“一绕、三线、三连、四大接口”^①为主干道的快速、畅通、舒适、安全的交通路网体系，构筑起全市一小时半的旅游交通圈。同时把具有杭州特色的优势景区、景点组合包装，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整体宣传，努力扩大杭州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辐

^① “一绕”是指杭州绕城高速公路。“三线”是指改造320国道、06省道建德洋溪至淳安千岛湖镇段，建成杭州至千岛湖高速公路；改造02省道，建成杭州至昱岭关高速公路；改造05省道新登至淳安段，建成一级公路。“三连”是指余杭彭公—余杭长乐—临安松溪—富阳中埠—萧山樟树下的彭樟线；桐庐大桥—桐庐分水—临安於潜的桐於线；临文昌化—淳安临岐—淳安文昌的昌文线。“四大接口”是指02省道与安徽黄山高速公路连接口、淳安环湖公路与安徽歙县连接口、新320国道与衢州连接口、330国道与金华兰溪连接口。

射、带动作用，以“旅游圈”带动“经济圈”繁荣。

“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取得可喜成果。从2002年到2008年，旅游总收入由294亿元增加到707亿元，增长140.5%，2008年旅游总收入占全市GDP的14.8%，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工业、房地产、创意、会展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形象。2006年，杭州市成功举办“世界休闲博览会”，并荣获“东方休闲之都”称号。2007年，杭州被世界旅游组织（UNWTO）和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改善了西部五个县（市）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加快了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聚，也增强了全市区域协调发展和杭州融入长三角的战略纵深。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开放带动”战略是“工业兴市”战略的重要支撑。两大战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通过继续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和“三外并举、四区联动”战略，进一步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通过两轮利用外资“三年倍增”计划的实施，杭州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43.56亿美元，是2000年利用外资4.31亿美元的10.11倍。

实施“环境立市”战略。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环境，2002年12月召开的市委九届四次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环境立市”战略。2003年7月，市委九届五次全会要求全力抓好“生态市建设”等“十大工程”，重点抓好“建设生态城市、提升城市环境”等七项工作。2004年1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临安调研时指出，生态环境是杭州的立市之本，杭州要“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首先要打造绿色大都市和绿色新天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坚定不移地实施“环境立市”战略，扎实推进生态市建设步伐。为此，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认真抓好杭州市区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管理办法》《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就生态城市建设作出部署。

通过“环境立市”战略的实施，杭州市“生态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杭州市成功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2009年，杭州市被列入第二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2011年，临安市和桐庐县获得“国家生态县（市）”称号，淳安县通过国家生态县建设技术评估，江干区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生态区；杭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水环境质量改善，声环境质量稳定。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五大战略”的实施，全方位提高了杭州的城市综合实力，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协调快速发展的局面。

推进“法治杭州”“平安杭州”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与浙江省委的部署，市委加快推进“法治杭州”“平安杭州”建设。

2002年7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市委九届三次全会上提出，杭州要以依法治市为重点，推进政治文明；以关心弱势群体为重点，推进安居乐业。12月，市委九届四次全会强调要重点抓好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市，努力扩大人民对地方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完善决策机制，打造“平安杭州”。根据这一精神，杭州市修订和废止了一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2003年，杭州政府法制网开通，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2006年，全市各级政府开始聘请法律顾问，推动政府部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2008年，“律师进社区”活动启动，逐步打造覆盖全市所有社区（村）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深化行政执

法责任制，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各项举措，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公平公正。全市政法系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认真起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认真开展国家和省、市有关立法征求意见工作；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及时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侦破命案、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保护社会治安的良好态势；加强对流动人口、闲散人员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管理，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建设与村、社区综治工作室（站）整体联动机制等，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杭州市自2009年连续4年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市”，2013年被中央综治委授予2009—2012年“全国平安（综治）优秀市”荣誉称号。“法治杭州”“平安杭州”建设，巩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贡献，也增强了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了城市形象和美誉度。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002年2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培育大都市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03年12月，市委九届六次全会要求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人文精神，推进文明创建。2006年8月，市委、市政府印发《杭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要求树立农村文明风尚，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深入开展“双建设、双整治”和“双千结对、共创文明”活动，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文明的乡风习俗。市委多次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双拥共建，弘扬民族精神，加强道德建设，提高群众素质，让百姓共享文明。

按照市委部署，杭州市组建市、区（县、市）两级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加大宏观文化管理体制调整和文化市场综合体制改革力度，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编制《杭州市区文化设施三年实施规划》，构建“15分钟文化圈”；先后举办第五届亚洲艺术节、中国京杭大运河文化艺术节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制作播出公益广告或精神文明建设专题片，在全市社区楼道张挂宣传牌等。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县（市）一方面积极开展以城市入城口、农贸市场、城郊接合部、城中村、建筑工地、河道污染等为重点的环境问题综合整治，完善城乡环卫设施，革除陋习、倡导文明，另一方面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市、区（县、市）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系列讲座、社区工作者演讲比赛和社区文艺会演，向结对村提供扶持资金、赠送图书，帮助修建道路、桥梁、文化场地等，推动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010年，市委、市政府强化“双千结对、共创文明”活动，继续开展“乡风评议”活动，将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对并提供扶持，安排就业、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打造市领导、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义务监督员、新闻媒体、市民群众“五位一体”的监督机制推进清洁城市工作。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杭州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先后荣获“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并在2011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升了城乡群众的生活品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了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二、大力推进“生活品质之城”建设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参加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和浙江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杭州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在人才、信息、交通等方面都有着优越的条件，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应当在全省各项工作中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动作用。中共杭州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认真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需要，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出了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

建设“生活品质之城”

2007年2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代表第九届市委向大会作题为《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而不懈奋斗》的报告。

大会认为今后五年是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实现从中等发达水平向发达水平跨越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发展进入黄金期、体制进入完善期、开放进入提升期、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但总体上机遇仍大于挑战。为此，大会提出这一时期杭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实施“五大战略”，引领“和谐创业”，破解“七难问题”^①，建设

^①“七难问题”：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办事难、清洁卫生难。

“名城强市”，构建平安、法治、和谐杭州，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力打造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

大会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表示人们生活的品位和质量，包括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五大品质”。根据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任务，大会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等生活品质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勾画出生活品质之城的美好画卷：一是引领“和谐创业”，夯实物质基础，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经济生活品质；二是建设名城强市，发展社会事业，着力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品质；三是建设“法治杭州”，发展民主政治，着力提高人民群众政治生活品质；四是破解“七难问题”，创新社会管理，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品质；五是推进“环境立市”，打造“宜居城市”，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环境生活品质。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2月13日，新产生的十届市委和市纪委分别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王国平当选为市委书记，蔡奇、王金财为市委副书记，叶明为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针对城市、产业、环境三大领域制定的“五大战略”，对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引领作用。但随着人均生产总值从1万美元向2万美元迈进，这对杭州市发展战略的层次、内涵和覆盖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2008年7月召开的市委十届四次全会，要求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中充实发展战略，实施“城市国际化”“工业兴市”“服务业优先”“软实力提升”“环境立市”“民主民生”六大战略。“六大战略”，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五大品质”，城市、产业、文

化、环境、民主、民生“六大领域”，是对“五大战略”的传承、提升和完善。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进入新世纪后，杭州面临着“全球化、新经济、互联网”的挑战，“高油价、高粮价、高成本”的挑战，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时代的挑战等。同时，杭州产业体系处在从参与国际低端市场竞争向参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些都要求杭州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正当杭州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而努力的时候，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中国，对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杭州产业体系加快调整。7月召开的市委十届四次全会，提出建立“3+1”现代产业体系。“3”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1”就是文化创意产业。8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3+1”产业体系工作专题会议，强调要以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为动力，正确把握“六对关系”^①，做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这篇大文章，推动杭州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大发展。12月，市委召开十届五次全会，再次强调要建立现代农业体系、现代工业体系、现代服务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体系，调整产业结构。

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升级从2003年开始与大都市建设有机融合、同步发展。2007年，杭州市大力开展优势产业带建设，加快一二三产融

^①“六对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杭州市情之间的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之间的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节能减排三项约束性指标（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土地三大指标（农转用、占补平衡和基本农田外移）之间的关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城市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合集聚发展。2010年，杭州市全面实施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把“两区一基地”（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菜篮子”基地）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平台，把项目推进作为工作的主抓手。全市农口系统按照贸工农一体化的要求，加快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现代都市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第二产业贯彻“提升发展传统优势工业、适度发展新型重化工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针，市委明确了各类工业中二级产业的发展重点。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县（市）坚持“一高一领先”目标，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纺织、丝绸、服装、食品、饮料、印刷包装等传统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的力度，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并推动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在新型重化工业方面，杭州市明确新型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重点领域、区域布局、环保要求和扶持政策，推动形成一批居领先地位的优势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技术和实力居浙江省首位，在全国形成特色优势。高新技术产业是杭州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产业优势，为此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推动各区、县（市）大力推进科技孵化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等。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发展，致力于把“服务经济”打造成杭州市的“首位经济”。自2005年起，杭州市连续5年召开现代服务业发展大会，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经过努力，全市旅游、金融、商贸物流等八大门类的现代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初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区域优势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服务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重点是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等八大行业。2005年，杭州市把“文化产业”拓展到

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服务等社会事业的部分领域，作出大力发展“大文化产业”的决策部署。此后，杭州市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其成为杭州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11年1月，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在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着力培育产业基础强、发展潜力大的文化创意、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息软件、先进装备制造、物联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十大产业。到2012年，全市十大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3511.8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5%；全市十大产业投资项目1964个，增加259个；完成投资718.97亿元，增长25.9%，占全市项目投资的33.8%。

杭州市发展“3+1”、“十大产业”等现代产业体系，顺应了世界产业演变趋势，符合杭州产业发展的实际特点和客观要求，有力地推进了杭州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杭州率先迈入后工业化时代，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跨越发展之路。

解决“七难”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杭州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为此，2002年7月，市委召开九届三次全会，提出要以关心弱势群体为重点，推进群众安居乐业。11月，在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强调，要坚持执政为民，切实解决好群众关注度最高的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办事难、清洁卫生难“七大难题”。2004年7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健全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七大问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强调“七大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群众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要依靠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七大问题”，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教育、文化、精神、健康、环境等多层面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12月，市

委十届三次全会通过改善民生、破解“七难”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决定，要求在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先，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基本原则下，抓好各项工作。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一系列政策，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七大难题”。

按照市委部署，全市各地各部门积极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围绕破解“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问题，杭州市先后制定出台《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等，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统筹、全面覆盖、没有漏洞、不留空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惠及600多万市民和200多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围绕破解“看病难”问题，杭州市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医疗保险体制和医疗救助体制四项改革，实现医疗保障全民覆盖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加快建设市属三甲医院，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形成居民15分钟就医圈。围绕破解“上学难”问题，全市城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完善教育资助体系，进一步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并且通过城乡结对互助工程，使市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延伸。围绕破解“住房难”问题，杭州市采取“政府主导、公司运作”的模式，率先在全国建立由廉租住房和经济租赁房等组成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和拆迁安置房建设，加快实施危旧房改善工程。同时，全市加快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步伐，实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让群众“住有所居”。围绕破解“行路停车难”问题，杭州市加快地铁建设力度，到2012年11月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68.79公里全线贯通并投入运营，形成主城区与江南、下沙和临平三大副城之间的半小时生活圈、交通圈。同时，加快推进“公交优先”战略，开通多条快速公交线，并购置千余辆欧Ⅲ排放标准的空调车，使杭州公交车的空调车率达到95%。围绕破解“办事难”问题，全市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积

极推进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审批行为，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并在市、区（县、市）、街道（乡镇）三级建成公共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办得了事、办得好事”。围绕破解“清洁卫生难”问题，杭州市积极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加强环境保护，保障食品安全。同时，通过就业援助、“春风行动”、停车新政、名校集团化、医药卫生保险救助联动改革等举措，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添砖加瓦。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着眼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更多关系民生的新问题，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形成“7+X”新框架，取得显著成效和阶段性成果。杭州市从与群众利益最相关的民生问题为突破口，集中精力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使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显著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协调发展，推动了杭州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示范和样板，向全社会展示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回应人民需求、向人民负责的城市形象。杭州在全国和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

名城强市建设的新进步

2006年9月，市委召开建设“一名城、四强市”工作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文化名城和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强市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会上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创新理念，加快“一名城、四强市”建设。此后，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加快“一名城、四强市”建设的意见》《“十一五”期间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强市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要求围绕杭州城市性质和总体发展目标，大力推进教科文卫体领域改革、开放、创新，不断增强文化创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到2010年，把杭州建设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得益彰、休闲文化与创业文化和谐交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为映衬、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共同发展、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同步提升，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主要发展指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的文化名城和教育强市、科技强市、卫生强市、体育强市。

按照“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原则和“保老城、建新城”思路，杭州市健全保护机构，制定保护规划，完善保护法规、规章，增加保护投入，加强文物考古和博物馆建设，启动西湖、运河（杭州段）等“申遗”，推动名城保护、建设迈上新台阶。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杭州小热昏、西泠印社金石篆刻、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富阳竹纸制作技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到2010年末，全市初步形成适应城市总体发展格局的文化发展布局，基本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成区15分钟文化服务圈。

在教育强市方面，2001年9月，杭州市在部分中等职业学校试点学分制改革，打通学校之间、专业之间、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学分互认的渠道，促进专业相对集中、办学特色明显的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初步形成。在试点成功基础上，2003年9月，全市直属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实施学分制。在此期间，2002年9月，教育部在余杭区进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试点，次年9月，上城区、富阳市等8个区（市）被列为省级课程改革试验区。到2004年9月，全市全面实施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与此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杭州市以破解“上学难”为契机，着手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至2007年底，全市成立教育集团69个，成员单位257家，逐渐形成核心连锁式、合作共同体式、高校（科研单位）领衔式和企业资助式等四大集团化办学模式，带动市辖13个区、县（市）全部进入省教育强县（区、市）行列。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改革，民办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杭州先后建成下沙、滨江、小和山高教园区和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等。到2010年，杭州市初步建成总量相对充足、结构

基本合理、体制富有活力、环境条件优越、内涵和谐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在科技强市方面，杭州市大力实施“一号工程”、建设“天堂硅谷”，重奖科技创新特别贡献者，开展科技强市（县）、人才强市、创新型城市创建活动，全面加强同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名校大院”的战略合作，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政府扶持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到2012年末，全市专利申请量53785件，专利授权量40651件，分别比上年增长31.5%和39.0%；全年新增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189家，培育省级研发中心49家、企业技术中心30家；年内新增中国驰名商标12个，累计达109个；新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选22名、省“千人计划”人选91名，新增院士工作站15家，累计引进院士65人；新增钱江特聘专家41名。杭州成为国内重要的创新创业中心、研发中心、成果交易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中心，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综合实力和公众科学文化素养居国内领先地位。

在卫生强市方面，在推进“四改联动”破解“看病难”问题的过程中，杭州市一方面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开展全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深化“卫生强镇”创建活动，另一方面加大医学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在市、区（县、市）医院培育一批重点学科。同时，以2003年12月市委九届六次全会与会人员，分五路到上城区小营巷、下城区三塘社区等地参加清洁杭州义务劳动为起点，全市再掀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到2007年底，新创建卫生强乡镇（街道）50个，全市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建成。

在此基础上，杭州市开展了健康城市建设试点。到2010年，全市初步建立卫生资源配置优化、卫生设施和技术领先、卫生队伍素质优

良、运行保障机制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全市人民基本形成良好的卫生意识，享有公平、优质、高效的卫生保健服务，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80岁左右，人民群众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体育强市建设方面，杭州市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体育事业投入力度，加强体育发展规划、后备人才培养、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城乡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展等。这期间，杭州市成功协办2007年女足世界杯（杭州赛区）比赛，成功举办全国残运会、中国龙舟公开赛总决赛、市运动会等。在竞技体育方面，杭州籍运动员在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到“十一五”末，全市初步形成群众体育综合指标领先、竞技体育竞争力居于前列、体育产业市场较为繁荣、体育场地设施基本完善、体育科教水平先进、体育事业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相协调的新格局。

杭州市开展“一名城、四强市”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探索。它推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杭州继续在全省发挥了龙头、领跑、示范、带头作用。

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框架的初步形成

根据市九次党代会提出的“构建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城市发展战略，杭州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

从“西湖时代”开始迈向“钱塘江时代”

长期以来，西湖是杭州的城市品牌，杭州的城市建设也围绕西湖景区展开。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杭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湖周边的发展空间已经饱和，环境和城市功能承载压力日益加大，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城市发展空间。

2000年7月召开的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并于2001年2月在《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得到确认。2001年3月，萧山、余杭撤市设区为杭州进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供了契机。2002年2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构筑杭州大都市框架，形成“一主三副、双轴六组团、六条生态带”^①“东动西静南新北秀中兴”的城市新格局。4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构筑大都市、推进城市化的实施意见》，要求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重构城市空间形态，形成以市区为核心、县城为依托、中心镇为基础，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市域网络化城市。2007年12月，市委召开十届三次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三副六组团”、市域网络化大都市、杭州都市经济圈，要求“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

2000年7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在钱塘江边建设一个集金融、商贸、会展、旅游、行政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央商务区，即钱江新城。2001年7月，杭州大剧院开工，拉开杭州城市发展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序幕。2002年，市委、市政府强调，在加快钱江新城建设的同时，要加快启动钱塘江南岸的钱江世纪城建设，形成南北呼应格局。2003年10月和2006年4月，市委、市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加快钱江新城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钱江新城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钱江新城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和加快钱江新城建设的总体要求，并完善新城开发建设管理机制、资金筹措机制等。2008年7月，市委十届四次全会作出在市区沿钱塘江两

^① “一主三副、双轴六组团、六条生态带”：一个主城，江南城、临平城、下沙城三个副城；东西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城市生态轴、南北向以主城—江南城为轴线的城市发展轴，临浦、瓜沥、义蓬、塘栖、余杭、良渚六大组团；规划在中心城区、外围组团之间设置六条生态隔离带，保持组团之间的相对独立性，防止城市建设“摊大饼”。

岸规划建设十座新城^①的决策。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市直各部门和有关城区加大协同配合力度，积极支持钱江新城开发建设。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要求，一座现代、大气、开放的国际化新城在钱塘江畔快速崛起。2008年10月1日，钱江新城核心区正式开放，标志着新城开发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随后，市委、市政府加大核心区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力度，着力将新城打造成浙江省金融总部中心及长三角南翼区域中心城市中央商务区 and 区域金融中心。与此同时，市直各部门和萧山区、江干区、西湖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纷纷加快钱江世纪城等其他新城的开发建设步伐，推动杭州城市发展格局由“三面云山一面城”向“一江春水向东流”转变。

通过加快钱江新城及跨江沿江新城建设，杭州城市东扩南下加快发展，西进北上发展旅游。市委、市政府通过把老城区做优，把新城区做强，把西部五县（市）做大，把都市圈做新，把骨架网做畅，使杭州大都市框架基本形成。

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是杭州城市化发展的重大举措和里程碑。它对于提高杭州城市化水平、优化城市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杭州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工程

在杭州构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框架迈出关键步伐的同时，市委、市政府顺应群众需求，为改善老城区面貌破旧、基础设施落后、功能不合理，与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极不相称的状况，实施了一系列“城市有机更新”工程，使老城区重新焕发出活力。

^① 十座新城，从上游到下游，江北岸依次为之江新城、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下沙新城，江南岸依次为湘湖新城、滨江新城、钱江世纪新城、空港新城、江东新城和临江新城。

2002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城市道路有机更新，先后实施“33929”^①“三口五路”^②“一纵三横”^③“五纵六路”^④“两口两线”^⑤等重大工程。杭州在开展城市道路建设整治工作中，改变了过去道路建设以市级为主的做法，实行以区作为工程建设主体、市区联动的建设模式。2004年10月，“33929”工程和“三口五路”整治工程圆满完成，共投入资金160亿元，涉及拆迁142万平方米，征地62公顷，新建、改建道路（隧道、桥梁）长度210公里、面积651.5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339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大都市道路骨架。2006年4月，“一纵三横”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完成，共整治道路18.1公里，拆迁36家单位、154家住户，立面整治房屋471幢，新增绿化面积12.05万平方米。2007年3月，“五纵六路”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宣告完成，相关道路通行能力有较大的提升，城市边缘的面貌明显改善。2008年12月，“两口两线”及扩大范围建设整治工程完工，通过“两口两线”整治、建设，杭州市形成四条快速路：中河—上塘高架、德胜快速路、石祥—石大线快速路、秋石快速路（秋涛路—石桥路），对缓解杭州交通拥堵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优化功能布局，强化城市管理，2005年1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背街小巷改善工程的若干意见》，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市

① “33929”：2002年1月实施，即33条道路、9座桥梁（立交桥）、2个隧道、9个入城口的整治建设，杭州市启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后，该工程又增加“一堤三路”（杨公堤、三台路、龙井路、龙井支路）以及之江路改造等工程。

② “三口五路”：2004年3月启动，即解放路、艮山西路（含彭埠入城口）、环城北路、天目山路（留下入城口）、莫干山路（含104国道杭城北入城口）。

③ “一纵三横”：2005年7月实施，“一纵”（保俶路），“三横”（庆春路、凤起路、体育场路）。

④ “五纵六路”：2006年5月启动，即绍兴路和环城东路（两条道路合为一纵）、东新路、新塘路、古墩路、湖墅南路。

⑤ “两口两线”：2006年12月启动，即沪杭高速公路德胜立交入城口和杭浦高速公路大井入城口，德胜快速路和石祥—石大线快速路。

区背街小巷改善工程，有效整合和优化城市管理资源，不断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按照部署，全市背街小巷改善涉及道路平整、截污纳管、立面整治、园林绿化、景观照明、缓解交通“两难”、电力架空线路“上改下”、平改坡、危房修缮等14个方面，同时在改善过程中还根据街巷所涉居民的需求，尽可能做到“跨一步、带一把”，解决一些如庭院改善等急需解决而又力所能及的事。2004年全市解决95条小街巷路面破损、坑洼积水等问题，并连续三年将其作为年度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至2007年，共完成街巷整治2172条，改善街巷总长度682公里，总投资15.52亿元；受益人数180余万人，受益单位1.7万余家。通过整治，市区背街小巷基本达到交通序化、道路洁化、环境美化和景观亮化的目标。

为解决“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痼疾”，2001年12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扩大撤村（乡镇）建居（街）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范围，并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从建设用地、拆迁安置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为落实2003年2月召开的城市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就地安置，自求平衡”原则，加快实施“城中村”整体改造，推动农村到城市、村落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2003年6月，杭州市在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四个区开展30个点、40个村的“城中村”改造试点。2007年3月，杭州市启动市区“城中村”改造五年行动计划，陆续改造“城中村”54个，并同步推进其他撤村建居村的公寓建设，建成农转居公寓400万平方米以上。

西湖、运河、西溪湿地是杭州市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重要资源，为此，2002年2月召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西湖核心景区要整合南线资源，改造北山路，建设湖滨商业特色街区，使西湖这颗明珠更秀美、更靓丽；运河（杭州段）和市区河道要实施综合整治和开发；城市西部地区要调整产业结构，建成城市旅游扩展区和生态保

护区。

按照这一部署，2002年2月，杭州市实施西湖南线整合工程；2003年，实施杨公堤景区、湖滨新景区、梅家坞茶文化村“三大景区建设”；2004年到2010年对北山街以及散落在西湖周边的15个历史文化景点、灵隐景区、吴山景区、九溪—杨梅岭等地区进行整治改造，并实施景区保护、修复、复建、扩建、优化等项目。经过几年努力，杭州市先后恢复、修缮人文景观180余处，并实行环湖公园免费开放，真正还湖于民。

2004年8月，杭州市实施以“一馆、二场、二带、三园、六埠、十五桥”^①为重点的运河综合整治保护一期工程，采取污染企业搬迁、“退二进三”等多种措施治理污染，使水质有了较明显的改善。2005年，杭州市开始实施以历史文化街区整治为主要内容的二期工程，先后修缮多处遗址，利用老房屋、老厂房建设中国刀剪剑、伞、扇博物馆和工艺美术博物馆等，并发掘整理大量运河历史文化的资料、遗存。

西湖文化景观和大运河先后于2011年6月、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3年8月，西溪湿地综合保护一期工程正式启动。杭州市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可持续发展、以民为本”等原则，先后编制7项重要规划，完成20余种专项规划设计方案；对蒋村乡10个村进行撤村建居，收购土地379.37公顷，拆迁农居517户；深入开展西溪历史景观、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等。经过努力，2005年5月，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向游客开放。此后，西溪湿地综合保护二期、三期工程先后启动。

^① “一馆”即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二场”即西湖文化广场、运河文化广场，“二带”即运河两岸各10公里长的两条景观带和游步道，“三园”即艮山公园、青莎公园、北星公园，“六埠”即六个水上巴士码头，“十五桥”即整治或新建拱宸桥、城东桥等15座桥梁。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工程，是杭州市地方党组织贯彻落实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它有力推进了杭州市在城市形态、街道建筑、自然人文景观、城市道路、城市河道、城市产业、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发展步伐，提升了杭州的城市品位和竞争力，是科学城市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推进杭州都市圈建设

2007年2月，市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持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兴、市场共拓、环境共保原则，加强与绍兴、湖州、嘉兴等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促进资源整合、产业整合、功能整合，构建杭州都市圈。5月，杭州都市经济圈市长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四城市市长围绕“建立合作机制，构建合作平台，推进杭州都市经济圈建设”主题，共同探讨推进都市经济圈建设的思路和举措，表达了共同发展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强烈愿望。2007年8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构建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实施意见》，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突破行政区域局限，加强杭州与湖州、嘉兴、绍兴等周边地区的合作交流，形成以杭州为主体，以德清等六个与杭州接壤的县（市）为纽带，联结湖、嘉、绍三市的杭州都市经济圈。随后，湖州、嘉兴、绍兴也先后明确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

杭州都市圈是以杭州市区为极核，杭州市域网络化大都市为主体，湖州、嘉兴、绍兴三市市区为副中心，德清、安吉、海宁、桐乡、绍兴、诸暨六个与杭州接壤的县（市）为紧密层，联动湖州、嘉兴、绍兴市域的经济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南翼”。在四市的共同努力下，杭州都市经济圈初步建立自上而下的四级工作机制：都市经济圈市长联席会议、工作会议、主任办公会议和专题合作制度。为加强统一领导，杭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推进杭州都市经济圈工作专题会议，逐步启动重大工作和重要领域的合作。

规划共绘、交通共联。杭州都市经济圈第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后，杭、嘉、湖、绍四市交通部门率先成立交通专委会，从区域交通发展战略、交通规划、项目建设、运输服务等十个方面开展全面合作，研究和编制《杭州都市经济圈综合交通规划》，构建以杭州为中心，覆盖整个都市经济圈县级以上城市的一个半小时交通时空圈。与此同时，四市抓紧编制《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提出合作共建的战略目标、指导原则、区域发展总体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规划意见，形成发展总体规划。在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各市先后修订完善各自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各类城镇规划，并推进区域专项规划融合，引导都市经济圈城乡空间结构调整、区域性基础设施布局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市场共构、产业共兴、品牌共推。按照工作机制的部署，四市相关部门和区、县（市）积极加强沟通合作，着力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和市场壁垒，共同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的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渐形成以杭州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核心，以周边县（市）工业园区为重点的大都市产业发展区（带）。杭州市先后建立都市经济圈北部产业带、东部产业区、西部旅游产业区等，加强与都市经济圈交流合作力度；并立足四地优势产业，以产业对接、合作、转移为重点，构筑跨区域的产业链，引导中心城市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周边县（市）通过产业衔接、融合和升级，打造各具特色、梯次布局、共兴共荣的产业群，形成杭湖嘉绍地区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

环境共建、社会共享。杭州都市经济圈各地始终坚持环境立市、立县方针，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利益置换，形成共同治理生态环境的局面。同时，四地协商成立环保专委会，制定区域边界环境联合执法制度，以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区域流域水源地沿线重点污染企业、跨区域环境违法企业为重点，每年组织多次区域边界环

境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并对各地主要出境断面水质达标情况进行联合考核。为推动杭州都市圈文化合作与交流，杭州市积极搭建区域人才培养平台，加快都市经济圈人才培养和人才资源开发，并且鼓励在杭院校到周边县（市）投资办学。此外，杭州市还充分发挥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区域文化繁荣。

通过构建杭州都市经济圈，杭州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形成了广阔腹地资源，提升了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地位。同时，杭湖嘉绍地区通过发展联手、产业联合、经济联动，共同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全面提升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共同打造长三角的“金南翼”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加强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但多次就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行集体学习，还先后以全会的形式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根据中央精神，中共浙江省委多次召开全会，就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法治浙江”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中共杭州市委更是以创新精神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进入新世纪后，杭州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在推进杭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不断提高，杭州市部分党员、干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着力解决这些“不适应”“不符合”，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成为杭州地方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在市委领导下，2003年3月至10月，杭州市作为城市基层党组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城市，在城市国有（集体）企业等七个层面开展试点工作。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杭州市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在全市分三个批次按照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通过教育活动，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及领导干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明显增强，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进一步确立；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各项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在活动告一段落后，2009年3月至2010年2月，杭州市分两个批次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市委紧扣“转危为机推进科学发展、克难攻坚建设品质之城”的实践载体，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及各项建设相结合。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中央和省、市委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确立。

2009年12月，市委召开十届七次全会，要求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动力，提高党的建

设科学化水平。为此，市委总结各项工作经验，先后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

在基层党组织中广泛试点推行公推直选。2008年3月，杭州市结合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在村、社区、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等323个基层党组织中试点公推直选。经过努力，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较好达到了配强班子、探索路子、积累经验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市委要求在2010年社区组织换届和2011年村级组织换届中广泛推行公推直选，并对对应坚持的原则、实施范围和程序、纪律与监督等都进行明确和规范。各地各单位基层党组织根据部署，严格按照10个步骤开展公推直选，取得显著成效。

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活动。2010年5月，市委召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部署会，要求各地广泛开展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为杭州市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按照市委部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紧扣主题，以“西湖先锋”为实践载体，以迎接建党90周年、向党的十八大献礼为重要节点，分宣传发动、全面争创、评选表彰三个阶段在全市广泛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2012年6月，市委隆重表彰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各100个（名）。活动大力推进杭州市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服务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总结前期实践经验基础上，2009年9月，市委印发《杭州市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发挥退出领导岗位干部作用的意见（试行）》等，规定集中选拔5名（含）以上市或区、县（市）管正职领导干部时，采取两轮推荐、两轮票决的方式；面向社会集中选拔领导干部时，采取公开选拔的方式；从区、县（市）和乡镇（街道）集中选调一般干部时，采

取公开选调的方式；机关内部提拔担任中层领导职务（含非领导职务转任领导职务）时，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集中开展部门之间中层干部交流任职时，采取跨部门竞岗交流的方式。按此精神，杭州市2002年至2012年共开展五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并通过有关措施增强公选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与此同时，杭州市还大力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开展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训“356工程”^①，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各类进修班、研讨班、培训班，鼓励机关年轻干部到村（社区）任职等，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这些改革措施在推进杭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透明度、促进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加强领导班子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2007年3月和2008年3月，市委先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实施意见》《关于打造“廉洁杭州”的决定》，要求紧密结合杭州实际，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全力打造党政清廉、干部勤廉、社会崇廉、风清气正的“廉洁杭州”。2008年8月，市委印发《打造“廉洁杭州”、完善惩防体系2008—2012年实施办法》，提出经过五年努力，逐步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按照市委部署，市纪委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杭州市领导干部任职廉政法规考试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加强和规范廉政建设的制度措施，领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据统计，2007年1月至2011年8月底，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来信来访21211件（次），立案4343件，处分党员干部4162人，其中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74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1265人、开除公职25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956人，为国

^① “356工程”：用3年时间重点培训500户骨干企业的600名高级经营管理人员。

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亿元。在此基础上，2011年5月，杭州市以“治庸提能力、治懒增效率、治散聚合力”为目标，启动“效能亮剑”专项行动，对各级各部门机关干部中存在的庸、懒、散等作风和效能问题进行明察暗访，共有828人受到作风和效能问责。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上下逐渐形成党风正、政风清、民风和的局面，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政府行政效率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杭州市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了杭州地方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了杭州地方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提供了坚强保证。

基层民主建设取得创新性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杭州市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基层民主，创新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依法行使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2002年9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社区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队伍和其他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社区服务功能，落实各项保障措施，提高为民服务水平。2004年6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决定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人员移交街道（乡镇）和社区管理，街道（乡镇）和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等。党的十七大以后，市委（办公厅）先后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党代表作用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杭州市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通知》等，在发挥党代表作用的程序、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明确党代表活动主要有邀请党代表列席全委会和常委会、经常性征求党代表意见、党代表参

与重大活动的评议和监督、向党代表通报重大事项和不定期组织党代表调研或视察活动等。2008年7月，市委召开十届四次全会，正式提出实施“民主民生”战略，并将其作为促进杭州市发展的“六大战略”之一。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杭州市积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机制，探索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的方法与途径。一是实行服务管理组织网络全覆盖。全市进一步发挥党支部作用，通过“支部小班化”，把党支部建在村（居民）小组、楼道、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上，实行村（社区）建党委、组（楼道）建支部，并充分发挥退休党员的作用，引导全市40余万企业退休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同时，全市还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抓好从业80人以上以及50—79人且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把党组织建在园区、楼宇、市场、商圈、特色街区和行业协会上。二是建立民情联系服务机制。杭州市在城市社区以小区、楼幢、巷弄为基础，在农村以自然村或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100—200户家庭为单元，科学划分管理网格（片），由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担任片长，并逐步建立以乡镇（街道）党组织为核心、村（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全体党员为骨干的“片组户”民情联系服务制度，把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三是区域化统筹服务管理。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积极组织辖区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教师、文艺工作者、外来务工人员、律师等建立专业服务团队，针对居民需求组建“和事佬服务队”“功能性服务小组”“姐妹帮扶队”等个性化服务团队，并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组织和驻区单位相结合、社会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四是健全基层社会沟通机制。

在实践探索基础上，杭州市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绩于民，大力推广村（居）民大会、村（居）民议事会、党员议事会、村（居）民听证会、社区恳谈会等做法，搭建沟通顺畅平台、畅通群众充分表达渠道，初步形成“点对点、面对面、线连线、网联网”的扁平式基层社会沟通机制。五是构建基层党建保障机制。杭州市一方面在市、区、街道三个层面建立社会工作党委，在社区建立公共服务站，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三位一体”、交叉任职、合署办公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另一方面坚持重点下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入基层，大力实施“领头雁”工程，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杭州市大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初步实现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政府的主导力量功能、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功能、居民的自治参与功能的有效整合与互补，为具有杭州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十二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前进

本章提要

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共杭州市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学习型、创新型、生态型城市建设为抓手，建设东方品质之城、幸福和谐杭州，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杭州的美誉度。党的十九大后，市委以“一城”（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一窗”（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为总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拥江发展、三化融合、文化兴盛、改革攻坚、民生福祉、强基固本六大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市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大局，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2021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杭州市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新征程。

一、在新时代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杭州市主要领导汇报后，对杭州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坚持艰苦奋斗、开创新局”的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浙江、杭州的工作寄予厚望，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中共杭州市委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全市人民的厚望，认真落实“八八战略”，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奋力谱写杭州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

2012年2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坤明^①代表十届市委作题为《坚持科学发展，推进富民强市，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提出了推进富民强市，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奋斗目标。

这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省委“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城乡一体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着力建设学习型城市、创新型城市、生态型城市，着力打造安居乐业示范区、城乡统筹示范区、人文法治示范区，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把“生活品质之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全面建成惠及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开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而努力奋斗。会议

^① 2010年1月，省委常委黄坤明兼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提出要实现今后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要全面实施民生优先、环境立市、创新强市、实业兴市、文化引领、开放带动“六大战略”。

大会阐述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和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内在关系。大会指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是立足新阶段新形势对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传承和拓展，体现了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富民与强市、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着眼长三角地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顺应全市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以全球视野审视杭州发展，瞄准先进、追赶先进，全面提升城市品质，进一步提高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必须以自身优势彰显特色，优化山水园林城市的自然形态，强化“一基地四中心”^①的城市功能，凸显东方文化的精神品格；必须以共建共享激发全市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杭州特点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把杭州建设成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东方品质之城，成为生活富裕、精神富有、城乡融合、社会文明的幸福和谐杭州，让这座“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天城”继续闪耀于世界东方，不断放射出时代光芒。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等。2月28日，十一届市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黄坤明为市委书记，邵占维、王金财为市委副书记；十一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罗悦明为市纪委书记。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在杭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它深刻总结了过去五年杭州市的各项成绩和经验，描绘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对动员广大干

^① 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杭州要努力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而共同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深化改革，形成体制机制新优势

杭州在面临城镇化潜力、科技创新动力、改革开放红利、市场化活力“四个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产能过剩、贸易金融不确定性增多、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和财政收支平衡难“三大风险”，以及投资出口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环境容量和节能减排空间不足“三大压力”。同时，经济可持续发展速度趋缓、发展后劲不强、体制机制障碍、重点难点项目推进缓慢、干部精神状态有所退化“五个问题”逐渐显现，人民群众对水污染、交通拥堵、大气污染和垃圾处置等难题解决的愿望日益强烈。

为此，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紧密结合杭州地方实际，把改革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形成体制机制发展新优势。2013年1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四次全会，强调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发展以十大产业^①为主体的创新型经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12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出台杭州“改革十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龚正^②在会上强调，要切实增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自觉性，牢牢把握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在全省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动作用，在服务全省、全国大局中作出积极贡献。2014年7月，市委召开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发展信息经济、推进智慧应用作为“一号工程”，到2020年使杭州率先成为特色鲜明、全国领先的信息经济强市和智慧经济创

^① 十大产业，即文化创意、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息软件、先进装备制造、物联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十大产业。

^② 2013年10月，省委常委龚正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新城市。2016年7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立足抢跑领跑，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

2015年2月、2017年9月，富阳、临安先后撤市设区，杭州市区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公里。按照市委部署，杭州市大力推进区域管理体制创新，基本理顺大江东管理体制，深度推进萧山、余杭、富阳与主城区融合发展，使主城区优质公共服务和要素资源加速扩展，一体化效应逐步显现；积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等，“四张清单一张网”^①建设稳步推进，“五证合一”的商事登记办法^②向全国推广，政府性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实行以区为主审批管理的制度；大力推动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建设，创建培育省市级特色小镇、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孵化器等；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创新发展水平等走在全省、全国前列；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出台实施“亩产倍增”计划、工业用地评价考核体系、差别化供地、阶梯式水价等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

与此同时，杭州市先后制定《杭州信息经济智慧应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智慧经济促进条例》等，大力推动制造业“互联网+”，加快新产业培育、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推广，推进“数据大脑”等新型智慧应用和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核心基础产业

① “四张清单一张网”：“四张清单”指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一张网”指浙江政务服务网。“四张清单”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来规范政府的履职行为，推动政府转变职能落到实处，“一张网”是展示“四张清单”的重要平台，通过“一张网”把清单“晒”出来，接受社会监督，倒逼政府加快自身改革。

② 2015年5月，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实施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登记制度。

发展，探索形成从“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到“ET工业大脑”“企业上云”的智造之路，布局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量子技术、增材制造、商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等七大未来产业。

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体制机制发展新优势，推动杭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由发展的高速度向发展的高质量转变，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发展。杭州经济社会在高起点上的新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获得感。

依法治市，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杭州面临多项挑战，法治建设在工作全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深化法治建设、增创发展新优势的要求更加迫切。

2014年12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杭州建设的若干意见》，即“杭法十条”，提出以完善依法决策机制为重点，在依法执政上走在前列；以健全立法体制机制为重点，在科学立法上走在前列；以严格执法为重点，在依法行政上走在前列；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重点，在公正司法上走在前列；以构建信用杭州体系为重点，在全民守法上走在前列；以健全“一号工程”推进机制为重点，在依法保障改革发展上实现新突破；以健全城市“四治”^①长效机制为重点，在依法保障美丽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以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为重点，在依法保障平安创建上实现新突破；以完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为重点，在加强依法监督上实现新突破；以加强法治队伍建设为重点，在提高法治能力水平上实现新突破。

贯彻“杭法十条”精神，杭州市注重围绕改革大局和民生热点进行重点立法，先后制定《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供水工程管理条例

^① “四治”，即治水、治气、治堵和垃圾处置。

例》《杭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将改革的良好愿景与群众的高度关切及时转换成法治的具体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实现民众意愿，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与此同时，杭州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立法机制，确立公民旁听、代表列席、网络直播等公众参与立法的新途径、新方式，促进立法内容更好地反映民意、汇聚民智、回应民愿。在科学决策方面，杭州市先后制定实施《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实施意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关于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等，严格遵守征求意见、专家论证、法律审核、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等程序，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行政执法方面，杭州市严格依法行政，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构建“四张清单一张网”的基础上，实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使杭州成为全国规范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的标杆。

此外，杭州市还积极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优势，搭建“互联网司法平台”，构建“在线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平台”。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审理浙江省、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六类涉互联网一审民事、行政案件，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新篇章。杭州互联网法院持续推进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网上公开，实行“互联网+审判”“互联网+社会治理”等模式。

“杭法十条”是推动杭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构架，对杭州适应新常态、培育新动力、打开新局面和推动新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建设东方品质之城、幸福和谐杭州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

征。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强调，要下大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中共中央加强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一系列制度措施，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浙江省委出台《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办法》、“六个严禁”^①等。市委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通过中央八项规定等规章制度的实施，全市党风、政风蔚然一新，这种新变化让人民群众耳目一新，也深受人民欢迎。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市委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2013年7月至2014年10月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突出实践要求，推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等做法，以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先进典型为标杆，推动党员干部自觉铭记“四有”、争当“四个人”，^②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2016年4月，市委部署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活动。2017年5月，市委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

① “六个严禁”：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严禁超标准接待；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

② “四有”“四个人”：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提出，广大县委书记要以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为榜样，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和班子的带头人。

作安排方案》，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市委以“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扎实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2021年3月，市委以“五学五创”^①为重点，全面部署启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这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担负起“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政治使命夯实了思想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精神，市委还着力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党的作风建设。2012年12月，市委常委会专题审议通过《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意见》，总共涉及八个方面，30条具体措施，对调查研究、文件简报、出访活动、新闻报道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2015年7月，市委召开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巩固基层政权的决定》，即“双基十条”，从巩固提升、改进完善、探索创新三个层面，协调推进156项具体任务。2017年1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从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的决定》，要求全市干部队伍坚守最铁的信仰、坚定最铁的信念、锻造最铁的纪律、扛起最铁的担当。2018年7月，市委举行十二届四次全会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强基固本行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优化干部队伍素质结构，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面建设清廉杭州。通过建章立制，扎紧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和不想腐、不愿腐的思想笼子，打造不负人民的“一流施工队”。

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对人大、政协、统一战线及群

^① “五学五创”：学深悟透前列意识，开创高质量高发展新局；学深悟透为民情怀，开创幸福城市建设新局；学深悟透创新精神，开创数字化改革新局；学深悟透法治理念，开创民主政治建设新局；学深悟透从严要求，开创管党治党新局。

团工作的领导。2014年12月，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创新，大力推动新时代杭州人大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发展。2015年5月，市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作用的意见》，指导加强和改进各级人大工作。此外，市委就加强和规范乡镇、街道人大工作，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等作出部署。在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市人大及其工作机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两个机关”的职能作用^①得到充分发挥。2013年12月至2018年9月，市委先后出台文件，对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的基本形式、运行机制、保障落实提出要求。新时代的统战工作也得到加强。2016年6月，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研究通过《中共杭州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贯彻落实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and 市委〈实施意见〉重点工作责任分解（2016—2017）》。此外，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市委推动了社科联、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改革，加强了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部门党组织统战力量得到加强。

从严治党推进全市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实现根本好转，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提升了党的形象和威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同时，党加强了对人大、政协、统战、群团组织的领导，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构建最大同心圆，对进一步提高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国内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①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二、在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走在前、作示范

2015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将于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他在介绍时说，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相信2016年峰会将会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调研，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中共杭州市委提出，杭州要在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走在前、作示范。

为打造“一城”“一窗”而努力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2017年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一德代表十一届市委向大会作的题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而奋斗》的报告。大会提出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奋斗目标。

大会提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八八战略”实践，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以率先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以筹办重大赛

事活动为牵引，不断厚植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明之都和东方品质之城特色，率先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好全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排头兵，为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而不懈奋斗。

大会确定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确保亚运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率先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成为具有较高全球知名度的国际城市，实现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显著提升。围绕建设世界名城的目标任务，大会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创新活力之城优势；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示历史文化名城魅力；坚定不移拓展对外开放新优势，建设融合线上线下、联通世界、服务全球的国际重要商贸中心；坚定不移推进美丽中国样本建设，打造颜值高、气质好、国际范的生态文明之都；坚定不移推进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深化东方品质之城建设。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杭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杭州市出席中共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十二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赵一德为市委书记，徐立毅、马晓晖为市委副书记，陈擎苍为市纪委书记。

根据市十二次党代会精神，2018年7月，市委召开十二届四次全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①在会上指出，要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要全面推进拥江发展、三化融合^②、文化兴盛、改革攻坚、民生福

① 2018年5月，省委常委周江勇兼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② “三化融合”，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融合。

祉、强基固本六大行动，当好“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排头兵。他进一步强调，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就是要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杭州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由此，“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成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和行动纲领。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大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调研，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市委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一窗”的内涵，提出杭州要在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走在前、作示范。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谋划了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开启了杭州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新征程。建设“一城”“一窗”，开展“六大行动”，进一步明确了杭州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是杭州把握重要战略机遇，结合时代要求、自身实际提出的行动纲领。

城市国际化和拥江发展战略的实施

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世界名城，推进城市国际化，是杭州市打造“一城”“一窗”的重要举措。

2013年12月，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出台“改革十条”，强调要“围绕推进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形成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体制机制”。2016年5月，市委办公厅印发《杭州市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行动纲要（2015—2017年）》，围绕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名城的战略要求，提出要以更高的国际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化。

围绕G20杭州峰会的举办，2016年7月，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

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若干意见》，提出抓住和用好举办G20杭州峰会的重大战略机遇，推动城市国际化新突破，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创新活力、人文魅力和国际影响力。G20杭州峰会是杭州市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服务保障和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使全世界关注杭州、了解杭州，给杭州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实力的机会。9月4日至5日，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提升了城市的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增强了杭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加速了杭州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进程。2018年4月，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市城市国际化促进条例》，提出以国际化提升城市化、以城市化带动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2017年11月，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意见》，要求以推进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为突破口，实施“拥江发展”战略，推进杭州一流城市和世界名城建设。2018年1月，市委召开十二届三次全会，强调要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深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发挥2022年亚运会牵引作用，推进会展和旅游国际化，在加快城市国际化上实现新突破；以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利用为重点，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突出生态为要、保护第一，着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在推进拥江发展上实现新突破。2019年7月，市委举行十二届七次全会，强调要重点实施包括“城市国际化计划”在内的十个方面的项目。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杭州市以推进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利用工程为重点，制定实施拥江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速钱塘新区产城融合，加强湘湖与三江^①汇未来城市先行实践区规划管控，加快钱江新城二期、杭州富春湾新城、临安滨湖新

^① 三江：富春江、钱塘江、浦阳江。

城、桐庐富春未来城、建德高铁新区、淳安高铁新区等建设，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综合整治力度；全面建设亚运村，打造精品村、风情小镇、精品示范线，着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和高铁、高速公路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拥江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同时，杭州市以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国际会议目的地城市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网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枢纽城市为目标，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与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杭州实验区建设有机融合、一体发展，构建全球最优跨境电商生态圈，加快建设融合线上线下、联通世界、服务全球的国际重要商贸中心；引进国际泳联主办的第14届FINA世界游泳锦标赛（25米）等国际性比赛、会展，持续提升本土赛事品牌；拓展加密国际航线，构建水陆空、“铁公机”一体的大交通格局，实现城市国际化新突破。

实施城市国际化和拥江发展战略，有利于杭州更好落实国家和浙江省重大战略部署，深化与国际国内城市的开放合作，强化城市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加快都市圈和都市区建设，提升杭州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和能级，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做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

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新动能。为此，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主动迎接新经济，谋求新发展。

在杭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2016年7月，市政府印发《中国制造2025杭州行动纲要》，要求以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互联网+”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实现“杭州智造”；以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为突破口，全

面提升杭州制造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绿色发展为着力点，打造“杭州质造”品牌。2018年6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专题调研数字经济发展，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勇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2019年9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目标，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增总量、优存量、促增量、提质量，形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双引擎”，推进杭州新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6月，市委召开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城市，推动数字产业化二次攀升。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杭州市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应届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才，大力实施“名校名院名所”建设工程，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和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技术等建设，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域创新；深入实施“一号工程”，组织开展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行动，持续提升电子商务、云计算与大数据、数字内容、信息安全等数字经济优势产业竞争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未来产业蓬勃发展；深入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加快从治堵向治城拓展，多个数字驾驶舱和应用场景同步推进，便捷泊车、舒心就医、欢快旅游等应用上线，基本实现“先离场后付费”“先看病后付费”“20秒景点入园”；扶持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军民融合、信息软件等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工厂物联网等，同时淘汰落后产能，整治低小散（脏乱差）企业。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2019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3531亿元，增长5.1%，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5%、13.1%和7.8%；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87亿元，增长10.7%；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35.2万元/人，

比上年增长8.7%；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7.2%，降幅比上年扩大1.3个百分点。同时，2019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高于GDP增速8.3个百分点，占GDP的24.7%，数字内容、软件与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分别增长16.3%、15.7%和14.6%。^① 2020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杭州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大力提振服务业，持续做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拓展都市经济、幸福经济、未来经济三大新蓝海的“1+2+3”年度发展目标，强化数字赋能、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开放增效、深化改革攻坚、完善要素保障，全市经济企稳回升、稳中向好，实现“V”形反转。

杭州市通过做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通过做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牵引制造业创新发展，加速了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为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翻身仗”，为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奠定坚实基础。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健全和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机构改革，是新时代杭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进入新世纪后，市委更加重视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社会治理，更加重视平安创建工作。为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16年起，市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G20杭州峰会维稳安保工作经验，开始合力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一是完善纵向的层次结构，建立“市级抓统筹主导、区县抓组织实施、乡镇街社抓落实执行”，形成上下联动、分工明确的市域社会治理组织架构。二是建立横向的系统结构，组建“党建领和、政府主和、社会协

^① 杭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2019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智慧促和、法治守和、文化育和”六个专项工作组。三是夯实落地的治理基础。乡镇（街道）整合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力量和资源，初步建成集事件协同、视频监控、指挥调度、分析研判于一体的“基层治理四平台”。

在推进“六和塔”市域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杭州积极探索改革创新、数字赋能的社会治理手段。一是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推进“三源治理”。对原来机制化运作的综治中心进行改造提升，整合政法、信访、人力社保、心理服务等工作力量，明确矛盾化解、事件处置、指挥研判三项功能，创新诉源、警源、访源“三源共治”方式，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二是以城市大脑建设为抓手，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取得进步。发挥城市大脑先发优势，构建“一基两擎三集”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协同系统：把统一地址库建设作为智能塔基；打造事件搜索、风险评估两大引擎；推进数据、指挥、应用三大集成。同时开发了“智慧安防小区”“风险无色预警”“六和指数”等100多个智能应用。2020年5月，杭州被确定为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

为了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杭州实际，市委推进领导体制、党政机构优化改革。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市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强调，要建立健全市委对重要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统筹优化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加强市委职能部门的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全面落实机构改革任务，确保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更加完善，党的领导全覆盖，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2019年1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对推进机构改革进行动员部署。2月和4月，市政府先后发布《关于机构改革涉及市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杭州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面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机构改革中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开展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特别是做好涉及民生、应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杭州市根据城市发展特点和功能定位，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在编制限额内积极探索具有杭州特色的机构设置，结合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数据资源管理、投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改革实践，统筹推进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关改革和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等各项改革，做到既充分体现中央战略意图，又反映地方需求和特色，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改革成果。改革中，全市各地各部门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向前推进。

杭州市深化党政机构改革，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推进了各项工作稳步前进，大大提升了城市综合竞争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正当杭州人民为夺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了。2020年1月初，在湖北省武汉市首先发现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及时对疫情防控作出指示、提出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及时公开疫情信息，组织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公开疫情信息后，杭州市卫健委立刻组建工作组、专家组，并从19日开始派督导组到市属医疗机构和区、县（市）督查，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做好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1月20日，杭州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2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 and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要求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工作部署，成立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步推动市、区（县、市）两级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确保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23日，杭州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第一时间停办新春文旅等人员聚集活动，全部关闭景点、演艺吧等场所，对机场、车站、码头等全面开展防控。1月25日至2月5日，在重点地区传染源输入、全市新增确诊病例持续攀升期间，实行十项最严措施，迅速实施村庄、小区、单位全面封闭式管理，让城市迅速“静下来”。2月7日，市委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在全国率先谋划启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15日，在全市新增确诊病例出现“零新增”后，推动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区等疫情低风险县（市）、区在全省率先降低响应等级，对乡镇（街道）按风险等级分类管控；在全国大中城市中较早恢复城市公共交通和市域道路客运正常运营，率先开放全市公园、广场、露天运动场等，推动城市运转步入正常轨道。16日，开通全国首趟复工人员专列。3月2日，市委召开全市“战疫情、促发展”工作推进会，引导全市上下“戴着口罩抓发展、开足马力降损失”。3日，杭州部署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推动专班化运作、多部门协同，坚决守好“国门”。4月下旬，全市中小学和在杭高校分批复学复课。5月中旬，疫情防控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防控。

在疫情防控中，全市全面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市委、市政府持续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建立市领导负责疫情防控十大工作专班、市领导联系区（县、市）疫情防控机制，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齐上阵，各地各单位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五个全”紧急措施、八大管控机制和“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十项措施等疫情防控举措，严格入城管控。全市公安、民兵参与定点防控，市、区（县、市）两级机关干部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参与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把好最后一道关、守住最后一道门。坚持“硬核隔离+暖心服务”，尽最大努

力做好居家观察人员物资采购等暖心服务。广大市民群众步调一致，“宅在家”就是“为大家”，“戴口罩、少集聚、勤洗手、多通风”蔚然成风。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发展变化，精准有力管控萧山机场等重点卡口，确保“外防输入”；及时应对国内偶发、散发疫情，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和社会管控工作，确保关口前移、防控有效。

面对严重疫情，杭州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确定8家定点医院，组织专家组成市级专家组和核心专家组，制定完善诊疗方案，特别是对重症患者实行“一人一案”医疗救治，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零感染。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正常人际交往带来阻隔、给日常城市运行造成障碍，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供了有效链接和重要支持，大幅度减少了城市各方面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城市大脑实战应用“战疫情、促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通过数字赋能实现精密智控、精准施策、精准治理。特别是首创的“杭州健康码”，有效解决了疫情期间人员流动管控的难题，为全国抗疫和复工复产作出了杭州贡献。

市委、市政府在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统筹推进有序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2月，在全市新增确诊病例降为个位数、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后，杭州率先推动企业分类分区时段有序复工，谋划开发上线“企业复工数字平台”，创新“人员一码通”、“物流一证通”、专列接返员工等工作，首创“亲清在线”“读地云”等应用，打通企业复工复产的堵点。市委组织开展了机关干部“助万企、帮万户”活动，抽调2018名市直机关干部组成196支服务分队，下沉到190个乡镇（街道）深入服务基层企业群众；抽调500余名健康指导员，手把手帮助企业 and 学校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健康防疫难题。

在杭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调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

况。3月31日，他实地调研了西溪湿地和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对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为杭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市委认真贯彻总书记指示精神，及时出台支持企业发展12条政策，形成“1+1”惠企组合拳。截至2020年12月，全市为企业解困减负、提供发展资金达60多亿元，国务院“两直”资金第一时间全部发放到市场主体。

通过强化数字赋能“六新”建设，开展“战疫引才”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抓“六稳”、促“六保”、拓“六新”，杭州经济运行实现“二季红、半年正、三季进”，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杭州山川秀美，生态建设基础不错，要加强保护，尤其是水环境的保护，使绿水青山常在。希望你们更加扎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使杭州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本。”这是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杭州市主要领导工作汇报时的重要指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杭州市委扎实推进美丽杭州建设，同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杭州呈现出生态美和心灵美交相辉映的优美画卷。

打造美丽中国样本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美丽中国样本的指示精神，2013年7月，市委召开十一届五次全会，研究部署“美丽杭州”建设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建设“美丽杭州”的决议》和《“美丽杭州”建设实施纲要（2013—2020年）》，讨论通过《“美丽杭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强调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把杭州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12月，市委召开十一届六次全会，要求强化环境突

出问题整治，加快美丽杭州建设。2015年7月，市委召开十一届九次全会，强调要以建设“三美^①杭州”为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争在“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上有新作为。

按照浙江省委“五水共治”^②的部署，市委以治水为先导，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积极打造美丽中国样本。为此，杭州市先后出台《杭州市城市防汛排涝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的通知》《杭州市抓节水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关于加快工业治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等，全力抓好“五水共治”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市各部门和各区、县（市）积极行动，努力抓好清水治污、防洪排涝、饮用水保障、节水型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并以治水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杭州市先后完成277条黑臭河、71条垃圾河的治理；完成9个县控以上劣Ⅴ类断面和1256个劣Ⅴ类水体的省定剿劣销号任务；77个镇街、1664个生活小区、33个工业园区（集聚区）达到省级“污水零直排”创建标准。2015年，杭州市基本完成境内84条137公里黑臭河整治，西部四个区、县（市）基本实现全域可游泳，钱塘江、苕溪、运河流域以及西湖、千岛湖等水质年均值都达到或优于Ⅲ类。2016年，杭州市绕城公路范围内城市河道稳定消除黑、臭、垃圾成堆等现象，城市河道基本消除晴天排污现象，80%的城市河道水体主要指标达到或优于Ⅴ类。为巩固治水成果，杭州市制定全国首个《美丽河道评价标准》

① “三美”：生产美、生态美、生活美。

② “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

（DB 3301/T 0226—2017），对城市河道“美丽”指标进行科学量化，并大力开展生活小区污水零直排工作。

在大力抓好“五水共治”的同时，杭州市还大力抓好“五气^①共治”“五废^②共治”，深化“四边三化”“两路两侧”等专项治理行动，实现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等显著下降，大气和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推动城乡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此外，杭州市还加快“三江两岸”^③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积极把最美县城、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等打造成为靓丽风景线。

杭州市打造美丽中国样本，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倒逼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最美现象引领社会新风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杭州的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社会道德赖以生成的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思潮日益呈现多元化、多样性。加强和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市委的重要任务。

2012年7月，市委印发《杭州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强调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公民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加强和改进公民道德建设，努力创新和完善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形式、方法、载体、手段和机制等，把全市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市委要求要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2015年10月，

① “五气”：燃煤烟气、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城市扬尘、油烟废气。

② “五废”：生活固废、污泥固废、建筑固废、有害固废和再生固废。

③ “三江两岸”，即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沿线可视范围，上游起于建德市新安江大坝，下游止于钱塘新区。

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文明行为基本规范、文明行为的鼓励与促进等作出明确规定。2016年8月，杭州市第295号政府令公布《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应用、维护、安全等。2018年10月，市文明委（全体）扩大会议暨城市文明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强调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锲而不舍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更高立起杭州的精神大厦，为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打造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同时，市委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杭州市始终把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建设文化名城强市的基础工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以激发社会向善、培育“最美风景”为抓手，引领和带动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打造现代社会道德高地的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用主流价值凝聚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后，杭州市继续组织开展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实践活动，形成“和谐、民生、文明、诚信、感恩、敬业、友善、信仰、责任、崇学、爱国、务实”12个月份主题词；利用市民大学堂、杭州数字阅读平台、“市民悦学体验点”、“学习地标”等教育阵地和平台，举办“乐学悦享 名城书香”主题杭州学习节，组织杭州诗歌大会、“三分钟理论快讲”等活动，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广泛凝聚杭州新时代发展精神力量。

用优秀文化强化价值自信。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支持下，杭州市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并举，依托全市广泛建成的社区文化家园、城市文化公园、农村文化礼堂、企业文化俱乐部和杭州市“第二课堂”等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编写杭州市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丛书，精心打造“最忆是杭

州”文艺晚会，讲好杭州故事、浙江故事、中国故事，把优秀文化基因根植于社会沃土、群众头脑。到2017年底，全市建设各类道德讲堂830个，涵盖机关、企业、行业、学校、社区、村镇等各个领域、各类人群。2012年后，杭州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推动乡风文明深入发展。截至2019年，全市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075个，村级覆盖率达到53%。

用“最美”人物引领时代风尚。全市通过基层评“好人”、条上推“最美”、综合树“模范”等举措，连续多年挖掘“最美”现象，评选道德模范，先后选出“最美妈妈”“平民英雄”“十大美德阳光少年”“感动杭城十佳优秀教师”“十佳好婆媳”等可亲可敬可学的“最美人物”2.1万余名，以此倡导“最美”精神，形成“最美”品牌，打造“道德高地”；开展“邻居节”“好家风”“好婆媳”等活动，引导各行各业形成争做“最美”杭州人、争当“最美”主人翁的浓厚氛围，推动“最美现象”从“盆景”转变为“风景”“风尚”。为广泛传播“最美”事迹，市文化团体以“最美人物”为原型，组织创作了《最美妈妈》《一分十六秒》等艺术作品，其多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促使道德模范的人性光辉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取向。

用斑马线彰显文明素养刻度线。2007年1月，杭州公交集团制定《公交营运司机五条规范》，明确规定“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礼让”。此后，杭州公交集团对1.25万名公交车司机进行“人行横道礼让”教育，制定“321礼让行人操作法”^①。2010年12月，杭州市出台《打造交通文明示范城市三年规划》，决定继续执行公交礼让行人、严查酒驾等措施，并要求先公（工）后私，充分发挥公仆、公共车辆、工程车辆在交通文明建设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2015年10月通过的

^① “321礼让行人操作法”：距离人行横道30米必须减速，距离人行横道20米必须降到5—10公里/小时，距离人行横道10米如果行人还在继续穿越，必须停车让行。

《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斑马线“礼让行人”正式写入地方性法规。至此，杭州的“礼让行人”从开始的文明倡导，升格为地方法条款。“礼让斑马线”行动已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成为杭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入杭州人民群众的心里，人民群众践行文明无年龄之分、无地域之别，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同时，杭州市又把一系列好的习惯上升为制度规范，使做好事有保障、有荣誉，推动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最美现象”成为社会风尚，使杭州成为“最有温情的善城”。

四、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经过40多年的不懈奋斗，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40多年来，中共杭州市委在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比全国大多数地区好得多的成就，如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市委始终把人民群众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①作为努力的方向，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走好每一步，竭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殷实富足生活的更高期待。2020年，杭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杭州市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全面深化改革，从1992年开始，杭州连续21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后，杭州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与效益的统一，推动经济实力实现质的飞跃。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5373亿元，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四、副省级城市第五、全国大中城市第九；常住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52465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22102美元），按世界银行最新标准，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创新开放的氛围。杭州市先后成功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积极推进“名校名院名所”工程，大力支持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摩院等“创新重器”落地，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乐园，涌现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集团等一批世界级的领军企业。同时，杭州市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努力为企业创造平等、开放、高效的营商环境。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2019年杭州民营经济增加值9378亿元，占GDP的61.0%。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区域一体化发展。杭州市坚定不移推进市域统筹发展，努力建设杭州都市圈，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加快城市国际化步伐，特别是通过举办G20杭州峰会、筹办2022年亚运会等，城市能级和地位得到极大提升。2019年，境内公路总里程达到1.6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32公里。地铁运营里程135.4公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里、在建里程381公里。杭州在全省的龙头地位不断巩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在国际上的美誉度持续提升。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和谐生态环境的滋养。杭州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区、江河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高度重视钱塘江保护，积极推进“三江两岸”生态带建设，持续抓好城中村改造提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铁腕淘汰落后产能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全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民生之基的保障。2001年7月正式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杭州市已基本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医疗保险为补充、医疗困难救助为托底，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困难救助和大病医疗保险在内的全覆盖、多层次、可转换的“2+2”城乡统筹医疗保障体系。与此同时，杭州市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每年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改善民生，有效推动广大群众和新杭州人参与城市共建共治共享。2019年杭州市人均寿命82.95岁，人均期望寿命持续攀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人民生活的稳步提高。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261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6068元和36255元，分别居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三位和第二位。近年来，杭州荣获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城市、全球15个旅游最佳实践样本城市、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全球会议目的地百强城市等系列殊荣，连续13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桂冠，被授予全国唯一的“幸福示范标杆城市”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从“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到

“品质之城”，到“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和“重要窗口”，人民生活从基本温饱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一百年来，杭州发展的历史雄辩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2020年，杭州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遥想1922年9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上城区皮市巷3号成立时，仅有党员3名。近100年来，杭州地方党组织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2019年年底全市基层党组织达4.14万个、党员72.57万人。杭州也从一个备受中外反动势力肆意压迫和欺凌的积贫积弱的城市，嬗变成一个向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的欣欣向荣、繁荣发达的城市。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在“三个地”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杭州是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陈望道翻译完成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杭州走出去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杭州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杭州的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和人文优势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充分激发出来，杭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成为民营经济强市、创新活力之城。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杭州在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实践中一直走在前、作表率。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对杭州寄予厚望，希望杭州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头”作用，并对杭州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历史使命。作为“三个地”“一窗口”的省会城市，中共杭州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紧紧围绕“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发展导向，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奋力展现“重要窗口”的“头雁风采”。

从“龙头、领跑、示范、带头”作用到“重要窗口”的“头雁”作用，既一脉相承，又升华提高。作为“三个地”的省会城市，杭州肩负着为浙江发展闯关、为全国改革探路的重要使命，要以“浙江之窗”的头雁风采展示“中国之治”，回应“时代之问”，为国际社会感知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提供经典范例。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共杭州市委正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把杭州建成“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后 记

为了纪念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2年中共杭州小组成立100周年，2020年4月，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撰《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

本书的框架结构和体例主要参考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初稿）》第三卷（1978—2002）、《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及历次中共杭州市委全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等。

本书由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郎健华任主编，全面领导全书的编撰工作；副主任蒋文欢和曹正法任副主编，对全书进行了审稿。写作分工如下：王惟惟负责第一、二章的初稿，蔡建明负责第三、四章，王建新负责第五、六、七章，郝明负责第八章，董林生负责第九章，李辉毅负责第十章，王凤杰负责第十一、十二章；董林生对第一、二、三、四、八、九、十章，李辉毅对第五、六、七、十一、十二章进行了修改；全书由李辉毅统稿。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中共杭州市委政研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及档案部门的大力协助。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安蓉泉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曹力铁教授对本书框架提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建议；中共浙

后 记

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三处处长俞红霞多次进行指导；缪晓燕同志前期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资料搜集和消化吸收不够充分，加上编者学识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21年3月